

目 录

绥远“九·一九”起义前后敌特活动

情况概述……………张如岗忆述 孙继文整理 (1)

国民党CC中统在绥西等地的罪恶活动……………董叔明 (26)

绥远地区的国民党中央特务组织……………谢新晋 (35)

(一) 绥远省战地工作委员会的改组

(二) 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特种工作指导处

(三) 绥远省党政总队

(四) 第十二战区“民众工作总队”的成立与活动

(五) “绥远省肃奸委员会”的罪恶

绥远战青团纪事……………马映光 (62)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局察哈尔省调查

统计室内幕……………董叔明 (70)

张家口“青年训练队”……………高平 (79)

绥远省“招致分会”……………张富仪 (83)

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特

- 务间谍活动.....正珠尔扎布 (87)
- 五当召日本化装喇嘛赴藏被捕始末.....巴靖远 (102)
- 五当召的“日本喇嘛”.....云昌秀 (111)
- 清末日本女间谍河原操子在喀喇沁的活动.....邢复礼 (118)

蒋介石集团与内蒙古德穆楚克栋鲁普

- 反动势力.....沈重宇遗稿 沈元加整理 (130)
- 国民党绥远“国大代表”的产生.....张富仪 (144)
- 绥远青帮和伪蒙疆民生会.....卢健飞 王明远 刘吉梯 (148)

资 料

- 绥远省国民党政权军政特工组织.....张问之 (207)
- 日寇及伪蒙疆政府之特务、警宪机关.....张问之 (214)
- 内蒙古东部地区一贯道的传入、组织、
活动及取缔情况.....赵连山 (217)

绥远“九·一九”起义前后

敌特活动情况概述

张如岗忆述 孙继文整理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消灭，剩下的不过百余万人，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广大地区漫长的战线上。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经济以及各个方面，已陷于四分五裂、土崩瓦解之状态。在绥远地区，国民党部队只有五、六万人，其基本倾向是以傅作义先生的马首是瞻的。蒋介石为了控制这部分军队，制定的反革命策略是：让绥远部队能守则守，守不住则西撤甘、宁、青地区，与“二马”（马鸿逵、马步芳）部队靠拢，共同把守大西北这个阵地。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绥远省当局与我方进行和谈，极力破坏绥远地区的和平解放。由于我党坚持了“绥远方式”这一伟大的战略思想，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和正确指导下，华北地区解放军和各级党、政、群组织及广大人民群众，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终于促成了国民党绥远省当局的和平起义。

我在一九四八年七月奉命到绥蒙公安局工作，一九四九年三

月接任绥蒙公安局局长。同年五月在丰镇成立绥远省人民政府，被任为公安厅厅长。由于工作关系，对于绥远“九·一九”起义前后国民党特务进行破坏的活动，和我方为保卫起义而进行的反特斗争情况，有所了解。兹就记忆所及，为研究历史提供一些资料。其间，为了记事翔实准确，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同时，也访问了当年参加这一斗争的一些老同志，如冀述楷、祁芳、李保民、王若川等同志积极协助取材，并多次进行座谈，又蒙王雁鸣、魏刚、王思齐、贾荫生、徐国卿、王礼茂、王治民、谭觉民等同志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核实查证。对于大家的赞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这个材料，以“九·一九”起义为中心，综括归纳了起义前后两年期间的一些情况。北平和平解放至“九·一九”绥远起义阶段为一部分；剿匪肃特阶段为一部分。兹分述如下。

北平和平解放至“九·一九”起义

敌特在绥远地区的活动

一、北平和平解放后绥远地区的形势和动态

绥远地区，地处大西北的前哨，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我党很早就在这个地区开展了工作，远在抗日战争开始即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蒋介石为了破坏抗战，通过特务组织疯狂地对我进行破坏，搞磨擦，有不少同志牺牲在日本侵略者和蒋特的屠刀之下。抗战胜利

后，国民党特务反革命活动更变本加厉。我公安机关也很早就派出工作同志，建立与发展了相当数量的隐蔽力量，深入到敌特营垒内部，与敌人进行了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为以后进一步开展隐蔽斗争建立了基础。

淮海、平津战役之后，我解放大军挥师南下，渡江作战，直捣国民党老巢南京，反动政府逃亡广州。此时，在华北的解放军于四月二十四日解放了太原，五月一日解放了大同，至此山西全境全部解放。华北地区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所剩无几。绥远尚存的国民党步骑兵五、六万人，在军事上已处于相当孤立的境地。由于全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影响，绥远各族各界人民拥护和平的呼声愈来愈高，国民党广大官兵向往起义的愿望也日益强烈。

此际，以董其武将军为首的绥远军政各界绝大多数拥护和平，愿随傅作义先生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并积极响应董其武将军倡导的革新运动，为举行起义积极创造条件。但是，也有些人因多年受国民党反共宣传的影响，对于我党提出的解决绥远问题的“绥远方式”，怀疑顾虑，观望徘徊，存在着对立、恐惧心理。少数坚持反革命立场的反动派顽固分子，则极力反对绥远和平起义，梦想跟着国民党顽抗到底，企图坚守绥远阵地，不能守则西撤甘、宁、青地区，与“二马”部队靠拢，死守大西北；他们还扬言，必要时到大青山开展所谓“敌后游击”，以配合美蒋卷土重来。

二、各地特务纷纷逃集绥远，特务头子

张庆恩、史泓等由平来绥部署工作

一九四九年初，平、津、张和山西、西北等广大地区解放后，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及阎锡山体系的特务，有相当数量陆

续潜来绥远，有的投奔绥远的特务机关承领活动任务，有的则潜伏起来窥伺时机，待机而动。中统特务头子、国民党华北“剿总”调统室主任兼军法处处长张庆恩，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带着整顿绥远特工、破坏绥远和谈的特殊使命来绥。他将各地潜来绥远的中统特务，统一于“绥远党通室”的指挥之下，部署任务，针对当时绥远的和平起义运动，进行破坏。军统特务在北平解放后，为了布置华北各地特工潜伏工作，委派军统特务头子、国民党华北“剿总”第二处处长史泓为华北区区长，前来绥远活动。身份业已公开的原绥站站长庞中兴另派别地潜伏，改任赵思武为绥远站站长，其副站长和支台长仍为陈彤、杨秉仁。所有各地潜绥之军统特务，统一于赵思武指挥之下，对绥远和平运动进行破坏。

三、制造流血事件袭杀我联络处工作人员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我华北人民政府根据《绥远和平协议》，派遣联络处进驻归绥，协同董其武将军执行协议条款和过渡的有关事项，制订并实行通车、通邮、通电、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和双方货币兑换等具体办法。在七月下旬的某日下午，我联络处铁路工作组的同志由旧城回车站，行至中途空旷地带，突然遭到枪弹袭击，当场有三个同志受伤，其中工作组秘书王士鑫同志受重伤，抢救无效而牺牲。王士鑫同志牺牲时年仅三十八岁，他为绥远的解放献出了生命。后查明这一事件，是由敌特分子策划，部队中个别顽固分子指使，利用赵晓峰的二五八师段景堂团二营六连连长李锡庆充当凶手制造的。

事件发生后，我党中央、华北局及绥远省党委和政府，非常重视。一方面揭露敌人破坏起义的阴谋诡计，另一方面坚决贯彻以“绥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既定方针。我驻绥联络处同志们临危不惧，坚决、认真地贯彻上级指示，揭露敌人的险恶用心，通过座谈、访问、参观等方式，向当时绥远省国民党政府高级干部、各族各界代表人士以及学校、工厂，广泛宣传我坚持和平解放绥远的政策，并组织指导进步青年开展读书会等活动，力促起义的早日实现。

四、打击进步力量，砸毁《奋斗日报》

煽动游行示威，散布谣言惑众

北平和平解放后，原绥远省《奋斗日报》积极响应董其武将军关于和平的倡导，在宣传报道方面逐步向人民靠拢，特别是在革新运动开始后，该报对反共文章和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逐渐缩减，而着重宣传绥远和平、革新运动的消息，有时还转载我新华社发布的新闻和解放区的消息。这就触怒了敌特分子，成为他们必予破坏的目标之一。一九四九年四月间，即我党在北平同傅作义先生举行绥远和谈之始，驻归绥的二五八师政治部主任赵元德，欺骗蒙蔽士兵二十余名，在一个夜晚越墙闯入《奋斗日报》社，捣毁门窗家具，砸烂印刷机器，殴打工友、编辑，大肆进行破坏。《奋斗日报》因此停刊十余天才得恢复。

敌特分子破坏起义和进步运动，制造事端的猖狂活动不一而足。他们在包头还网罗坚持反动立场的军政人员，煽动一些受蒙蔽的人，上街示威游行，张贴反动标语，散发反动传单，诬蔑“傅

作义出卖了北平，董其武又要出卖绥远”。公然喊出“打倒傅作义、董其武”、“拥护×××、×××、×××”的反动口号。敌特分子鉴于绥远和平气氛之高涨，狗急跳墙，不择手段地制造动乱，妄图引起内部分裂。他们编造谣言，蛊惑群众，到处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爆发，共产党马上就要垮台。说什么国民党有可靠的外援，美国海军司令白吉尔要来帮助中国剿共，日本空军志愿队已经组成，即来中国参战；“国府”在缅甸训练的军队一出征，很快就会统一全中国等等，妄图动摇广大官兵走和平道路的信心，破坏和平起义。他们还恶毒地诬蔑我党的和平起义政策，在军政干部中散布破坏言论。说什么，“共产党是不会信任你们的。你们再革新再改造，迟早也得被杀掉；你们再进步再努力，最后还是被抛弃；跟共产党走死路一条，跟国民党走前途远大……”等等。

不管敌人怎样穷凶极恶、阴险狡诈，群众是眼明心亮的。广大人民和部队官兵在现实面前，大都能明辨是非，通晓大义，不为谣言所惑，决心追随傅作义和董其武将军，走和平起义的光明道路。

五、中统、军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史泓、田

俊等再度来绥，整顿组织和部署工作

《绥远和平协议》签订后，我党派联络处驻归绥，协助和促进绥远开展起义工作。国民党政府预感到在绥远的立足点即将失去，除上述垂死挣扎外，再次派特务头子张庆恩（该张于前

段来绥部署工作后返回了南京等来绥，整顿组织，部署工作。

一九四九年七月间，张庆恩由穗经兰州、银川到达绥远包头，随同的还有郭跻堂、刘钊、焦志达、陈儒干、张毓楷、郝世宽等十九名特工人员，企图再次加强特务的部署与活动，以阻挠和破坏绥远的和平解放。张庆恩在包头以第九兵团政主治理任身份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首先整顿了特务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了行政院内政部调查局绥远办事处（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共设台湾、海南、重庆、贵阳、绥远等五个办事处），张庆恩自任主任，魏纯美任副主任。该办事处管辖绥远、山西、甘肃、宁夏、新疆等五省，东北、冀热平津、晋察蒙旗等三区，陇海、平汉两线，共十个调查处和一个第七区公路调查站。绥远办事处设在包头，以此为中心，指挥上述省区[的特务进行活动。

张庆恩纠集在包头的上述各省、区调查处的特务头子共同策划：（一）加强绥远办事处的领导机构；（二）加强各省、区潜伏工作的部署；（三）各省、区在包头的人员立即奔赴本地域开展工作；（四）选派各地流亡来绥的特务，到解放区开展所谓“敌后工作”。之后，张庆恩即从麇集包头的特务及原来在各地直接发展的特务中，选派出一百一十七名特工，分别到上述省、区、站所属四十一个城市，直线潜伏，进行破坏活动。此外，国民党政府在“统一应变，灵活指挥，作好长期打算”的安排下，已在三月份将“中央党通局”改隶为行政院内政部调查局。所以在这次整顿中，也将绥远省“党通室”改为绥远省调查处，隶属行政院内政部调查局绥远办事处，仍由原主任祁觉民任处长，原绥西站主任史秉义为副处长，魏尚礼为秘书。该处设总务、情报、交通三个科。将包头据点和归绥市区改为两个工作组，其它未变。调

查处也迁往包头与绥远办事处合署办公。

军统特务方面，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华北区亦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又派副区长田峻赴包头整顿特工，布置潜伏。敌人为了便于特务活动，伪国防部委任绥远军统特务头子、绥远站站长赵思武为骑兵整编第十二旅副旅长（旅长为鄂友三），在包头设立“骑十二旅副旅长办事处”，作为军统的“华北区”特务活动的指挥中心。绥远地区和聚集包头的一些军统特务分子，在赵思武的统一指挥下，很快分别潜伏到绥远国民党各部队，以军职身份为掩护，从事反对绥远和平起义的各种破坏活动。

六、组织地下反共军，妄图开展 所谓“敌后游击”战争

特务头子张庆恩在整顿特工开展工作的同时，派遣特务分子、反动军政官吏到津、京、张等解放区发展“地下军”，开展所谓“敌后游击战争”，妄图配合在绥远的特工，破坏绥远和平解放。张庆恩从穗来绥时，带来国民党少将师长郭跻堂。郭某是在张家口战役被我俘获释放后逃到广东的，来绥前参加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召开的“华北游击会议”，到绥后就任第九兵团督导主任，实则系阎锡山电委的“察绥边区游击总司令”。郭跻堂接任后，大肆进行活动，刻制印章，颁发委任，经他委任的有察南、察晋、察冀、察热四个边区的纵队司令，有察南、察北、绥南、绥蒙四个边区的纵队长。其间，郭电报阎锡山，请领经费银洋四千元。

张庆恩在包头活动期间，也相继委任了郭旭、张天聪、李本笃、袁世龙等为反共地下军的司令、总指挥、总队长等，派往各

地发展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各反共地下军均自刻印章、颁发委任状，委任各自的地下反共官兵。如郭灿被张庆恩委为“冀热辽边区挺进军总司令”后，曾下令委任一名纵队司令、一名方面军总指挥、一名纵队长，并在津、京、冀等地区发展反动武装，还与北京的反革命组织“青年救国军”第三师勾结在一起，到处散发反动宣传品，开展反革命活动。又如张天聪原系国民党察哈尔省保安大队长、骑兵纵队长，曾因顽抗我军被击伤，逃来绥远后又积极与张庆恩挂钩，被任为“察哈尔省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他受命后从张庆恩处领得米票三万斤，并变卖自己财物，充作活动经费，到处网罗旧部，拉拢反动分子，组织起反动武装五个游击大队和一个特务大队，计划在张北、商都、康保、丰宁和乌珠穆沁旗等地区，组建一万两千人的“敌后游击队”，待机而动，妄图配合美蒋反共作战，卷土重来。上述李本笃、孙翔臣、袁世龙等等，有的是老牌中统特务，解放前长期以天主教神甫为掩护，从事特务活动，解放后逃来绥远，混水摸鱼，组织反动武装；有的是反动军官，“投诚”后又潜逃绥远，纠集一些反动分子，企图东山再起，与我进行顽抗。

总之，上述这些敌特分子和亡命之徒，是一批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他们，连同他们组织的什么地下反共等等，在绥远“九·一九”起义后，不管如何狡猾，如何隐蔽，化整为零，分散潜伏，都难逃人民的法网，在不长的时间内就相继被我公安机关侦破消灭。

七、垂死挣扎，千方百计阻挠起义；阴谋未逞，张庆恩等最后落得铩羽而逃

一九四九年八月下旬，毛主席、周总理委托傅作义先生并偕

同邓宝珊将军来绥，协助董其武将军发动起义，他们带着毛主席不用兵解放绥远的亲笔信和党中央给予的大批慰问金，到部队进行慰问，宣讲党的起义政策，发动与促进绥远早日和平解放。

中统华北特务头子张庆恩得悉傅、邓两将军来绥的消息后，于八月二十日携带其事先拟就的阻挠绥远起义的“和平建议书”，到傅作义先生驻地美岱召，表示忠心进谏。傅作义先生到包头后，他又几次进行游说。张庆恩看到他的建议未见成效，绥远起义的局势日趋明朗化，于是又在一部分绥远军政首要人员中加紧活动。一面命王国璋、杜品山起草所谓“全面和谈”的《和平意见书》，交由骑兵第十二旅旅长鄂友三向傅作义呈递，一面又发动以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为首的党、政、军、民各界反对和平起义的签名请愿运动，向傅作义先生及董其武将军施加压力。然而，此时此刻，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和平起义已成必然。张庆恩等的鬼蜮伎俩只能是枉费心机。然而敌人总是不见黄河心不死，他一计不成，又施一计，乃急电国民党政府请蒋亲来包头劝说傅作义和董其武，以阻止绥远的和平解放。如蒋不能亲来，就请蒋电邀傅作义赴穗磋商国事。又电请阎锡山、谷正鼎等迅速来电劝阻绥远起义，并献策请傅作义先生的友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姚大海、张晴园速来包头，敦劝傅作义回归助蒋。

国民党政府得悉绥远情况，大耍两面手法。一面密电潜伏在刘万春一一一军的军统特务头子赵思武，对傅作义就地刺杀；一面又电邀傅作义去穗同蒋面商一切。同时又派徐永昌（当时为国防部长）携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来包，请傅先生赴穗共商与我进行所谓全国和谈问题，劝阻绥远不要单独起义。但傅作义先生深明大义，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坚持推动绥远走向和平解放。于是在董其武将军率领下举行了光荣的“九·一九”起义。

绥远起义的前夕，正当绥远军政首脑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人物酝酿并签署起义通电之际，在包头的特务头子张庆恩，急急忙忙地指定李崑生代理其办事处主任的职务，并对绥远解放后的特务活动进行部署：指令办事处事务员马奋成潜伏在包头，作为特务活动的总枢纽，利用车站前街正大茶庄李仲荫为特务们的接头转手人；宣布魏尚礼为绥远调查处代理处长，胡尚儒为代理副处长。并给王之铸、郭培成等五人配备二百瓦电台一部，潜伏在刘万春的一一一军军部；胡尚儒、于乐渊等六人配备十五瓦电台一部，潜伏在张朴的三一九师师部。张庆荣（又名张茂堂，系张庆恩之兄）、李守魏、单不移等若干特工人员，有的携带电台，有的持张庆恩介绍，有的凭借关系，亦分别潜入各部队。其余的一些特务头头，如祁觉民、魏纯美、杜品山等，以身份业已公开不便留绥为由同张庆恩一起随着徐永昌的飞机逃命去了。

至此，在绥远地区曾明目张胆公开活动，千方百计破坏起义的国民党特务头子们，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只落得个苟全性命于一时，仓惶铍羽而逃了。

绥远“九·一九”起义至一九五一年初的敌我斗争概况

绥远“九·一九”起义，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阻挠和破坏绥远和平解放的彻底失败。但完整地实现毛主席提出的“绥远方式”仍有许多困难。正如毛主席所预料和指出的：“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的。”果然，那些因绥远起义而一时消声敛迹的老牌中、军统特务，由解放区流散而来的特务分子，以及各地逃亡而来的反动官吏，他们互相勾结，利用

绥远地区幅员辽阔、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和山区易于隐蔽等条件，在“九·一九”起义之后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特别是在美帝发动侵朝战争后，更加猖狂起来。他们破坏活动的触角深入到我人民新绥远的生产建设、减租反霸和废保建政等各个方面，甚至阻挠和破坏起义部队实现解放军化，杀害我政治工作干部，等等。兹将其反革命罪行概述如下。

一、组织匪特指挥中心——华北、东北、西北党政军联合工作指导委员会

中统绥远办事处主任张庆恩逃渝时，将绥远办事处的工作交由李崑生代理。李崑生接手后的办事处潜伏在陕坝（杭锦后旗所在地），活动更加隐蔽。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张庆恩密电指示李崑生，迅速与各调查处负责人磋商，设法网罗国民党军政要员，组建“华北党政军联合工作指导委员会”，统一指挥开展工作。李崑生接电后，于一九五〇年元月十九日亲赴百川堡（现临河县新华公社），与田树梅（原阎锡山部中将、狼山屯垦办事处坐办）、崔正春（原系保定讲武堂教官，阎锡山曾是他的门生后，任绥远省军官教导团、教育长、绥远红万字会总会长）、肖应轩（原阎锡山部军长，太原面临解放时到南京，南京解放时经北京潜来绥远河套，以行商为掩护进行活动）等，共同密议数日，成立了“华北、东北、西北党政军联合工作指导委员会”（下称“指委会”），草拟了工作章程、计划，电呈蒋介石中央及其特务机关。其组成人员为：主任委员张庆恩，副主任委员田树梅、崔正春，书记长李崑生，顾问肖应轩，委员张朴、张茂堂、张副元、王之铸、王富国、王元令

刘钊、马继援、朱霁青等。这些人有的是中、军统特务分子，还有个别是起义后被改编部队的师、团长。

“指委会”设在陕坝，内设六个组，外设五个区。内六组的负责人分别是：调查组长胡尚儒，军事组长单不移，政治组长渠枝荣，党务组长刘钊，联络组长张茂堂，总务组长贾戊午。外五区的负责人是：三山边区（阴山、狼山、后山）特派员郑文淮，太行边区（山西、河北、察哈尔）特派员梁俭，大河边区（甘肃、宁夏、陕西）特派员李信通，辽河边区（辽宁、热河）特派员李翰周。主要任务：（一）在我内部培养发展反革命势力，指导已潜伏下来的特务进行活动；（二）策动起义部队哗变，收集流亡游散的官兵，组织发展匪特武装；（三）联络我解放区各界“知名人士”，发动反革命武装暴动。根据上述任务，敌特采取了普遍发展、单线领导、统一指挥、分散活动等办法，以图推动反革命破坏工作。

根据敌特活动情况，我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和灵活多样的措施。用统一研究，分别部署，掌握全，面抓住重点，打进去、拉出来，适时进攻，分头击破的办法，对敌人一网打尽。

“指委会”一案侦破后，我们除将首要案犯李崑生、田树梅、崔正春、张朴、张茂堂等人解送中央公安部审处外，其他有关案犯大部在剿匪肃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二、策动起义部队叛变，破坏实现解放军化

在实现部队解放军化过程中，我党首先向起义部队派政治工作干部，师、团、营、连均增设了政委、教导员和指导员。对此，潜隐在部队内的各种特务，感到对他们的存在威胁很大，于

是千方百计勾结反动军官，极力阻挠破坏，其主要手段是策反部队叛变。

据统计，从“九·一九”起义到一九五〇年底，原绥远起义部队在特务直接策划和间接影响下，先后发生了六十四起哗变叛乱事件，共约四千余人。叛变事件发生在驻防河套地区的一一师张朴部（中统、阎特主要潜伏在该部）和驻防后山一带的鄂友三骑四师（军统特务主要潜伏在该部）所属少数团、营、连、排中。

一一一师副师长庞茂青，曾企图率全师叛变未遂，拉出一个团叛离了部队。庞的叛变主要是由于“指委会”调查组长胡尚儒的策划所致。胡是“九·一九”起义时潜入该师的，主要负责与国民党中央特务保持电台联系，直至国民党中央流窜台湾，始告中断。我军解放全国胜利在即，胡尚儒自感在部队中难以长期潜伏，便积极策动部队叛变。原企图促使庞茂青拉出一个师的武装，然后再继续扩大反革命的力量，在河套及乌拉山一带开展反革命游击活动，以此与我进行周旋，等待国民党的卷土重来。庞茂青系反动军官，与师长张朴的反革命思想相投，野心很大，想独揽大权，趁着张朴不在部队的时机，在胡尚儒等策划下，于一九五〇年二月十日策动了部队哗变事件。哗变后自立番号为“飞龙部队”，庞茂青自任司令，并宣布官兵各晋一级。在部队叛变的第三天，我剿匪部队进行追歼时，庞被其部下刺杀。叛变部队溃逃大半，仅有营长董钊率连长梁月明、排长尹耀臣等七十余人，分三路突围逃命。最后，董钊率残余叛匪四十余人窜至河套投奔了齐敬德的反革命叛乱武装——“华北民众反共自卫救国军”，充任了伪七十一师副师长职务，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

起义后改编为骑兵第四师的鄂友三部（起义前为整编骑兵第十二旅，起义后阎锡山以国民党政府的名义，委任鄂为热河省主席兼骑兵司令。崔正春亦于一九五〇年七月发给鄂友三委任状，委令鄂为华北义勇军挺进军司令兼察哈尔省主席），对我派去的政工干部，虚假应付，明一套暗一套，背地里却以传见下级军官为名，煽动部队叛变。他和二团团团长毕宝熙说：“五六月全师有行动，你们团要走在前面”。随之毕宝熙于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发动了“五·八”叛变，杀害我团政治委员等十余名干部，然后上山为匪。这一事件发生后，鄂友三在其某部讲话时又说“五·一三”要全师叛变，杀死共产党的所有政工干部”。接着该师四团团团长张汉璉又发动了“五·一二”叛变事件，残杀了团政治处主任彭志超等干部八名，由李银率领叛匪盘踞在包头市附近，大肆抢劫，并绑走了商会会长，还企图大举进攻包头。鄂友三有时以剿匪为名，暗中却通匪共谋反革命活动。如捕获了叛匪李银，进行密谋谈话后，随即放走，使其继续为非作歹。鄂所部连长高如岳，借追叛匪为名，带着队伍迳奔察哈尔省，声称是蒋帮中央前卫军。沿途抓兵抢马，造谣惑众，煽动地主反攻倒算。鄂部叛变事件屡有发生，叛变后除奔向察哈尔的一小部分兵力，妄图组织土匪、扩充武装、搞游击活动外，余均投于军统特务“中国人民反共抗苏自卫救国军晋察绥陕总司令”郑殿卿的麾下，从事反革命“游击活动”。

绥远“九·一九”起义后，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胡尚儒潜伏于张朴师所带的十五瓦电台，经中统特务机关编为六号台，潜伏于绥远的特务与国民党中央以此台进行联系，计来往通电三十余次。国民党残余由渝逃台以后，这部电台与国民党中央的联系始告中断。此后，敌特又不断派人通过香港与台湾进行联系。一

九五〇年七月×××先后两次密召某部辎重营长李蔚浩谈话，布置其去台联系的任务：（一）向张庆恩汇报绥远现状；（二）向张索要二百万元作为活动经费和眷属生活费；（三）听取台湾指示，确定联系办法，并请台湾当局传达国内外形势。联系情况要李由台返回后向他汇报。李蔚浩接受任务后于七月二十九日启程出发，八月八日到香港，寓于港特中统机关招待所。经与台湾方面联系，等了十七天以后，特务头子张庆恩由台至港，听了李蔚浩的汇报，向李讲了所谓的“形势”。指示×××要切实掌握好部队，待机反正，起码要等到明年秋后再行动，当前不要乱拉队伍哗变。张交李带回一本电报密码，定×××化名为杨庆庄，并当面委任李为通讯主任，决定与台湾的联系人为刘钊，化名刘子安。张庆恩还交李给×××带回东西一包，信一封，书一本，一百四十万元经费。李蔚浩返抵包头时正值×××赴北京。李又追至北京找×××。我政府于十一月十一日将该案主要罪犯分别扣捕归案。

三、叛军啸聚为匪，祸害地方， 进行所谓“敌后游击”

一些被叛匪策动哗变的起义部队，窜集河套、后山和伊盟等地区，与当地游散股匪汇合，猖狂地进行抢掠、杀人等各种罪恶活动。

在河套地区，主要以原伪山西省干委会主任齐敬德（阎锡山系的特务，太原解放后窜来绥远）为首。齐敬德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间在百川堡汇集由山西流亡来的一些反动军官，秘密组织了“华北民众反共自卫救国同盟会”（以下简称同盟会），阎锡山为盟主，田树梅为代盟主，齐自命为副盟主。苏宪臣、张选、王元

龄等十二人为委员。同盟会设立组织、秘书、总务、参情、训练等五组，并有两个军官队（太原解放后流散来绥的国民党军官二百四十余人组成）。同盟会发展会员的主要对象是起义部队和军官队，以一人发展三人、三人再发展九人的滚雪球方式扩大组织。会员入会时，跪在关公像前，叩头宣誓，不泄密，不出卖，表示誓死忠于盟主。庞茂青在一九五〇年二月叛变后，齐敬德亦将其同盟会成员和军官队拉出，转入河套后草地活动。继之，从起义部队中先后叛变出来的股匪，亦相继投齐。至一九五〇年春末夏初先后纠集了张希尧（外号张疤子）、董判、白德照（宝贵廷的参谋）、张宝音、包喜才、王如意、何鸿荣、阎占林等十数股土匪，于狼山县太阳庙在齐敬德、马壮等的共谋下，组织了叛匪统一的指挥机构，番号为“华北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并拟定由田树梅为总司令，齐敬德为政治主任兼秘书长，马壮为参谋长。司令部设有政工、参谋、军需、副官等处，还有动工、宣慰两个团，一个警卫营，一个纪律组，以及下辖一个师、三个旅（九个团）。为扩充匪势，他们到处网罗流散土匪、地痞、流氓和地主武装，先后集结五百余人。这股匪特抢劫杀人，无恶不作。他们对狼山县奋斗乡军耕农场的一次抢劫，不仅抢走枪支、马匹和棉布等大批武器和财物，还当场杀害了我工作人员三名。在一次抢粮中，杀害了粮库的工作人员，抢走存粮五十八车，计两万斤。七月间他们纠集匪徒攻打宴江县，砸毁达拉特旗办事处，打死我工作人员二名，无辜群众四名，枪杀了庆云乡乡长。就连一些宗教职业者喇嘛，遇上这些匪徒也难逃活命。叛匪的猖狂活动，在狼山县三柜堡遭到我毕力格巴图尔同志率领的骑四师的打击，于是又逃窜到后草地进行骚扰破坏。一九五〇年十月，窜返李柜堡行抢时，遭到我剿匪部队歼灭性的打击，匪首齐敬德

被击毙，至此基本上剿灭了流窜河套地区的叛匪。

在后山一带，盘踞着以郑殿卿为首的所谓“中国人民反共抗苏自卫救国军”，进行反革命活动。郑殿卿原名郑应举，抗日战争时期即参加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九·一九”起义之前，郑曾任中统绥远调查室（后为党通室、调查处）绥远分区主任，在后山一带以其青帮头子的身分从事特务活动。绥远起义前夕，郑接受张庆恩的部署继续在后山一带潜伏活动。郑在后山能够立足活动，主要是利用青帮身分和安清会长的老底子，以收徒弟的方式，组织和扩充武装队伍，组建伪政权，任命县、区、乡长，设立兵站、粮库，建立“地传网”，还设立了“中国人民反共抗苏自卫救国军晋察绥陕总司令部”，这个总司令部以杨爱源为总司令，潘秀仁为绥远省主席兼副司令，张庆恩为参谋长，郑自任政治特派员。总司令部刻有印鉴，制做白布的委任状，大批委任官职。共有一个绥远司令部，九个直属团，一个直属骑兵支队，二个大队，七个地区游击队。土匪队伍主要是鄂友三部副师长张汉庭为首的各股叛军，又纠合起沙金、武德坤、霍四娃等地方股匪，还有从郑殿卿的青帮分子中发展的人员，共一千二百余人。这帮匪徒，到处骚扰破坏，抢劫财物，奸淫妇女，杀害群众，疯狂一时。他们还明目张胆地通过其任命的伪区乡长要衣物，要烟土，勒索群众。仅以纳尔胡同一带两个保的地区统计，在一九五〇年八月至十二月期间，就有四十多名妇女被奸污。有时竟至将全村妇女集中，由土匪头目按官职大小分配，进行轮奸。他们糟塌残害群众，惨无人道，穷凶极恶，在纳尔胡同一次就勒死男女群众七人。乌兰花地区被他们残害的就有二十余人。一九四九年底，我剿匪部队对该匪进行围剿，匪首郑殿卿被我击毙。除极少数逃遁外，大部分被我俘获。至此，在后山活动

的土匪，就基本上被我肃清了。

建立特务据点，内外勾结，策动叛乱哗变，是敌特活动的惯用手段。中统绥远调查处代理副处长、“指委会”调查组长胡尚儒等，自从与台湾电台联系中断和策划庞茂青的叛变失败后，即与弓效谦、冯一平等入潜往安北县。一九五〇年三月下旬，他们选择了山峦绵亘、蒙汉杂居、易于隐蔽的东公旗（现乌拉特前旗的余太区），并找到了起义后留用的安北县财政科长程志华、余太区闵福志和由原国民党警察局改编的保安队长杨世勋等，商定组织了中统绥远地区余太据点，由胡尚儒亲自负责，杨世勋为军事组长，闵福志、弓效谦为政治组长，冯一平为联络组长，程志华为组训组长。以上程、杨、闵三人均由胡尚儒发展为中统特务，并书面报告了李崑生。他们还拟定了行动计划，在争取安全潜伏的条件下，军事上以杨世勋的百余名保安队员为基础，以所谓“寄生敌体为生存”的方式，拉拢地方零散土匪，广泛联系旧军人，扩大匪特反革命游击武装。再与德王、宝贵廷进行联系，求得支持，待机活动，以期实现“响应反攻，扩大力量”的妄想。胡尚儒存身和隐蔽在余太合作社进行指挥，弓效谦、冯一平以小商贩为掩护，游窜城乡各地进行活动。一九五〇年夏，胡匪策划了安北叛乱事件，程志华、杨世勋等举行了武装叛变，杀害了我安北县县长。这次叛乱事件发生后，余太据点解体，胡尚儒则游窜于河套地区，于一九五〇年十月被我缉捕归案。

在伊克昭盟地区的股匪主要有：陕北的老土匪头子张廷之，原榆林地区国民党部队拒不参加起义而充当匪首的张世华、高怀雄，乌审旗的贺永禄、奇正山、大巴图、小巴图，鄂托克旗的刘宝才、奇门肯，城川的钦克，等等。这些股匪互相勾结，为非作歹，遥相呼应，独霸一方，拒不向人民投降。绥远“九·一九”

起义后，张廷之从包头拉了一帮人到伊盟，纠合张世华匪部，又勾结乌审旗的贺永禄、大小巴图等匪部，麇集上千名骑匪，盘踞乌审旗一带，兴风作浪。与此同时，奇门肯等股匪也在鄂托克旗遥相呼应，骚扰破坏，残杀我干部和群众。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原乌审旗的协理扎萨克、保安司令奇山，在东乌审旗的一次叛变中，抓去我干部、士兵数十人。这次事件中，我六名县团级干部被害牺牲。绥远省军区派吴广义、寒峰、陈赤虹等同志率骑五师到伊盟剿匪，在伊盟支队的密切配合下，不到半年时间即将这股穷凶极恶的土匪彻底消灭了。活捉了鄂托克旗匪首之一的奇门肯，其他股匪头目张廷之等，在一九五一年镇反中一一落网。这批罪大恶极的匪首。除奇正山病死在监狱外，其余包括奇玉山在内，均被处决正法。

四、借水养鱼，组织地下军，企图东山再起

绥远“九·一九”起义后，潜伏下来的中统、军统、阎系特务活动的主要手段之一是组织地下敌特武装。在美帝侵朝战争爆发之后，这种活动愈加猖狂。

“华北剿共军绥远骑兵部队司令”高理亭，是老牌军统特务。早在一九三四年即加入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并在庐山受过专门训练。绥远部队起义前，他任骑兵整编十三旅旅长，在酝酿起义中就极力阻挠破坏，后因大势所迫遂参加了起义。起义后任改编的三十六军一〇六师副师长。他利用此合法地位，“借水养鱼，待机再起”，秘密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一九五〇年三月间，他伙同陈国珍等，在萨拉齐县伴元沟，以开设大德炭窑、赛大坝瓷窑为掩护，纠集反动军官、土匪、流氓等大批反动分子，计划

组织武装“护路队”，以此为基础开展特务活动。同时，还利用其窃得的军职，供给军统特务慕幼声一部分武器，策动武装叛变。同年四月间，他派敌特张飞生潜赴香港，通过军统特务头子高子欣与台湾取得联系，被任命为“华北剿共军绥远骑兵司令”。高理亭受任后分派了司令、参谋长和政治、军需等四个主任和八个团长以及特务连长等，大肆扩充力量，策划叛乱。嗣后该匪等慑于我公安机关之威势，唯恐阴谋暴露，乃率领匪伙，携带武器，拉出炭窑，窜至后山，公开与我顽抗，直至被我歼灭为止。

“华北反共义勇军”是崔正春组织的。崔早年在保定讲武堂当过教官，山西、绥远地区部队的军官多有受其训者。解放前历充山西、绥远省军官教导团教育长，五原、临河县长，临河县参议长，绥远红万字会总会长等职。绥远地区起义后，崔正春以宗教职业为掩护，进行反革命活动，曾与李崑生等组织“华北、东北、西北党政军联合工作指导委员会”，并担任副主任。崔在组织地下军的活动中，阎锡山电委他为“华北义勇军”总司令。崔奉命后，勾结申志谦等阴谋策划，成立总司令部，分设军事、政治、党务、总务等组，委任负责人，刻制印鉴，发送委任状，先后派出四十余人与原国民党军政官吏进行联络。委任鄂友三为“华北反共义勇军挺进军”司令兼察哈尔省主席，委任了第一、二、七路三个总指挥，五个纵队长，一个先遣纵队长，两个独立团长，四个支队长，一个保安队长等等。崔正春狂妄地电告阎锡山：已联系妥军队数万人，准备迎接国军，光复绥包，直捣幽燕。崔还与李崑生、田树梅分工负责策反部队暴动，李负责张朴师，田负责张凌云团，崔负责陈国善营，计划于一九五〇年旧历正月十五日，指挥上述部队和所有发展的匪徒，统一进行暴动，他们的这一阴谋未能得逞。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崔认为时

机已到，复策划于旧历八月十五日统一举行暴动。然而他们的活动早已为我所掌握，便先于他们的行动一步，于八月初四日将崔等捕获归案，彻底粉碎了他们的阴谋。

老牌中统特务李鸿钧，原任北平特工行动队队长，北平解放后跑到绥远，充当大特务张庆恩的侍卫。绥远“九·一九”起义后，潜伏在后山地区，以小商贩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他自称国民党中央“华北特派员”兼“华北反共抗苏调查团团长”，游窜各地，在机关、部队、企业和农村发展调查团成员四十余人。组织了调查团总团部，自任团长，委派了秘书、督察等特工人员。总团部设情报、人事、经济三科和一个华北游击总队（下设六个纵队），并在五原、临河、宴江设立三个联络站和临河一个通讯总站。还设立一个绥远分团，分团又拟设情报、行动、视察、督导、通讯、宣传、经济和医药等十二个组，有的已委派了组长或组员。该匪特妄图通过所谓“调查”，策动起义部队叛变，不断壮大组织，与人民为敌。该匪特在五至八月间活动最为嚣张，发展到公开地行抢杀人。最后，还是被我破获，彻底消灭。

还有所谓“铁血青年团”，是以孙士林为首组织的。孙原属阎系特工，曾受阎特的专门训练，充当过队长、营长、游击队长和警察局长等职务。太原解放后，潜来绥远，在绥远起义前夕曾组织“铁血兄弟反共救国同盟”，在归绥地区发展成员四十余人，曾企图到大青山为匪。随山西流亡来绥的军官去河套狼山，潜伏在三三三团充任参谋之职，借以掩护活动。一九五〇年二月孙将“铁血兄弟反共救国军”改组为“铁血青年团”，孙自任总书记，制订了行动纲领及奋斗口号，刻制图章印信，印发反动宣传品，大肆宣传其反动宗旨。还拟在狼山、临河、五原等地设立三个支团部，以反动分子为对象发展组织，计划发展到五百人以

上，便召开代表大会，讨论组建“中华青年党”问题，发展到一千人以上，即正式成立其党。至一九五〇年十月六日孙士林被捕之时止，该组织已发展成员六十余人。

总之，如上所述，尽管敌特组织名目繁多，行动诡秘狡猾，但都没有逃脱我侦察视线，被紧紧地控制在我掌握之中，随着剿匪肃特运动的深入，皆被我一一破获归案。

后 记

上所述，可见解放之初的绥远局面相当复杂。因此，对敌斗争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敌特分子虽有少数人声明登记，但大部分钻入政府、机关、部队和学校，或潜伏于城市，或隐匿于乡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尚有一定的活动能量。他们与各地流散来绥的反动军政官吏，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互通声息，交相勾结，狼狈为奸，无孔不入，对我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有针对性的破坏和捣乱。我们要团结，匪特则大肆造谣破坏，我们要安定社会秩序，匪特则纠集散兵游勇，组织地主武装，抢劫奸杀，危害群众；我们要实现绥远解放区化、部队解放军化。匪特则千方百计地策反起义部队叛变，盘踞一方，占山为王，妄图建立根据地，以游击战的方式，进行各种骚扰活动。他们的反革命破坏，使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严重的损失。一九五〇年内，仅据有证可查的统计，我党政军干部被匪特残害致死的就有四百一十人，致伤致残者五十余人，被残害致死的群众三百余人，被奸污的妇女数百人，被劫案件六百余起。如此种种，不胜枚举。

党中央、毛主席在绥远解放后，及时地提出了“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的伟大指示。一九五〇年，绥远党政军民，各族各界，以这一指示为指南，以“团结改造，剿匪肃特，恢复生产”为重点，在省委和各级党委的有力领导之下，紧紧依靠广大群众，地方公安机关大力加强侦察破案工作。密切配合军队的剿匪斗争，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剿匪肃特的政治运动。全年我解放军共计歼灭叛匪三千一百六十一人，击毙五百六十三人，击伤八十九人，俘虏一千一百人，匪徒投降一千零八十六人，自首三百三十人。缴获机枪三十三挺，长枪一千五百九十六支，短枪三百一十五支，子弹一万五千零四十八发，战马五百五十一匹，牲畜七百三十六头(匹)。我公安机关共破获匪特组织一一“委员会”、“办事处”、“潜伏组”、“联络组”、“反共军”、“救国军”、“自卫军”、“义勇军”、“同盟会”、“调查团”等各种反革命组织三十多个；逮捕特务骨干分子六百余人，投案自首的骨干分子二百余人，缴获特工电台四十一部，机枪两挺，短枪七十九支，长枪一百六十五支，查出一大批其它反革命罪证。

通过一年来的剿匪肃特运动，基本上肃清了股匪叛乱，破获了大批特务组织，有力地打击了匪特的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从而保卫了人民的新绥远。保卫了当时党在绥远地区中心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部队解放军化的要求，于一九五一年一月，起义部队东调河北，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并授予志愿军之番号开赴朝鲜，光荣地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前线作战。一年多的剿匪肃特斗争的重大胜利，为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双十”指示，开展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奠定了基础。为绥远省进一步实现地方解放区化，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国民经济，

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等工作，创造了一个安定团结的良好社会局面。

一九八二年十月于呼和浩特

国民党CC中统在绥西等地的罪恶活动

董 叔 明

一、CC中统派张庆恩为驻傅作义 辖区的总代表

在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并兼任绥远省政府主席，率部驻守原绥远省西部河套地区，与日伪军在包头以西之西山咀地带两相对峙。

这时，蒋介石为从政治上拉拢和利用傅作义反共，特命中统派遣张庆恩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绥远调查统计室主任，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书记长并代理主任委员。这实际是由张庆恩主持省党部的工作，并通过绥远省党政军联合反共的特种汇报，代行傅作义的主任委员职权。张庆恩还策划成立特务组织“保卫委员会”，拥傅作义为主委，而实际由张庆恩代傅指挥。

张庆恩别号永铭，化名很多（在陕北时期化名是傅忠，签署秘密文件时使用），原籍山西省徐沟县人。曾先后在太原的平民中学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在山西最早加入CC系的反共骨干之一。十年内战时期，在山西替右派头子戴傅贤、CC头子“二陈”（陈立夫、

收陈果夫)、收罗黑干将,掀起山西反共浪潮。西安事变前后,日本势力侵入华北、平津,要求国民党停止华北的党务活动。CC头子“二陈”委派张庆恩为国民党CC系地下平津工作团主任,勾结投日的国民党CC分子,继续进行党、特活动。嗣被日本宪兵队捕押入狱,经各方面CC分子营救出狱,并掩护其逃离天津回到重庆。一九三八年冬,中统总局派张庆恩为中统局专员,兼中统局重庆实验区副区长(市级负责人),指挥宪特积极破坏重庆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不久,“二陈”为了适应制造反共新高潮的需要,派张庆恩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傅作义辖区的总代表,插手傅系,策划反共,同时统一领导绥远各界党政军高于中的CC中统分子,推进绥西反共形势之发展。

一九四四年后,张庆恩又充当十二战区党政总队长、保卫工作总队长、保卫委员会代主任委员、绥远省联合秘书处(简称联秘书处;又名特工指导处,简称特指处)处长。这些组织的人事、经费由傅作义批准,业务归张庆恩领导。在这一阶段成立的防奸委员会、心理作战委员会、统一建设协会、西北建设协会(邦会反共组织)、张家口侦察汇报会议、察干团技术训练班和纪律科,也主要是由张庆恩策划、建议、直接或间接领导的。由于傅作义当时的势力范围在察绥,张庆恩直接、间接领导的CC中统系及其它特务组织,主要活动范围也是在察绥两省之内。

通过上述组织系统,傅作义辖区的军队,省、市、县各级党、政、军机关,都要执行以傅作义名义发布的“绥远省联合反共特种汇报会议”的各种决议和命令。张庆恩兼任联秘书处(或特指处)处长,这就更能随心所欲地推行各种反共活动,搜集有关中共的情报,制造反共事件,破坏中共绥西地下组织和迫害地下工作人员。

笔者当时在绥远省党部代理过人事股主任，充任过特指处的外事科长等，所以对张庆恩如何插手傅系并怂恿、策划反共的一些内幕，比较知其底细。

二、张庆恩插手傅系的任务和工作方法

张庆恩及CC中统组织系统，在傅作义辖区的任务基本上是监视傅作义及所属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员的政治言论、行动倾向（与中共的关系如何），据以向蒋介石、二陈和代中统局长徐恩曾等作密报。

其次是利用傅作义的组织系统，推行国民党中央的反共政策。张庆恩为博得傅作义的欢心，投其所好，伪装忠顺，谦和服从，替傅吹嘘，对国民党中央蒋、陈和傅作义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张庆恩为取得傅作义的喜悦，还特别吹捧傅作义，无论是对下指示、谈话，或者是向蒋介石、“二陈”汇报绥远省反共情报，总是尽力吹捧傅如何忠实地执行反共方针、政策和密令，对外也是大力宣扬傅作义治军、理政的成绩。还特意把蒋介石、“二陈”及中统局长徐恩曾的一些密电呈送傅作义看，请求傅下令执行，以示对傅尊重。其实，张庆恩从一九四〇年到绥西陕坝任职以后，从来没有间断使用绥室的专用电台，向蒋介石和“二陈”密电报告他监视傅系的情况。

张庆恩在绥西河套地区进行反共活动，一方面是镇压、搜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人员和国民党内的一切抗日民主力量。对此，张庆恩指挥CC中统系骨干，配合傅系军警，在绥西、伊盟、榆林等地，曾侦捕多批中共地下人员以及“嫌疑分子”。一方面是利用鄂友三等部，在大青山一带与八路军制造摩擦，进行袭

扰，还派遣特务王明中、钱刚等建立策反据点，企图瓦解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三、CC中统核心组织特指处，改组为党政总队

一九四四年年底左右，以张庆恩为首的特指处，改组为第八战区（后改为十二战区）党政总队。这是一个在中统特务指挥下的武装性质的组织，进行反共的侦察、情报、策反、密捕，管训等活动。

党政总队以张庆恩为总队长，柴玉峰、李玉光为副总队长。以下，主任秘书王兰田，指导科长王黎生，外事科长董叔明，研究科长杨格非，总务科长樊毓泗。

党政总队所属陕北据点，在榆林，主任祁继先（别号觉民），对外以绥远省参议员、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驻榆林办事处代处长身份作掩护。其任务是破坏中共陕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策诱陕北八路军及地方人民武装叛变，侦察中共陕甘宁边区各种情报。晋西北据点，设于山西河曲、保德一带，主任先为陈元夫，后为刘毅佐。其任务是，刘毅佐常住河曲一带，以侦察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报为主；陈元夫则是流动于河曲、偏关、大同之间，侦察中共晋北、晋绥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报。伊克昭盟十里长滩据点，主任鲁凤昌，其任务是侦察中共伊盟和晋绥边境关于八路军和地方人民武装的情报，并作策反工作。大青山据点，主任是王明中，以破坏中共大青山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主要任务。

党政总队还在日伪区的一些地方建立据点，如在包头设立交通据点，负责人王开运，以经商为掩护，以转送地下国民党绥东、绥北、绥中南的情报为主要任务。绥东丰镇据点，基础是省党

部委员陈国兴为首的第五党务督导区地下丰镇县党部，主任由贺风午（书记）担任，长期潜伏，侦察绥东日伪军动态及中共晋绥敌后抗日武装情报为主要任务。察哈尔宣化据点，主任范宝善，其主要任务是侦察日伪蒙疆统治情况及策动伪蒙军王英、李守信部队向国民党军反正。除上述据点外，党政总队还在北平设有地下平津工作团，以何根生、何焕声为正副主任，主要任务是搜集日伪军政经济情报及中共地下组织活动情况，并策动一些当汉奸的军政人员投降傅作义部。

这个“党政总队”及其所属组织，从一九四六年一月起，一律撤消建制。

四、CC中统控制下的“集中营”—— “战青团”、“干训队”、“青训队”

“绥远省战青团”，是国民党绥远省战时青年训导团的简称。据说，这个组织原是为收容日伪区逃到国统区抗日前线的青年，给予学习和安置就业。而在张庆恩领导下，却使它成为国民党绥远省的“集中营”，专门对付绥境被捕的中共人员，施行法西斯专政，进行军事管训。

“战青团”主任一直是张庆恩自兼，副主任则是由张庆恩指定的CC中统高干，如张忠一、陈国兴、王兰田、魏纯美等担任。担任管训的干部，一般是CC中统骨干分子。政治课教官都是聘请绥远省党、政、军的高干，这些人一般都与CC中统有一定的联系。政治课的内容，主要是国民党反动派篡改的孙中山先生的著作——三民主义、总理遗教，还有蒋介石的谬论《总裁言行》、

国民党中宣部编印的诬蔑中共、八路军、新四军的反动宣传材料和“傅作义的言行”、世界各国法西斯反共理论摘编等等。

“战青团”周围遍布侦察总队武装岗哨，戒备森严，被管训人员的生活是困苦的囚徒生活，根本没有人身自由，常常吃不饱饭，冬天棉衣又旧又破难以御寒，精神、肉体都受到折磨。政治训导人员对学员管训，比对囚徒还残暴。战青团的人事、经费、课程、教官等等，都必须由张庆恩拟定计划，签呈傅作义批准实行。所谓中共的情报资料以及吸收中共叛徒加入中统组织，则必须由张庆恩核定后，报中统局备案。

“战青团”设有总干事，常驻该团主持训导工作，对学员灌输反动思想，考核学员言行和思想动态。训导的目的是企图通过政治管训，变成他们所用的反动分子。事实上有不少学员结业后，摆脱不了他们的控制，当了张庆恩手下的党、政、警、特骨干，加入了CC中统组织。中统绥室、特指处的骨干至少有三分之一是该团结业学员。

一九四五年六、七月间，张庆恩签请傅作义批准将“战青团”改组成党政总队干训班，但因不久日本宣布投降，未实现改组计划。以后，傅作义部势力逐渐向察哈尔省发展，“战青团”随之改组成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青年建国训练大队（简称青训队，或叫爱国青年训练总队）。不管是改名“党政总队干训班”或是“青训队”，集中营的性质是不变的。这时被青训队管训的人员，主要是作战中的俘虏。

五、掀起反共高潮，开展大搜捕运动

张庆恩在绥西，在归绥，以后到张家口，都是在他的指挥下，

利用傅作义的名义和权势以中统的行动骨干为主，配合傅系军警联合督察处、侦察总队等单位，以及国民党县党部，积极推行反共政策，多次发动和掀起反共高潮和大搜捕运动。他是一个疯狂反共的“带头狼”。

据事后透露，一九四〇——一九四五年期间在绥西各地的各级机关、学校、团体、企业中，以及副长官部所属各部队，有许多所谓中共地下人员和所谓嫌疑分子被搜捕。他们企图把中共绥西地委彻底破坏。他们认为“情况严重”的还特别监押在临时监房里，如郭北辰烈士，就是单另关押，最后被秘密处死的。其实，搜捕任务不仅限于绥西，远至伊盟东胜、陕北榆林等地。总之，随着傅作义军事的进展，在归绥、包头、张家口等重要城市，都进行了大搜捕运动，企图搜清中共人员，广事株连，搜求务尽。如张家口邮电局一次就搜捕三十多人。对于爱国进步青年，也决不放松，肆意迫害。至于秘密执行逮捕、监押、刑讯、暗杀、活埋等罪恶活动，则是在张庆恩等特务骨干领导指挥下的中统绥室行动干事及侦察总队中的中统分子阴燕英等去共同执行的。这个一般不许他人知道。笔者在一九四七年偶尔听到张庆恩的亲信骨干×××说，他就曾奉命活埋过一个地下中共人员。

被逮捕的中共地下党员中，少数意志薄弱者，经过秘密审讯，在“战青团”经过管训，办理了脱离中共的“自新”手续。这些人中有的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有的还成为张庆恩手下信赖的骨干分子。总之，被中统特务网罗住的人是很难逃脱他们的掌握的。

以张庆恩为首的中统，利用他们从傅作义那里取得的特殊权力，公开反共，残害人民，由来已久，而且从绥西发展到归绥、张家口，遍及绥、察两省，真是罪孽深重，罄竹难书！

六、潜入察省解放区，建立地下反共据点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傅作义部队一度挺进至绥东集宁、丰镇以及大同等地，并以马占山等游击部队向察省窺伺进军，企图袭击张家口。因被解放军晋察冀部队在柴沟堡附近阻击，马占山等又逃回大同。不久解放军对傅进行大反击，开始了围攻绥、包战役。

这期间，张庆恩指挥下的中统，为协助傅作义部队攻夺察省解放区，密谋策划充当傅部的先遣军，派得力人员潜赴张家口，进行地下反共活动。董叔明奉派担任中统察室主任，利用天主教作掩护，化装为天主教学校教师，带领少数警卫、交通人员，从国民党占领区归绥出发，经集宁、兴和、尚义、张北、万全到张家口，建立起地下中统察室办公处和张家口市、尚义、阳原等侦察据点以及集宁、商都等联络站。一九四六年夏天，地下中统张家口据点主任王致中、交通赵秉恒等密报说，发现中共晋察冀部队，动员了许多运输工具，将张家口的大量兵工设备、军火物资，以及一些重要民用工业生产设备、库存商品等，陆续运往阳原、蔚县以西的晋察冀山区老根据地。据此，国民党空军侦察属实，决定派飞机轰炸，但因天气、地形种种关系，轰炸的破坏作用不大。当时国民党军还错误地估计战略形势，对于解放军的这种“退避两厢”的策略，错误地认为是逃避正规作战。

这些潜伏的特务组织建立后，主要是利用天主教、商业等社会关系作掩护，以及收买个别伪蒙疆被中共机关留用人员，开展情报侦察工作。实际上这些人都难以打入中共组织内部，无法侦察到真正的有关解放军军事机密，不过是一般传闻，捕风捉影而

已。更主要的是，在人民专政的严密组织之下，活动十分困难，难以存在下去。因此，董叔明白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间潜入张家口建立地下中统组织，勉强撑持到第二年三月间，便借口有病逃到北平去了。直到一九四六年十月，傅作义部队夺占张家口后，才奉张庆恩之命，由北平回到张家口，正式建立起中统察室以及各级机构。关于中统察室工作情况，已有另文叙述，这里就不多谈了。

（李知非整理）

一九八〇年九月三十日

绥远地区的国民党 中统特务组织

谢新吾

—

绥远省战地工作委员会的改组

绥远省战地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战工会）成立于一九四〇年。初成立时由李英夫负责主持，名义是参谋长，帮手只几个人。后来由赵励师负责，改为秘书长，秘书由王子贤担任，科长有樊库、高风鸣、常述武等。在这期间，主任委员仍是傅作义兼任。委员有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鲁英麇。绥远省政府委员、厅长、以及绥远省党部委员、三青团绥远支团筹备处干事等，都是战工会的当然委员。

战工会的主要任务是：派人与伪军秘密联系，进行策反、分化、争取，搜集日寇军事情报；在日寇侵占区成立政权，派遣游击县长开展活动；指挥各游击部队深入日寇侵占区，发展和扩大游击区，打击日寇。这些任务在当时来说，无论进行得如何，在方向上总是正确的，是名副其实的抗战工作。

一九四四年秋后战工会被改组，增设了常务委员会和几个工作区。改组后的战工会在形式上仍和以前一样，党、政、军、团各机构的负责人为当然委员，定期召开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都是主任委员傅作义指定的，如鲁英馨、赵励师、张钦、张国林、苏开元、李大超、李英夫、常佩三、苏纪忍、张庆恩等人；同时指定张庆恩为常务委员会的秘书长。增设的工作区，有绥远区（由赵励师担任主任，张国林为副主任）、平津区（由苏纪忍为主任）、东北区（由李大超担任主任，李英夫为副主任）。战工会还下设绥远省复员委员会，由张钦担任主任委员，常佩三担任副主任委员。设有特工处，处长由特务头子张庆恩担任（这是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特种工作指导处改称的），还设有秘书室。

战工会随着它的改组而变质。从表面上看，好象是内部组织的扩大和人员的增加，没有什么变化，而本质上，它已不是单纯地进行抗战工作，而是策划和推行“防共反共”的反革命活动。上述战工会成立的各工作区和复员委员会等，都是空有其名，并未着手工作，只有绥远工作区仍负责旧日战工会的工作，但也不过是应付场面而已。张庆恩则以其秘书长的身份，以特工处为基础，集中力量抓住绥远战工会的整个组织，发展调统势力，大力开展其特工活动。张庆恩经常住在战工会里边，以加强对工作的控制。他将自己得心应手的助手王兰田，调为常委会秘书室的主任秘书，其它重要职务也完全由前特指处调用。改组后的特工处及其领导的外勤份子也略有变动。如王黎生调充榆林据点秘书，安边据点魏纯美调回内部，所遗主任一职由许仁山充任，其余一切安排完全是特指处的旧班底。

在这个时期，调统室只留下承办总务的人员和电务人员。

魏纯美临时代理室主任职务，实际上只是个虚名。因为调统室的业务已完全由战工会的特工处承办，电台和译电虽然仍留在调统室，但译发和译收的电报仍须张庆恩签署方生效。此外，担任行动职务的特务程又新，在陕坝以东的托城圪旦另设有活动的秘密处所，张庆恩也直接负责，一切都向张请示报告。在情报处理方面，分报中统局、副长官部参谋处，重要的才向傅长官（即主任委员）呈阅。中统局对情报指示的要求和查报事件，由张庆恩核批后交特工处情报科负责处理，命令下达各据点时，既不请示也不呈阅。特工处的所有档案，放在该处保管。张庆恩为了更保密起见，把收报纸上的译文，留在译电室保管，电文另抄呈阅。自此以后，电报密码也见不到了。

特工处在当时的特务活动，主要是情报工作。中统局对该处所领导的各情报据点的活动，不断有严格的要求和指示，尤其是对各据点建立的内线特务，更为重视。对安边、榆林、麻地沟和大青山等据点，具体要求是以建立内线为主。当时，各据点曾报告内线均已建立起来，并报有具体的姓名、职务，同时也有情报反映。中统局对此颇为满意，张庆恩也认为是自鸣得意之作。实际上，这是外勤特工为了邀功，所建的并不是内线。所以有关续查情报的要求往往报不上来，只是情报质量比一般的要“高”一些，比如有关八路军的人员、武器、装备和调动情况，解放区在经济方面的一些措施，精兵简政和整风后的反映等等。

改组后的战工会，仅仅三个月的光景，便发生变化（一九四四年十月至年底）。原因是张庆恩以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大权独揽，骄横跋扈，完全控制了战工会，使战工会各工作区大转方向，像特工处一样进行反共的特务活动，扩大调统势力，并把它渗透到各个方面。如乔汉魁在凉城一带活动，名义上是战工

会领导下在沦陷区的工作，但已与调统发生组织关系，为其所用。更重要的是，张庆恩还掌握了选派游击县长的权力，从而有利于扩大调统的组织基础。当时绥东五县、绥南三县，以及包头、固阳、武川、萨拉齐和归绥等县的游击县长，都准备调整，另派新人前往接替。而决定签请核批之权则操于张庆恩之手。如清水河游击县长孙蔚章即是奔走张庆恩之门而当了县长的，在日本投降后他为抢先进占县城，曾和八路军偏清游击大队展开争夺战，表现得颇为狡顽。乔汉魁出任归绥县县长当然也是靠张的力量。包头县长也曾计划由调统骨干分子程又新、柴生华充任，以后因故改派刘效贤推荐的刘某人。总之，这些人都受到张庆恩的鼓动和影响，在敌占区开展反共活动起了一定的作用。

张庆恩为了扩大调统的工作和影响，企图利用战工会这个公开机构，打着抗战的幌子，开展调统的活动。张庆恩之所为为战工会领导上层人士所不满，以致发生内讧。有一次召开常务委员会，傅作义因事不在，由张庆恩代理主持，研究内容是有关战工会的工作细则问题。张庆恩对工作细则的拟定，巧用心机，特别突出秘书长的职权，要高于常委之上。因此，导致众多常委之不满，张庆恩竟与苏纪忍争吵起来，闹得不欢而散。从此战工会即行结束，改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的战工处。这个战工处，由赵励师担任处长，张国林为副处长。复员委员会仍独立存在。张庆恩的特工处，一变而为“军事委员会第八战区党政总队”，归第八战区傅副司令长官领导指挥。

二

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 特种工作指导处

一九四四年春天，在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会议室的各处室汇报座次排列表上，又增添了一个什么“特种工作指导处”（以下简称特指处），该部由八个处增加为九个处。

特指处处长还是臭名远扬的绥远省调查统计室主任——国民党 CC 中统特务头子、驻傅作义部总代表张庆恩。

凡是参加过汇报会的人，只要留心一点都会看到，当时参加这个汇报会的机构，不仅是该部的各处室，所有绥远省级机构连同国民党中央派驻地方的机构，也都参加。例如：绥远省政府秘书长，民、财、建、教四厅的厅长，三民主义青年团绥远支团部干事长，国民党绥远省执行委员会书记长，国民党陕坝市筹备处负责人，以及货物直接税局和中央、农民银行等机构负责人，都出席了这个汇报会。

特指处于一九四四年春季成立，它并不是党、政应该成立的建制部门，而是经军事首长面谕特务头子张庆恩，拟定组织简章和人事编制，经核准而成立的。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特指处呢？虽然说是因人设事，但毕竟有它特定的作用，那就是进行反革命活

动。

特务头子张庆恩在一九四〇年秋季至一九四三年六月以前，曾担任国民党绥远省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书记长职务，同时两次兼任国民党绥远调统室主任，又是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专员。他在这几年当中，担任那么多的职务，在绥远省进行特务活动，当然方便多了。尔后，他的国民党绥远省执行委员兼书记长的重要职务，被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解除了，只留有调统系统的职务，专员职务只对内而对外不公开。因此，他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大逊于前。当时在社会上，就是在国民党绥远省执行委员会内部来说，有些人已是冷眼观看，甚至还有掣肘的情况。例如：西安党务训练班毕业后派来绥远省执委会工作的人，就是这样的。又如调统室使用款项，在他当书记长时只写个二寸长的便条，要多少会计就得照数付给，而今则须凭别人审批。日常事务按规定也必须商请书记长同意才得进行，他一次也没去过，都是派该室秘书张富仪办理。当未获得圆满结果时，他多是冷笑一面：“以后再说吧。”其内心不满往往形之于色。有人怂恿他“跟他们闹”时，他只是哈哈一笑，说：“你们懂得什么！”上述情况表明国民党内部派别分歧，在中央是陈立夫和朱家骅争权，在地方上也是狗咬狗了。

张庆恩毕竟是个多年的老特务，深知调统的一些纪律，岗位的调动与否不决定于他，所以内心里虽然抑郁不满，但表面上对中统局的要求和指示仍卖力地去执行。正当蒋介石反动集团一次又一次发动反共高潮之际，在绥远的所谓党、政、军、团（指当时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绥远支团）一元化的最高负责人，为了适应当时政治上的需要，为了他个人的前途，就把张庆恩视作反共的得力工具，当作反动的挡箭牌。于是在一九四三年秋初，先委任

张为副长官部的中将高级参事，每月拨法币六万元，作为活动经费。这笔款完全由张庆恩支配，进行调统特务活动。

特指处的成立，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企图把调统特务活动扩大到傅作义部队。一九四四年春季，张庆恩奉命筹组之际，曾召集调统室组长以上的调工分子，昼夜研究。参加研究的有该室秘书兼组长张富仪，组长王兰田，王黎生，杨格非等。决定成立“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特种工作处”，在呈傅核批时，又加添“指导”二字，所以定名为“特种工作指导处”。在人事编制上，比照长官部其他各处官阶编成：设少将处长一人，上校秘书一人，上校课长三人，中校课员三至六人，少校课员及尉级工作人员若干人，勤务兵数人。

特指处的人员安排，完全以调统分子做班底。少将处长由张庆恩担任，秘书兼第一课长王兰田，第二课长王黎生，第三课长杨格非；课员夏江、谭觉民，张毓楷（记得这些人是中校）、王千造、王鸿勋、许有善，薛宝麟等二十余人。绥远省调统室派出情报据点的所有人马也完全编入该处。据点上的负责人，当时称为主任，多数都是上校官阶。例如：榆林的祁觉民，三边的魏纯美，河西的樊毓泗，神木的郝理修，陕西府谷、麻地沟的刘毅佐，以及大青山的王明中等。这些人当时有的是中校官阶。

上述情况说明所谓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特种工作指导处，表面上披了副长官司令部的外衣，而实质上依然是搞的调统特务工作，并把它的活动范围扩大并渗透到副长官部所指挥的军队里，更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反动作用。副长官部的特种工作汇报会议，已经给了张庆恩进行调统特务活动的机会，但毕竟还不如特指处更方便、更深透、更灵活、更能为所欲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也积极鼓励张庆恩开展这样的活动，这是因为它既可不可

开支或少开支中央局的经费，又可做更多的活动，成绩方面也能使他们更为满意。当时中央局给绥远省调统室的活动经费以及补贴等每月不过五千余元法币，与六万元相比，相差十二倍。

张庆恩在中统局起初的地位并不高，仅是一个专员、省室主任，由于其反动活动颇为猖狂，因而国民党中央不断鼓励与嘉勉。他曾企图从中牵线把傅作义和陈立夫、陈果夫等由私人关系变成政治关系。陈家兄弟当时在蒋介石反动集团内，固然是党权在握，赫赫一世，但却少有反动部队的实力作后盾。当时傅部在蒋介石反动集团中也没有得力的靠山，并经常受到何应钦，胡宗南等的留难与嫉妒。因此，张庆恩的这个“得意杰作”，正国民党中央反动头子们的下怀。

特种工作指导处从一九四四年春成立后，仍和绥远省调统室一起活动，名义上是两个系统，而实际上完全和以往一样，其业务内容是一致的。只有一点不同之处，就是凡编到特指处的特工分子，每月工资比照长官部各处按规定官阶发饷，服装和口粮等也完全供给（原来绥远省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只发工资，不发服装和口粮）。

张庆恩自卸任国民党绥远省执行委员兼书记长后，仅仅一年的光景，他在绥远的调统特务活动，就获得地方当局的倚重和中统局头子们的赞许与嘉奖，因此于一九四四年秋季，又把绥远省战地工作委员会和特种工作指导处合并改编成为一个系统。名义上也由副长官部特工指导处改为绥远省战地工作委员会特工处，这样他的活动经费、范围和权力就比前更多更大了。

三

绥远省党政总队

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原来企图通过绥远省战地工作委员会这个名正言顺的机构为掩护而进行其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但没有如愿以偿。继而又取得傅作义的支持，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请示，拟成立“政治工作总队”，以张庆恩为领导，以适应战地开展工作的需要。不久得到国民党中央的复电，为了与其它战区划一起见，可以成立“党政总队”，至于总队长人选另行决定。为此，副司令长官部经过几次保荐，坚持认为张庆恩个人经历突出，在绥远书记长任内功绩显著，目前工作需要，又人地相宜，等等，并示意张庆恩电请中统局陈家兄弟（陈立夫、陈果夫）就近活动，最后终于获得国民党中央的“准如所请”。

总队长一职颇费周折，难以确定，是有其一定原因的。主要是蒋介石反动派内部派系分歧，但在反共态度上却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对绥远地区也是给予大力支持的，如派张彝鼎为副长官部政治部主任，苏寿余为政治部副主任；派张庆恩为绥远省党部执行委员兼书记长，又两次兼任调统室主任，派中央监察委员姚大海来绥远视察等等，都是为了加强绥远地区防共、反共的组织力量。但在人事方面派系分歧，各有其势力范围，党政总队是军统系统，其总队长人选均由军统把持，而张庆恩系中统分子，由他

来担任这个总队长职务是逾越这个界限的。可是国民党中央碍于傅作义的情面，傅曾三次陈请由张担任，始不得已而破例允其所请。据事后张庆恩谈到这个问题，当时其内部争执颇烈。军统为争得这个总队长的入选，曾调某战区任党政总队长的乔家材，已来陕坝（第八战区副长官部所在地）的中美训练班担任什么教育长。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曾来陕坝视察，当然与此事有关。乔家材是军统特务，系山西交城县人，与张庆恩素不相识，也几次拜访张庆恩拉乡里关系，了解当时当地的一些有关情况。上述诸种情况已可判知其争夺之内幕。

该党政总队于一九四五年二月间正式成立，它的全称是“军事委员会第八战区党政总队”，隶属于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领导、指挥。按颁发的编制表设：少将总队长一人，由张庆恩担任、少将（或上校）副总队长一人，由柴治堂担任。柴某是三十五军多年的旧军官。秘书室设有上校主任秘书，由王兰田担任，中校秘书由史其昌担任，以下还有少校、上尉等办事人员。我记得有周鸣、白公慧、秦辅翼等人。设三个科，第一科是总务科，上校科长樊毓泗（别名洙亭）；第二科是情报科，上校科长邵厚德，这是祁觉民从榆林据点调回来的；第三科，上校科长杨格非。以上各科均设有少校、上尉等科员。有夏江、谭觉民、武兆瑞、武自强等。

党政总队总队部仍设在绥远调统室的前院，因编制扩大，人员增多、临时新建办公室三间。总队部除副总队长柴治堂是新任外，其余的人基本上还是战工会特工处的原班底，也就是特指处从一九四三年秋季调统室扩大以来的旧班底。至于派到接近共产党领导的各边区附近的情报据点，同样是随着对隶属的变更而变更的。党政总队直属三个大队。先把陕北地区的三个情报据点编为

第三大队，上校队长祁觉民，中校秘书王黎生。安边据点改为一个分队，中校分队长许仁山，助手韩兆麟。榆林情报据点，改为一个分队，中校分队长王树滋（化名王永真）。神府、麻地沟两个情报据点改编为一个分队，中校分队长郭理修（郭理修当时担任国民党山西执行委员会晋西北党务督导员，并兼任绥远调统室工作，当时常驻府谷县城），助手有徐增瑞，少校刘毅佐、任大光（化名赵子文），仍负责麻地沟地区工作。第三大队所指挥的就是上述三个分队。第一和第二大队，当时因内部有争执和闹意见，没成立大队部，只成立了几个直属分队。如鲁凤昌担任雁北地区中校分队长，刘慧之担任后套地区中校分队长，清水河游击县长孙尉章兼任一个分队长，乔保林也担任一个分队长，凉城县游击县长乔汉魁也兼任中校分队长。后来又派赵大义担任一个额外大队长，到接近晋察冀边区附近地区自由活动与发展。以上，是党政总队成立之初在编制和人员配备上的大概情形。

党政总队究竟是干什么的？事实说明，它的活动并不是配合抗日军事工作，在敌占区开展党政活动，而实质上是以反共为其中心目的的。如在陕北榆林设立的第三大队所属三个分队，完全是过去调统室指挥下的那一套工作，它活动的矛头完全指向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侦察解放区军事、政治动态的情报，以及开展宣传造谣和分化瓦解工作。又如鲁凤昌的雁北分队，表面上是指向日寇，但它所负使命是加强与在应县山区活动的乔日成部队的联系指导。乔日成部队名为抗日，实则反共，在陈国兴担任调统室主任时期，已经与调统室发生组织关系，不断向调统室供给情报。鲁凤昌在雁北地区得以立足，在依靠乔日成部队，而乔日成则通过鲁凤昌之关系，以加强对上之联系，他们是互为依附、交

相利用的。鲁凤昌以钦差大臣自居，公开和暗自收受贿赂（即大烟土），日本投降后，他来归绥述职时，即满载而归，大发横财，仅大烟土，就有百斤之多。另如在应县一带活动的张朴部队，日本投降后，坚决与人民为敌，也是受了这些特务的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党政总队由陕坝迁到归绥市，杨格非为第二大队长。当时急于用人，当地取材，即在本市小西街开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招收青年学员五十余人。杨格非兼任班主任，负责主持训练事宜。一般在日本占领区的青年人不知底细，看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招收所谓“党政总队训练班”学员，热情很高，报名的很多，真是趋之若鹜。未经录取的人，还非常难过，认为是最大的憾事。谁知道从此即断送了自己的一生，成为人民的罪人！训练的内容完全是反革命特务活动的一套把戏，仅四个星期就毕业分配，参加了第二大队的工作。例如后来在调统室工作的胡尚儒、秦国宝、郑思平、郑一如等，都是这个训练班毕业的。张庆恩在八月底来到归绥市，把绥远调统室的特工分子与党政总队合在一起，进行特务活动，每个特务分子也都穿着军服，所到之处，备受人们的恭维。尤其是给日寇作过事的人，对他们更敬若神明，设法接近，馈送财物，以便得到保护，逃避惩处。有一个一贯道头子王明远，为了保全自己，情愿挂着党政总队名义而为该总队无偿的工作。又如调统分子郑应举同时为一贯道头子，在谒见党政总队主任秘书王兰田时，一次就贿赂很多金银、大烟土。他们贿赂的方法全袭用“官场现行记”的那一套办法。即会见时，将所要赠送财物包藏在身上。包藏时附上便条，写明财物名称、数量，自己签字署名。然后乘机塞入受贿者被褥之内，收送双方只字不谈此事。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底至十月底，就这两个月的短短时间，总队长张庆恩、主任秘书王兰田两人，收贿数量即

非常可观。一九四六年春，我与郑应举闲聊中涉及此事，他脱口泄露机密，确数不详。张庆恩老奸巨滑，表露不多，而王兰田则不然。王兰田从陕坝迁来时，只有一个破火柴箱子，而两月时间，皮箱罗列，用具一新，厨子也有了。较低级特务，也不干净，但相差悬殊，嫉妒喧嚷，人所共知。一九四六年初，当时军政当局镇压贪污，枪决贪污罪犯赵亚民（财政厅科长），扣押包头市警备司令马秉仁，刮起惩办贪污之风。王兰田心中有鬼，张庆恩为了掩护自己并庇护王某，保荐王兰田遣送一批日侨赴北平转天津回国，暂离绥远避风。

一九四五年十月底开始，解放军围攻归绥、包头战役前夕，党政总队除在榆林的三大队及所属各分队，以及在后套的刘慧之分队，仍在原地区活动外，其它的大队和直属分队，还有临时派到莎县、包头的秦辅翼、陈元夫等，全都调回归绥市。三大队队长祁觉民来归绥市述职，临时亦留此地协助工作。在这次战役中，张庆恩除仍负责党政总队和调统室的工作外，临时又兼任随军工作队负责人之一。所以把在归绥市招训的学员大部分派到随军工作队工作，其余的主要是由后套来的特工分子，都布置在城内及郊区进行特务活动。当时表现最突出的有鲁风昌，每天亲自带上便衣武装特务，在城东的桥靠村、一家村、哈拉不塔、北毫沁营子一带秘密监视，刺探情报，发展眼线。在毫沁营子吸收过一个姓卢的地主分子，每日进城送情报。鲁风昌还亲手扣捕人带回城里，颇受张庆恩的嘉奖。鲁风昌后来出任和林、兴和等县县长，就是与他猖狂反动活动分不开的。在城里他们也设有秘密工作据点。在旧城小南街兴华泰商号南楼占了客房三间，经常派有特务化装外地商人，刺探情报，侦察监视可疑的来往客商。当时在这里进行活动的有郑应举（又名郑殿卿）、郑思本、郑一如、秦

辅奚、胡尚儒等。在绥包围城战役中，党政总队在城内外大肆开展侦察活动，为伪军之作战发挥了尖兵作用。

归绥、包头围城战役结束之后，正当重庆举行的国共和谈，取得进展，经过各方面协商，即将召开旧政协会议，迫于当时这种形势，党政总队宣告撤消。所有该总队的人员，都有计划地作了安排，一部分介绍回绥远调统室，一部分介绍到杂牌军队内做情报工作，有一小部分转到了北平。这些人员虽然离开，但在需要时一召即来。如一九四七年张庆恩调察哈尔后，王兰田等调统骨干分子马上调往。王兰田担任张垣绥靖公署“青年建国训练大队”（简称青训大队，主要是训练作战中抓回的俘虏）大队长，继续搞反共活动。

张庆恩所领导的这个党政总队，完全属于调统系统，所以它的活动，如情报工作的要求与反映，中统局仍是主要上级。对边区情报的搜集特别重视，经常指示要求复查，着重于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番号、人数、装备、调动、部署和官兵情绪，以及党政各种措施和人民生活情况等等。党政总队第三大队承担上述方面的任务。对绥东大青山地区姚喆司令员所领导的部队，在晋西北地区活动的彭绍辉部，也都是其进行情报工作的对象。中统局一直重视在上述解放区建立内线特务。如在大青山地区曾命令王明中建立内线特务，在晋西北曾令刘毅佐建立内线，但在效果上均属微乎其微。

四

第十二战区“民众工作总队”的 成立与活动

蒋介石反动集团，于一九四六年初，迫于全国人民的呼声，在要求政治民主化形势的压力之下，以召开旧政协会议做掩护，对当时一些公开特务性的机构，撤销了一部分。如第十二战区党政总队即于元月份明令撤销，调统特务分子随便扣捕进步人士的法西斯行为有所收敛，对已经扣捕的和俘获的人员也装模作样地释放、交换了一些。但是这些措施，完全是为了掩盖他们当时不可告人的卑鄙企图——积极准备内战。当时，绥远省这个地区，是第十二战区的辖区，毫无例外的也是跟着蒋介石反动集团倒行逆施，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活动。第十二战区民众工作总队（以下简称民工总队）的成立及其活动，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民工总队成立于一九四六年的五月间，设立在归绥市新城西落凤亭。当时国共双方协议停战，军事调处小组正在各处活动。特务头子张庆恩在这一年的三月初，乘飞机到重庆中统局述职。此时他只留有绥远调统室主任的职务，其它职务俱已卸任。张庆恩留重庆一月有余，迟迟不返，主要原因就是他的职务问题，尚无适当安排。因为调统室主任一职，按国民党党务法规的规

定，只等于省党部的一个科长，兼任尚可，专职则不相称。中统局对此踌躇未决，有意留张在局本部，再俟机调整。正在这个期间，身任党、政、军、团（绥远省党部主任委员、绥远省政府主席、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三民主义青年团绥远支团特派员）四要职的傅作义也飞抵重庆述职。述职其名，探听国民党中央对当前时局和对自已的态度是实。其时国共之间和、战未定，同时在地方上以潘秀仁、赵允义为首的一部分实力人物，高唱军、政分治，实际是他们野心勃勃，认为已羽毛丰满，企图出任省主席的高位。而绥远旅渝同学会内的潘、赵亲信分子，也直接了当地喊出要“绥人治绥”。傅作义很了解这个情况，所以趁述职之机，提出要辞去自己的本兼各职，试探性地了解中央意图。国民党中央对傅鼓励嘉勉，不但未允准辞职，反而寄以厚望。傅当时既已掌握中央意旨，于是力促张庆恩同机返绥。张返绥之后，在傅的支持下，着手组织民众工作等类机构，以对付与解放军之作战。张庆恩四月间说，傅曾许诺他二次出任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书记长，果然于八月间成为事实。

为什么要取名民众工作总队呢？诚如张庆恩所说：“为了使一般人不注意，并能接近解放区的民众，开展我们的工作，使他们了解我们是为民众的工作而成立的”。民工总队的组成，其人员配备，虽不是清一色的调统特工分子，有从长官部参谋处抽调来的，也有从绥干团毕业学员选拔的，多以地主家庭出身为选拔的对象，还从部队抽调一些精干的谍报人员，但在该总队负主要责任的仍以调统特工分子为主。总队长是张庆恩，副总队长兼大队长是魏纯美，大队长何理修、杨星甫，中队长贺凤午、阎起风等都是调工分子。乔汉魁以凉城县长兼任中队长。内部工作的有樊毓泗、武自强等人。

在这个所谓搞民众工作的机构中，不论是由何处选拔而来的，都是一些坚决与人民为敌，进行反共反人民反革命活动的色彩鲜明的反动人物。这些人无论是队长或队员，都佩带由战区长官部军械处发给的太原兵工厂出产的大头匣子手枪，并供给一部分手榴弹。规定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搜集有关解放军动态情报，搜捕共产党县、区、乡的干部，宣传诬蔑共产党的政策措施，组织并加强还乡队的力量，等等。民工总队的工作地区，目标是绥东五县，集宁、丰镇、凉城、陶林、兴和等接近解放区的地区。他们与国民党作战部队紧密联系，配合活动，进出在前沿地带，到傍晚即回到部队的后方食宿。因为他们不得民心，一般的群众迫不得已而虚与应付，这些特务分子是很清楚这种情况的。他们联系的都是一些反动的地富分子，革命干部和接近革命干部的群众都是他们扣捕侦讯的对象。由于有些反动的地富分子追随他们充当反动工具，供给他们情报材料，以后都被任为反动政权组织的骨干。

从一九四六年六月到九月，傅作义部队向绥东解放区的集宁、陶林、凉城等地发动攻势。每侵占一个村庄，这些家伙们就进行清乡工作，安置反动的乡、保长等。县长人选则已密许队长以上的特工人员。如国民党军一度侵占集宁，县长一职即由中队长贺风午充任；侵占丰镇以后，即由魏纯美担任县长。兴和县长卢文启，本来不在预先的计划部署之内，因为急于用人，适逢民政厅长王则鼎到绥东视察工作，在前方部队的要求下，派卢文启暂行代理职务，并促卢连夜前往就任。这事曾引起张庆恩的不满，背地里大发牢骚。这也说明张庆恩的跋扈专断，大权在握，连民政厅长任用一个县长，也认为是超越了他的权力。事实上张庆恩确也是当时反动集团的宠儿，再加上他本人诡计多端善于钻营，

确实掌握了不少权力。在这个时期，张庆恩不但负责民工总队，而且又第二次（是年八月）担任了国民党绥远省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并兼书记长。

绥东五县解放区被傅作义部队侵占之后，民工总队随军活动也告一段落，大部分特工分子都安插在各县、区、乡等政权机构中担任了职务，有的仍回原机关服务，民工总队宣告结束。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民工总队是由调统特务把持的彻头彻尾的破坏人民革命事业，协助反动部队打内战的机构。由于这些特工分子都成为县、区、乡地方政权的权威人物，他们就把防共反共视为中心任务贯彻到各种工作中去，千方百计地残害革命干部和进步人士，以作为自己向上爬的资本。如丰镇县长魏纯美这个仅次于张庆恩的大特务，仇共反共，镇压进步势力极其残忍。陶林县长王觉民，与魏纯美不相上下，也是杀人不眨眼的。人民广为流传的绥东五县有“二虎”，指的就是上述两个人。魏纯美在丰镇县一次早晨升旗时训话说：“大家给我起个绰号叫魏虎。你们知道虎是要吃人的。我就是要吃人！”再如兴和县长鲁凤昌，凉城县长乔汉魁等，在当时都是坚决与人民为敌杀人如麻的刽子手。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

五

“绥远省肃奸委员会”的罪恶

一九四八年春天，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绥远东部地区丰镇等县，盘踞归绥的国民党军积极部署准备作战，企图阻止解放军西进。但同时也深知自己力量薄弱，乃急向北平“剿总”求援，恐慌异常。所谓“绥远省肃奸委员会”就是在这个特殊情况下成立的。

(一)

有一天，绥远省政府在礼堂召开党、政、军各机关首长座谈会，董其武主席主持，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兼建设厅长潘秀仁提出成立“绥远省肃奸委员会”的建议。他在会上大放厥词，要求各方面全力支持，把潜伏的共产党和接近共产党的人一网打尽，彻底肃清，巩固后方。因此，责成有关单位和业务部门切实负起清查之责，并叫嚷疏忽大意出了问题，有关人员要受连带处分。这样，这个委员会成立了，由省主席任主任委员，潘秀仁、省参议会议长、省保安副司令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有民政厅长王则鼎，土默特旗总管××，省党部委员兼社会处长杜品山，归绥市市长樊涤青，归绥市警备司令××，归绥市警察局长×××等。

肃奸委员会下设办事机构——秘书室。主任秘书由绥远省保安司令部秘书张炳南担任，副主任秘书为国民党绥远省调统室科长胡尚儒，秘书为绥远省干部训练团秘书刘超一。还设有情报、行动、审讯、管训、财务等五个组。情报组组长先决定由军统归绥站站长庞中兴担任，后改为辛裕如，副组长员涛秋。审讯组组长由绥远调统室主任祁继先（即祁觉民）担任，副组长为何清淮（何当时为党团合并后的省党部委员之一）。行动组组长为归绥市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朱恩达，副组长为归绥青训中队队长文兆甲。财务组组长为省政府参事×××，副组长为财政厅科长刘绍杰，另派主计处专员刘亮哉协助。

从以上人事配备来看，这个组织，是国民党反动派以中统、军统特务份子为核心的党政军大合唱。名义上是省主席兼主任委员，而其实权操于潘秀仁手中，也就是操于中统系统手中。在当时会议上就已决定，省主席因负军事上的责任，难以分身兼顾，故由潘秀仁为代理主任委员。此时潘已经代理了省主席职务，人们都呼为“潘代主席”。当时潘秀仁及其党羽，更是横行跋扈，无恶不作。

（二）

情报组组长辛裕如，当时是中统局专员，在绥远进行秘密活动、因军统归绥站长庞中兴有事不能担任情报组长，由杜品山保荐辛裕如接充。副组长员涛秋也系多年来的调统特务分子，其身分当时也是秘密的。组员计有调统室科长胡尚儒，军统归绥站的陈其管、教育厅秘书张敬业、社会处科长张富仪，归绥市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朱恩达、归绥市警察局督察长刘冠英等。并设有事

务一人叫刘福祯，负责收发，缮写和保管文件及领发活动费等。

这些情报组的成员，一般都是经过潘秀仁的指示而决定的。当时的军统、调统特务机关以及伪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都进行情报活动，为达到情报侦察准确、及时和有效，极需要集中、统一、深入地指挥和综合、汇集、整理，以便适应“肃奸”工作的开展。他们对于归绥市所有省、市两级人民团体和各中等学校的进步师生最不放心，除由警察特务机关严密监视外，并责成社会处负责掌握和运用省市级人民团体的各个基层组织和个别人员，监视行动，搜集情报，及时反映。教育厅也负责掌握各中等学校师生的言论行动，对进步师生严密监视。并规定如有不力之处，要受连带处分。特务机关虽不负任何部门之专责，但可以在任何部门中活动。如调统室在工厂（如电面厂，毛织厂等）以及各学校都建立有特务小组。

“肃奸会”及情报组都在国民党省党部内办公，辛裕如、员涛秋经常上班主持情报的处理。在解放军围攻归绥市逼近城郊时，各方面的情报确也不少。如笔者领导的归绥市总工会情报小组，即检举过不少嫌疑分子。由于国民党的望风捕影、乱抓乱捕，一时间形成“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情势。记得辛裕如在情报组员会议上，曾经提到各组员供给的材料很多，希望加强质量，力求做到内容充实具体，并要求对每一个线索抓住不放，一追到底，不断反映。此外，情报组的成员，每人每月都领有活动费，具体的数目有所不同，就是一人每月也不同。我记得刘福祯每次用电话通知时，总要先把应领的数目告清楚。如开始为二十万元法币，后来竟增到百万元了。当时法币一再贬值，几乎成了废纸，人们也就不重视它了（这项活动费，在围城解除后即停发）。

(三)

行动组方面的情况，我只能根据我当时的所见所闻来谈谈。

“肃奸委员会”成立伊始，听说根据国民党归绥市党部书记长柴生华领导的特务分子报告，扣捕张浩然一案（因共产党嫌疑），前后株连竟有四五十人之多。据当时潘秀仁、杜品山计划，凡是河北省曲阳县籍者，在归绥市经商和张浩然等有往来或者接近的人，无论是商业交易和私人交往，都在扣捕之列。这样，由大召前伸展到四合村一带，还要继续扩大范围，继续扣捕，疯狂地镇压人民群众。潘秀仁最为阴险毒辣，例如扣捕正风中学的美术教员贺炳麟后，非刑拷打，犹嫌不足，还认为在审讯方面缺乏经验技术，电请中统局北平区办事处派员协助审讯。

所有被捕的人，都关押在绥远省调统室的“统建队”内（原名是“统一建设队”）。这个队是在蒋介石反动集团发动内战开始后不久成立的，归绥远省调统室直接领导，实际上就是调统室的监狱。当时它由调统特务科长胡尚儒领导数名特务，带着一个班的武装侦察队士兵看守，戒备森严，被押的人在院里也不许随便行走，地址在新城西街陶林会馆内。共有房屋二十余间，除办公用数间外，其余都改为牢房。牢房关押的人，不用说睡觉，就是坐下连腿也没有伸展的地方。被关押的人受尽了折磨。还有“政治工作队”所领导的派驻归绥市各个保甲的工作人员，在突击清查户口时，滥加速捕，冤狱成灾。当时归绥市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和六个分局，以及侦察总队等各个看守所，都形成人满之患。我曾亲眼看到旧城东顺城街侦察队看守所房外的屋檐下，不论晴

天、雨天都有被关押的人蹲着，武装士兵荷枪实弹看守着。据说是看守所押的人太多了，拥挤不堪，白天放出屋外一部分，使里边松宽一下。还有不少保外等候传讯者。

(四)

关于“政治工作队”的情况。就笔者所了解的简略谈一下。这个队由潘秀仁直接指挥。在他以下设有总领队(也叫总队长)，由他指定当时的省训团教育长×××担任。在总队长领导的许多联络员中，又指定有联络组长，联络组长领导联络员，联络员以下设有若干工作员，固定地驻在一定的保公所或甲长家里，有时食宿等问题也就地解决。

当时归绥市警察总局设有六个分局。“政治工作队”就以分局管辖范围为一个组织单位，与分局配合进行工作。总队召集全市联络员以上人员开会的地址，是省政府礼堂。组长每日早上的汇报，分别在各分局举行，各分局的负责人，也出席参加汇报，随时决定，随时执行。扣捕工作，由分局执行。总队长除参加联络员会议和在各分局召开的汇报会外，还到各组或工作员所住的保甲有重点地抽查和了解情况并指示工作。

这个政治工作队扰民太甚，人人侧目。如有的女青年住亲戚，应带的路条手续虽然齐备，因为稍具姿色，也列为盘查对象，三番五次，查问不已，甚至总队长乘马车亲往了解。住保甲的工作员对所管的居民，在普遍了解的基础上，发现可疑对象，经常注意监视其言论行动，随时反映。必要时突击清查户口。居民的亲戚，朋友来城里，不带通行证或盘查时一句话说不对头，即遭扣捕。

在这样横暴的措施下，很短时间之内，各看守所即装满了人。在新城各城门和归绥市通往城外的要道口上，也都派有工作人员协助军警把守，盘查出入行人。

政治工作队的成员，主要以省级党、政机关的公务员调充，荐任以上的担任连络组长或连络员，委任职以下的担任工作人员。当时各机关服从战时需要，几乎抽调一空。在表面上来看，政治工作队是另一个体系，实际上等于“肃奸委员会”隶属下的一个情报队和行动队综合性组织。该队的情报材料和扣押起来的人，完全由“肃奸委员会”负责处理。

(五)

关于审讯组，组长本来由调统室主任祁继先担任，省党部秘书何清淮副之，并有警备司令部、警察局、保安司令部和侦察总队等方面的法官参加审讯。后因被扣人数太多（据报告达千余），一时无法结案。反动当局为了清理积案，除向中统局北平办事处请来一位特务专员康某作指导并参与审讯外，又加派省党部委员毕存智，调统室刘毅佐为审讯组副组长，还由归绥市地方法院和检查处，高等法院和高检处以及社会处等机构，抽调三十余人，分别在上述各管押部门开庭审讯。

笔者曾参加过驻在旧城东顺城街的侦察总队的清理案件，该处关押二百人左右。所有审理的案件，由副组长给分配，审讯完毕后，将供词和签注的意见连同原案送回，然后再进行另一案。凡参加审讯的人，每日都用汽车接送，午晚餐在麦香村、风林阁两大饭庄轮流招待。吃的是四冷四热，烟酒随便。如此进行两周

多时间，绝大部分犯人取保释放。案情比较复杂，一时弄不清楚的，留交审讯组继续处理。这一阶段，开支浩繁，都由没收被扣人的财产变价内开支核销了。

由北平请来的那位康专员，乘飞机到归绥市以后，以潘秀仁为首的中统特务分子祁继先、杜品山、何清淮等领导人物，大为招待，视如上宾，下榻联谊社（当时官方高级宾馆，在今呼市公安局院内）二楼最好的房间，由何清淮经常陪同，出入乘坐的是省政府唯一的半骄子大卡车。康某之来，主要着重解决前述张浩然一案，他曾亲自审讯过几次。他起初主张多用说服方法，少用刑讯，可是住了约三周的光景，并无特殊收获，后来就悄悄回北平了。

（六）

一九四八年七月间，“肃奸会”设立财务组，又叫第四组，后改为经理组。组长仍由原组长担任，副组长为省财政厅科长刘绍杰，刘是由潘秀仁指定的。还有主计处刘亮哉协助该组工作。这个组的成立主要是为处理张浩然等的查封财产。该组成立后，即由“肃奸会”主任秘书张炳南把张浩然被查封的财产交由经理组长等接收清理。财务组的办公地点就设在张浩然在旧城大召前开设的货运栈楼上。

由张浩然一案，被没收财产的竟有八家之多，内有货运栈、百货商、棉布商和小布贩等。他们负责清理，分点货、造册、呈报备查、专案保管和拍卖等项。拍卖是需款多少，拍卖多少。当时法币一再贬值，故而如此。八家拍卖的总数总值在一万元银币

以上。潘秀仁规定，凡收回的拍卖价款，要及时交由潘秀仁的建设厅会计金某收存。“肃奸委员会”财务组的来往文件上，无论签名和署名全使用化名，不用真名。如省主席化名为王守谦，潘秀仁化名为魏子有，经理组长化名为王守和等。

该财务组的档案，在一九四九年年初潘秀仁逃跑时，曾命令经理组长一齐焚毁。但该组长只是口头答应，仍全案保存。后来“戡乱委员会”成立，设有“肃奸处”，负责处理“绥远省肃奸委员会”移交的一切案件。当时有释放的人，要发还财产。在需要发还财产中有金块十二枚，曾经交由建设厅会计金某收管，据料潘秀仁逃跑时已带走了，当时潘尚在包头逗留。“肃奸处”的负责人是当时绥远高等法院院长，一再向经理组组长催索此项金块，该组长几次持据（金某收到金块的收据）向建设厅会计金某索要，金某看来推不过，才到包头由潘秀仁手中追索回来，原物发还本主。该组长后来对人说：“当时如果听了潘秀仁的话，将档案一齐焚毁，不要说以后对处理案件的有关财务问题无所依据，就连这十二枚金块，也难以从潘秀仁手中要回来。这岂不是弄成有利归他，咎由我负！”解放后在“三反”运动中，该组长把全部档案移交省税务局。

(七)

最后谈一些零碎的事情。“肃奸会”就设在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今呼和浩特市新城东街路北）内，这是为了潘秀仁在指挥上方便，同时也因为省党部的工作人员被调到“肃奸会”的比较多。除财务组是在外办公外，其余各组，都在省党部内辟有专室办

公。这一年七月间潘秀仁赴北平时，“肃奸会”主任委员职务曾由杜品山代理，杜又叫我代理过该会的秘书职务（约一周许，因刘超一调回省训团原职），每天上午十时去一次，下午仍在社会处工作。在当时来说，“肃奸会”已进入尾声，社会处工作比较忙。

关于潘秀仁赴北平的事。潘秀仁及其党羽，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人所共知。一九四八年七月初，反动派在归绥市抓了一批壮丁，照例在入伍的当天，要以省参议会和人民团体的名义慰劳，送点肥皂、毛巾等物品。慰劳品已经买好，正待付款取货，而省参议会当时无款垫付，省参议会议长决定先向省政府借款付给，由他出名写了七千元法币借条，经董其武主席批准。到财政厅提款时，厅长张遐民借口无款，拒不支付（七千元法币约值银币五十元），还手持借条跑到董主席办公室提意见说：“主席以后批示款项时，要先和财政厅联系。不然的话，虽然主席批准，也支付不出去。参议长借的七千元，财政厅没这笔款，无法支付。”董听了之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报以哈哈大笑。因这一笑，张遐民便恼羞成怒，扭身而去。甫出门，尚在掩门之际，董高声自语：“我连七千元的主也做不了！”张遐民当然听得很清楚，从这天下午起，张即托病在家，不上班办公，一月之久，僵持不下，虽经斡旋，毫无结果。潘秀仁此次去北平，就是向傅作义替张遐民说话的。就以这件小事来看，足以证明潘秀仁及其党羽的气焰嚣张，咄咄逼人，同时也说明反动派内部分歧和矛盾的复杂了。

一九六二年

绥远战青团纪事

马 映 光

绥远战青团的全名是“绥远战时青年训练团”。它是抗日战争时期蒋匪帮特务在绥西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一个监牢，也可以说是一个小型的集中营。我于一九四一年三月间被绥远调查统计室（中统特务组织）逮捕后，送到战青团关了三个月，在所谓受训后，第一期毕业释放。现在就记忆所及，简略介绍如下，让大家看看它的内幕。

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在“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前，就依照“何梅协定”卖国条约，同华北各省市国民党党部一起被撤销了。国民党官员有的跑回南京去了，有的留在绥远省摇身一变而为政府的官吏。归绥、包头相继沦陷后，那些党官都溜到大后方安全地带。当时日本军没有向西攻占绥西河套地区。一般有钱有势的人留在绥西还嫌不够安全，都争着往宁夏、兰州、重庆跑，把绥西留给了毫无战力的游击军，扰民有余，抗日无能。行政方面，绥西有两年多成了空白点。

直到一九三九年春，傅作义由晋西北回到绥西，经过几番与日寇鏖战，才控制了这个地区，与日伪军在西山嘴、沿乌梁素海退水渠至乌不浪口之线形成对峙局面。一九四〇年，在陕坝恢复了绥远省党部，主任委员由傅作义兼，书记长就是特务头子调统

局专员张庆恩。接着，各县的县党部也恢复了。这时候的省党部和抗战以前的不同，设组织、宣传、总务等等几个科外，又多了一个“调查统计室”，简称“调统室”，也有叫“统计室”的。它在名义上是和省党部各科并列的一个室，实际上是直属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个省级特务机关。

张庆恩一到绥西，就强调“一元化”，宣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那一套谬论。不久，傅作义就把在晋西北时吸收的在三十五军政治部和绥远省动员委员会工作的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或陕北公学学习过的青年干部打发走了。绥西的情形逐渐恶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逆流开始泛滥，思想进步的青年和民主人士处处受排挤，受威胁。调统室主任张忠一是以绥远省党部党务视察员的身分出面的，他们开始活动时是和绥西军警宪督察处配合工作，又借用了三十五军特务营的一部分武力。

一九四〇年后半年，陕坝开始有人失踪，也有公开逮捕的，也有秘密逮捕的。有的知道被什么人捕去了，能打听关在哪里；有的秘密被逮捕，连地方也无从打听。接着，临河、五原、安北几个县也有人失踪和被捕，各县乡村里也有人被捕。被捕的人都解送到陕坝，有的关押在军警宪督查处的看守所，有的关押在调统室临时设立的监牢里。被捕押的人都遭到秘密审讯，非刑拷打。调统特务的气焰凶狠，把绥西弄成一个人人自危的恐怖世界，闹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绥西河套两个半县的小小地区，就有二百多人被捕。

调统室的地址在陕坝市博爱巷五号一所小院子里。被捕的难友们一提起“五号”来，没有不头痛的。主任张忠一是一个老特务，他有几副面孔：和一般人接触时装出一副和蔼、世故的面孔；见了比他大的官时表现的恭顺、诚恳；和被捕的政治犯谈话，

忽而和悦，忽而凶狠，诱惑的甜言密语与威胁恫吓的言词，变化莫测；每当审讯的“必要时刻”便暴露出凶恶、狰狞的面孔，他公开的助手有三个：张迺清是一个办事务的，从前当过军队里的副官，人们叫他张副官，帮助他看管政治犯；张立德和阴燕英，是两个带手枪的爪牙，经常出去逮捕人，也看管人，拷打人，还有一个厨夫，也是一个看管人、捆绑人、拷打人的能手。从表面上看，陕坝调统室的行动骨干组织很简单，实际上渗透在各单位各行业的爪牙不计其数。

另有一个特务骨干殷劲戈，听说是兰州来的，带着“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秘书”的符号，专门带着手枪协同调统室逮捕人，捕了之后又由他审讯，面目狰狞，态度凶狠，指令警察、宪兵用非刑拷打逼供，打皮鞭，压杠子，灌辣椒水……这个殷劲戈和张忠一狼狈为奸，勾通一气，软硬兼施。殷劲戈逼出口供后，张忠一便摆出一副“和善”面孔，安慰受刑人，埋怨不该用刑胡闹。

调统室的秘密监牢很多，散布在陕坝周围的小村里，占用几间民房，派上一个宪兵班长，带两三个宪兵，或军队特务营的班长带三、五个士兵，看管的政治犯，大都带上铁镣。老乡们说：“唉！这个世道真难说，不偷人，也没刁枪人，把好人当成罪人看待。这是什么道理！”

他们严刑逼出口供以后，还要强迫被捕的人发表“脱离共产党声明”。调统室在《奋斗日报》附印了一个《前进周刊》，每期除了刊登几篇反共宣传文章以外，大部分篇幅是脱离共产党声明。出了“前进”周刊以后，陕坝博爱巷五号门口就挂上一面“前进社”的招牌，硬是把特务机关伪装成一个文化团体。

关押的人被迫发表了“脱离共产党声明”以后，就由三、五个人的临时小监牢转移到一个人数较多的大监牢——“战青团”

了。名义上算是政治问题已经解决，要在“绥远战时青年训练团”受一个时期的短期训练，改变一下思想，再恢复自由，出来参加工作或生产，实际还是继续关几个月再释放。听说张庆恩等人原打算把这些人再关上一两年，也象西安劳动营那样长期折磨，然后才算“功德”圆满。是傅作义说，绥西是前线的战区，干部缺乏，期限尽可能要短，因而战青团的期限就缩短成三个月了。

“绥远战时青年训练团”成立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地址在离陕坝以西二十多里的一个孤立的大院子里。这原是一个地主的住宅，四面围墙很高，象一个小型的堡垒，简直是一所现成的监牢，人们称之为“西乡”。战青团第一期受训的有王国华、刘进仁、李西成、刘映元、程义新、李寿民、马映光、周鸣、王海周、谷维义、田中光、刘光明、贾润芝、李佩蕻等四十多人。这些人都是从各个临近的小监牢三个两个地由宪兵押送去的，过了一个多月，才集中起四十多个难友，再想增加人也放不下了，第一期训练就此开始。

战青团主任由张忠一兼任。这个家伙诡诈胆小，自己腰里经常带着手枪，还经常跟着一个带手枪的保镖。监牢里虽然有二十多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看着这些手无寸铁的政治犯，可是他仍不敢在里边住。他和护兵都住在村附近民房里，白天到战青团巡视几回，诈唬诈唬，晚上就回到他的民房小室去了。经常在那院子里的有三个人：政治教官王国璋，军事教官兼生活管理员阴燕英，人们都叫他阴队长，还有一个搞伙食的事务员张迺清，人们称他为张副官。殷劲戈虽然不在战青团担任什么职务，但隔几天也去一趟，把学员集合起来讲讲话，诈唬一番。受过他非刑拷打的难友们远远地看见他来了，都不寒而慄，低声耳语：“唉呀！殷秘书来了！”

第一期训练开始时，张忠一向我们宣布：战青团训练期限三个月，头一个月是劳动月，第二个月是训练月，第三个月是考核月。三个月期满，表现好的可以毕业，出去工作；表现不好的，继续留团，参加第二期受训。每天早晨，阴燕英吹两声哨子，催学员起床，然后集合排队出早操，主要是转圈子跑步，直跑到精疲力竭喘不过气来才停止。一日两餐都是盐水煮山药菜汤和带沙子的糜米饭。早饭后分派劳动，一半人有十来个带枪的士兵押着到野地里楼柴，一半人留在院里打扫环境，挖土和泥，搬石头、土坯，整修院子。每天晚上就寝以前，阴燕英集合点名，夜间寝室门前站上岗，每次换岗时前后两班哨兵都要进寝室里，挨个儿数点人数，难友们把这叫做“数人头”。

在训练月里，除了早操和劳动，每天上两堂课。王国璋讲“三民主义”和“共产党批判”，张忠一讲“领袖言行”，此外还邀请当时陕坝的要人讲话。傅作义和秘书长曾厚载，调统专员兼省党部书记长张庆恩，省党部委员耿正模，三青团书记赵仲容，以及合作事业管理处处长李树茂等，都给我们讲过话。千篇一律，都是谩骂共产党和八路军，威吓我们赶快“悔过自新”，否则没有生路。每次上完课或是听完训话后，总要逼着“学员”们讨论发言，只许说好，不许说坏。有一次讨论抗战形势，刘光明说了一句“各阶层的人都参加了抗日救国斗争”，就被张忠一训斥了一顿。“中国社会哪有个阶级，谁给你分阶层来，可见你的思想还有问题！……”结果在第一期毕业时把他留团了，又熬了三个月，第二期才毕业的。谷维义有一回在野外楼柴时说了句“明明是个监狱，偏要说这是个学校，还硬把这伙犯人说成是‘学员’！”这话被张忠一知道了，在集合站队时大加训斥：“谷维义，你为什么说我们战青团是监狱？你这不识好歹的东西，叫你尝

尝监狱的味道，你就明白这是学校还是监狱了！……”结果，谷维义也在毕业时被留下，又坐了三个月。

学员除了上课、听训和劳动，每天还得写一篇“反省日记”。人们下笔时无不小心谨慎，唯恐写错一句话或是用错一个字而惹下了祸。有一天，忽然在战青团院内的墙上贴出一张“号外”，是用毛笔写的大字报，黑字正文，红字标题。内容是蒋介石在重庆遇刺，受了重伤，还不至于致命，刺客逃走，正查缉中。张忠一命令学员讨论，可能是什么人行刺的？我们大多数人认为，可能是共产党派的刺客，也可能是日本间谍或汉奸。张硬是强调共产党的可能性最大，还板着脸孔说：“你们看共产党可恨不可恨！……”后来，我们才知道根本没有这回事，是故意搞的鬼把戏。他的本意是想通过这个消息，察看人们的情绪，是幸灾乐祸？是忧虑？是庆幸？还是怨恨？但是，人们都很沉着，没有什么突出的表情，使张忠一大失所望。

在训练月里，张忠一和王国璋还组织“学员”开过一次辩论会。辩论会设正、反两组，每组六、七个人。正组的题目是“国民党能领导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反组的题目是“共产党能领导抗战取得最后胜利”。辩论之前，发给些参考书刊，准备了几天，召集全体“学员”开会，辩论了两三个钟头。人们当然是故意让正组胜利，反组失败，结果是他们很为满意。也是在这个训练月中，张忠一等又玩弄一种新把戏。有一天忽然宪兵班长又引来两个新“学员”，穿着灰军衣，也来参加受训，一名张仲，一名张书华，据说是由八路军投奔过来的。我们这些旧“学员”，看出他们的来头不对，都怀着戒心，对他们客客气气，当着他们的面什么也不敢谈。

“学员”们每天除了出操、劳动、上课、开会以外，每周还

有两次文娱晚会。太阳西斜时，阴燕英集合“学员”在院子里围一个圈儿，席地而坐，强逼着几个能说会唱的人站在当中，说段快板或是笑话，唱个歌儿或小调，人们不得不强为欢笑，应付那个难堪的场面。

在考核月里，就不上课了，每天还是上早操、劳动、写反省日记。至于对“学员”们如何考核，谁也看不出来，大约是在暗中进行。张忠一这个凶狠的特务，他想当社会处长，于是异想天开地利用战青团这伙人，为他装璜门面，乔装打扮，硬是要把调统室伪装成一个文化团体，把战青团装点成一个学校，作为他在政治上向上爬的资本。他叫“学员”们排演了几个话剧和歌剧，到陕坝^①中山堂插进一次文娱晚会的节目中演出了一回。在演出中他自己扮演了一个日本鬼子的角色。此外，临结束时，又排演了一个大型话剧“塞上风云”。他把战青团这四十个人，组成一个“前进歌剧社”，由张忠一兼任社长，下分总务、剧务、演出等股。没有女演员，张忠一去请当时绥西有名的话剧演员沈珩，结果碰了钉子。他很生气的对我们说：“这个人思想左倾，不识抬举。”后来他从缉私处，找来一个女演员阎诗伯，又把调统室死了不久的一个特务的老婆过云瑾拉来，参加排演。

战青团第一期毕业后，“学员”们被分配到陕坝各机关、学校去工作。不久，张忠一又召集这伙人在中山堂演出了一次“塞上风云”。接着，他又带领着这伙人到八岱^②的绥远省军政干部训练团演了一次，还向陕坝第二小学借用了二十多个小学生去唱歌，骗了傅作义一批款。演完“塞上风云”回到陕坝，张忠一很

^①陕坝——傅作义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

^②八岱——陕坝东南二十多里一个小村，是绥远军政干部训练团所在地。

得意，又在“前进社”举办了一次“陕北戏剧界联欢会”，由前进歌剧社出名，邀请奋斗剧团、军人服务部和政治大队的剧团及一个业余京剧团，准备了一些茶点和节目，热闹了一番。不久张忠一病了，由陈国兴代替他兼任调统室和战青团的主任，从此这个勉强拼凑起来的剧团也就消声匿迹了。后来这个张忠一去宁夏养病，死在宁夏。

在考核月里，张庆恩这个大特务也曾到战青团住了两天，给学员们训了一次话，又和每个人作了个别谈话。省党部委员陈国兴也去讲了一次话。内容无非是那老一套的反共宣传。在毕业以前，张忠一还强迫我们四十多个人在写好的“反共宣言”上签了名，并且叫我们联名给傅作义上过一个“悔过书”。第一期毕业时，张忠一宣布：把表现不好的谷维义、刘光明、田中光三个人留团参加第二期受训。

先后被捕的人们，只有宁死不屈的郭北辰烈士，始终被关在临时监牢里，没有到战青团与这些人一起受训，后来听说被他们秘密处死了。听说死得很惨，半夜里，特务们带了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把他拉到野地里活埋了。

听说战青团第二期又有四十多人受训，可是怎么也伪装不成学校的模样了。他们在强制人们劳动和受训的过程中，残酷地拷打曾把一个当过省政府秘书的乔崇浩硬给折磨死了。以后听说这个战青团继续办了一段时间，虽然改换了名目，但其性质没有变。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中央统计局 察哈尔省调查统计室内幕

董 叔 明

一九四六年十月至一九四八年二月，笔者担任国民党中央统计局察哈尔省调查统计室（以下简称中统察室）主任。兹将国民党的这个特务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情况忆述如下。

一、中统察室的建立和有关情况

“中统察室”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察哈尔省调查统计室”。一九四六年，中统局改变名称为“中央党员通讯局”，中统察室亦相应改为“中央党员通讯局察哈尔省通讯室”，但因其组织系统、本质和活动内容基本未变，所以人们仍习惯地叫它“中统察室”。

中统察室是随着傅作义部队一九四六年十月间占领张家口而正式建立的，设立在张家口市，负责人是董叔明。在此之前，一九四五年秋，傅作义部队抢占绥远东部地区后，国民党中央驻傅作义部总代表张庆恩，曾派遣董叔明秘密潜赴中共解放区的张家

口，建立中统察室地下组织，嗣于一九四六年因暴露目标又撤离张家口。

当时，察哈尔的形势是傅作义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为了抢占抗日战争胜利果实，继抢占绥远省地区之后，又配合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孙连仲部夹击察哈尔省解放军，终于一九四六年十月间夺占了张家口。这时，中共晋察冀解放军除大部进行战略转移外，仍以一部与察省军区地方部队、游击队、民兵互相配合，继续坚持战斗，使国民党军队、政权机关只能局限在沿铁路线和一些城镇据点，处于内线作战的被动、挨打局面。

中统察室建立后，除紧密配合傅作义部队进行反共战争以外，还积极完成了以下的主要任务：第一、建立和发展察哈尔省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级中统党网（即有国民党党组织骨干兼中统特务骨干分子领导的党员监察网）、通讯员、各类情报通讯员及相应的各级党网和情报侦察组织，并协助重建国民党各级政权；第二、指挥察省各级中统组织搜集有关中共的各种情报，着重侦察中共军队部署、调动和军事物资储运情况，以利国民党军侵占解放区；侦察、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和工作关系，搜捕中共地下组织人员，即所谓“共党嫌疑”人员、“共特嫌疑”关系。

这个中统察室，如上所述，就是国民党中统局察哈尔省级特务领导机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核心特务组织。

二、中统察室组织机构存在地点、 时间等情况

①中统察室办公处。

办公处包括主任、书记办公室、情报指导科，组织训练科，总务科，交通组等。一九四六年十月间傅作义部队占领张家口后，开始设立在张家口市桥西西大院（原日伪蒙疆政府总司令李守信住宅）。一九四七年春这个西大院让给国民党空军站，办公处移在张家口市桥东中山大街北头路东大院，一九四七年冬该地址又让给财贸企业公司，办公处又移至张家口市桥东东安大街中段路北一座楼房内。

②、中统察室电台。

中统察室电台，开始设在张家口市桥西西大院。嗣因电波干扰大，不久迁移至南武城街义美和杂货店后院。

③中统察室审讯地点。

中统察室根据国民党政权组织内部分工和职权规定，拘押人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所以本身未设长久性秘密监狱。凡被该室逮捕的人员，只在该室受初步审讯并登记案件内容后，即转送有关单位——省会警察局、青训大队、侦察总队等处关押，问题严重的则送军法机关监押审判，或送万全地方法院监押审判。当时与中统察室配合审讯的军法机关，主要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长官部及张垣绥靖公署的军法处，其次是配合张家口警备司令部军法室，进行有关案件的审讯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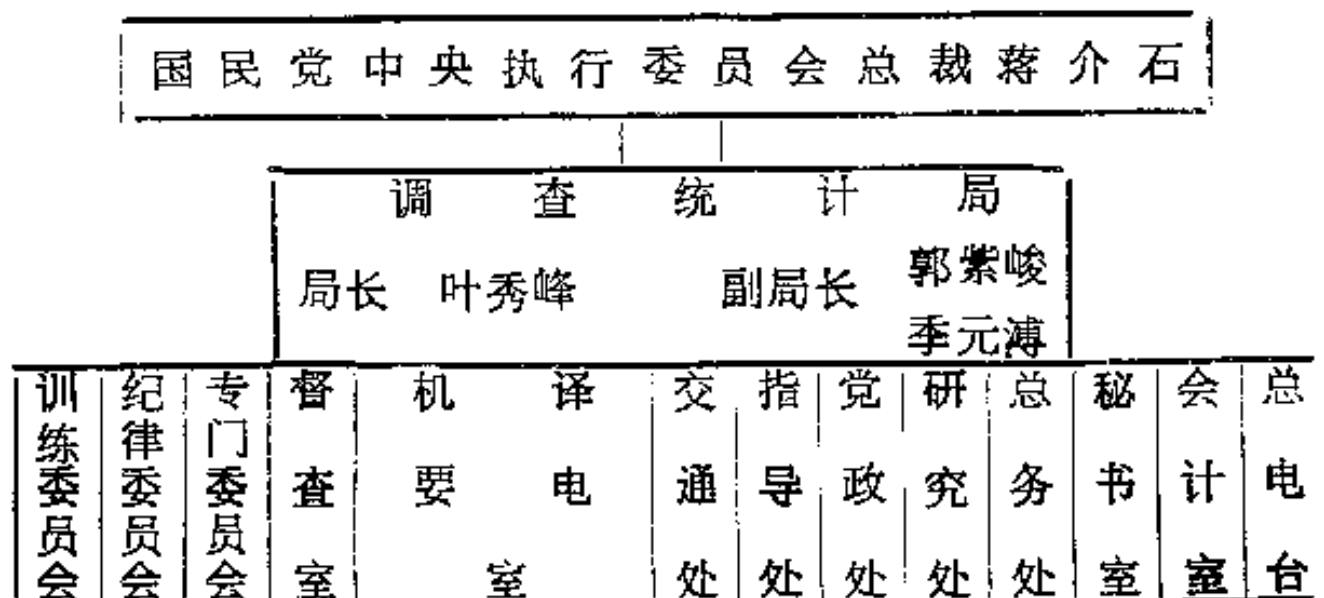
④中统察室直属的主要外围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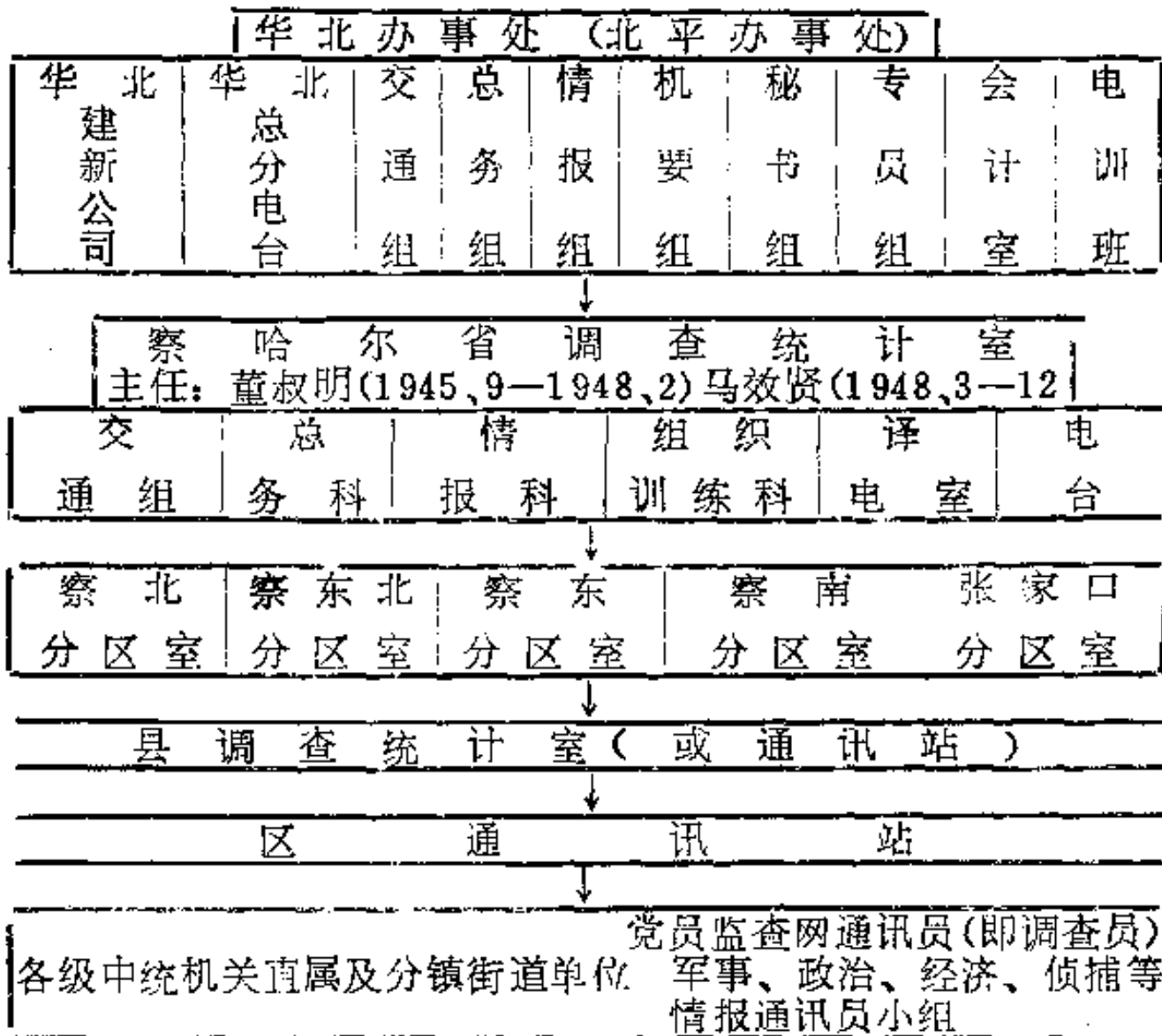
青年军通讯处，一九四六年冬至一九四七年冬在张家口中山大街。省党部通讯组，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间，在张家口明德大街省党部内。省政府统计处二科，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在张家口明德大街省政府内。特种经济调查站，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住在张家口宣化大街。

三、中统察室组织系统、 领导关系简况

解放战争时期，中统察室在国统区张家口市的时候，虽然对外称察哈尔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但是它的一切组织、业务、人事、经费等决定权都直接归南京中统局掌握，中统局长直接领导中统察室主任。只是在反共情报业务上，兼受中统局驻十二战区代表张庆恩及中统局驻北平办事处处长郭紫峻督导。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主任委员乔廷奇、书记长焦汝桥都是CC中统党政高干，只能监督中统察室党员通讯网和党员区分部骨干，以及督导董叔明兼管的通讯组的组织、情报业务，并且无条件地予以支持。兹将中统察室组织系统及领导关系列表说明如下：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
统计局察哈尔省调查统计室组织
系统及领导关系简表





四、中统察室直属“党网”

和情报通讯员简况

一九四六年十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虽然国民党军侵占了察省大多数城镇和交通线附近的一些农村，可是许多山区、牧区依然为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因此，双方军队不断进行拉锯战斗，整个说来察省仍是内战前线。

在上述情况下，中统察室的核心组织，不可能象一般老国统区一样，按照中统总局规定的模式、程序建立同样的下级特务机构，正常地开展发展组织，训练骨干，侦察情报和反动宣传的活动。中统察室为适应战争环境和条件，使用编制内的专职骨干，大力发展建立各种形式的直属的“党员监察网”、各类情况通讯员、外围关系小组（多为兼职），分布在各阶层、各地区、各单位，形成为反革命战争服务的情报网。

“党网”人员、情报通讯员都是中统察室的核心特务。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网”骨干可以领导情报通讯员，可以持“党网”证件联系取得军、警、宪的保护与协作，支持侦捕及监察国民党各级党、政、军人员，以及建议清除和逮捕具有反对国民党当局言行的爱国民主人士。凡中统党网都有一定的反动政治地位和权势，中统察室就指使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进行所谓党员监察工作。他们也奉命搞些政绩调查、人事调查、贪污调查、物价调查等等，但这些都是服从于侦破中共地下组织，侦探中共情报，配合反共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

至于中统察室直属情报员，系该室情报科直接发展控制的。他们一般是虽未参加国民党，但确有一定的积极反共表现。他们只有侦察情报任务，而无监察国民党内部的权力。这种人员比之“党网”人员有四十倍之多。

总之，中统察室存在期间，为建立或整顿省级及专区级分区室、县级通讯站、区乡级通讯组，计先后在国民党察省各级机关、部队、学校、企业中，发展中统直属党员监察网通讯员九百多人；直属情报通讯员二千五百九十多人，各种形式的外围工作关系七千六百五十多人。其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兼职的中统分子，专职的不过百分之十左右（核心领导骨干），基本上形成了

全察省范围内的反共侦察情报网，搜集中共有关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情报。

五、中统察室的主要罪恶活动

设立在国统区的国民党中央局察哈尔省调查统计室，从一九四六年十月到一九四八年二月，以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为中心开展各种活动，其罪恶事实是擢发难数的，现在仅就记忆所及概述如下一些情况。

①协助国民党建立地方政权，破坏解放区。

傅作义部队进占张家口之后，相继打通了平张铁路线，抢占城镇要地，向解放区进攻。在这种形势下，中统察室为迅速发展其特务组织并开展活动，主要是依附地方政权之扩建，配备一批党特领导骨干，以行政职务为掩护，从而发展组织和进行侦察情报活动。因为有的专员、县长本身即是中统分子，当然是无条件地支持中统工作，甚至可以说是军、政、特密切配合，协作无间。例如一九四七年秋，南义县县长杨一民领导的察北分室，指挥所属党网骨干会同县保警队，配合正规军作战，在袭击中共地方人民武装、抓兵、抢粮、劫夺物资、深入推动侦捕、侦察情报等方面，都是很得力的。赵大义担任察东专员，在赤城、龙关方面，也是这样。正因为如此，傅作义部队在察省作战中，由于军、政、特密切协作，如虎添翼，在镇压人民、破坏、进攻解放区方面，是很“得力”的。

②为国民党军侦察情报，紧密配合反共作战。

一九四六年十月傅作义攻占察省张家口后，蒋介石猖狂发动

内战，继续进攻察境解放区，企图捕歼解放军有生力量。根据这种形势，中统察室的首要任务是，除随着军事的推进积极建立中统各级组织外，要全力协助军事当局侦察中共晋冀察解放军主动撤离张家口后的动向，以利于傅作义部队之作战。同时侦察与探寻中共晋察冀边区级、察哈尔省级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下落，以便国民党军扫荡、奔袭。因此，傅作义部队在察境各地作战中，诸如崇礼、多伦、赤城、龙关、蔚县等地许多战役，中统各该分区室都及时地提供了情报，大大有利于傅部之作战。

③通过“联合汇报会议”推行反共政令措施

中统察室为了推行反共政策措施，除了在内部业务上加强研究部署外，还特别利用傅作义部队军事最高指挥机构——张垣绥靖公署，召开所谓“联合汇报会议”（即联合反共的决策性会议，又叫特种工作汇报会议），统一指挥党政军系统全面地贯彻其决议。这个会议主席是傅作义或由参谋长代理，张庆恩是该会议执行机关“联密处”处长。出席人是战区级、省级党、政、军、警、宪、特负责人。因为傅作义是察省最高权威，张庆恩秉承其意旨办事和出谋划策，所以中统局的任何指示，均可通过会议由张庆恩提出议案，让出席人经过讨论形成决议，然后责成各部门贯彻执行，并须定期在会议上或单独地向傅作义汇报执行情况及新的侦察情报。

④侦破、搜捕中共地下组织、人员。

侦破、搜捕中共地下组织人员，残酷迫害，广事株连，是中统察室罪恶活动之一。为此，中统察室一方面是通过它的组织系统进行严密侦察和搜捕，一方面是利用傅作义系的军、警、宪、特，密切配合，进行工作。以张家口市的情况为例，中统察室密切配合傅作义部张垣警备总司令部和省会警察局等部门，定时召

开“张垣侦察汇报会议”，专门研究侦捕线索情报和部署侦捕案件的进行。这种反动派内部分工执行决议、协作进行反共的组织形式，由国民党中央以至县级CC中统带头执行。在中统察室存在于张家口期间，曾先后以侦捕中共地下领导骨干、镇压爱国进步人士为目的，进行秘密侦捕，还发动所谓“统建”运动（即大搜捕）。如电讯局留用人员，一次即逮捕、株连三十多人。对于这些被侦捕人员，一般是望风捕影，肆意株连。被捕者监押在军事监狱，备受刑讯折磨，有的直到张垣解放。

（内蒙古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李知非整理）

1980年8月29日

张家口“青年训练队”

高 平

一九四六年冬，国民党傅作义所部占领了张家口，成立了“张垣绥靖公署”。一九四七年一月初，我随第十二战区政治部最后一批人员进入张家口。随着“张垣绥靖公署”的建立，政治部改编为新闻处。我原来所在单位一一政治工作大队，也就改编成新闻工作大队，仍属新闻处直接管辖。这时，新闻处的处长是周钧，主任秘书是苗屏章。处以下设有一、二、三科。一科科长李竭忠，二科科长段孔昌，三科科长郭玉堂。另外，绥署还没有纠察处、纪律科等，这些机构，实际上都归张庆恩的统计局操纵，新成立的“张垣绥靖公署青年训练队”（以下简称青训队）也是如此。

青训队成立以后，由于缺乏管理人员，就从新闻工作队借调了九人。有贾修道、耿剑秋（高平）、叶国华、刘锡禄、李翔、张照华、张瑞鱼等。到青训队干什么工作，却没有告诉我们。

我们去的是青训一队，另外还有青训二队和青年招待所。这些机构的名称听起来很好听，但实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只不过是一些巧立名目的变向牢狱而已。比如张垣绥靖公署青年招待

所，实际是专门审讯共产党人、关押共产党人的所在。不论白天和夜晚，招待所的大门和它的周围，都有士兵站岗放哨，院内的警卫也十分森严。凡是从战场上或什么地方抓来的共产党干部和战士，都要到青年招待所享受“招待”。这个招待所，当时据说是直接归绥署的纪律科领导。

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五日，我们到了青训队。这时，青训队的大队部和所属的几个科室，已经相继成立，有的已在办公。二十日左右，学员们陆续前来报到。开学典礼时，大队长王兰田在会上训了话。

青训队的大队部下设组织科、训导科、审讯科、总务科和两个分队。分队下面设有六个小队（也叫区队）。贾修道、耿剑秋担任分队长，刘锡禄、李翔、张照华等分别担任小队长。

学员受训时间一个月为一期，每期人员在一百人左右。这些学员都是来自街道、商店、学校的员工和其它劳动者，如拉黄包车的车夫、手工业的木匠、商店的店员，学校的教师，等等。他们都是在国民党进入张家口后，实行“联保联坐法”被“检举揭发”出来的，有的是和共产党发生过某些关系，甚或是曾经和共产党说过话的人，都被扣上“共产党嫌疑分子”、“危险分子”的帽子，送到青训队来受训。

训练的一般内容是学、术两课。每天上午时间大部分是出操上术课，教练一般的军事动作，如各种步法、室内外礼节等，由小队长或分队长担任教练。下午是学课时间，讲授三民主义和力行哲学等。讲课人员是由省政府、省党部等机关聘请的。星期日是休息时间，学员可以自由外出，不用什么请假手续，但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归队，否则就要受严厉处分。第一期有一个学员星期日回家，两周没有归队。一天晚上派了三个人到他家用绳子捆了

回来。在这一学期期满时不准他毕业，又留训了一期。

除一般内容外，每周还有重点内容。每期四周。第一周为“检举揭发”周，第二周为审讯周，第三周为定案周，第四周为宣传周。

“检举揭发”工作是训练内容的重要一环。在这一周的每天晚饭后，各小队利用业余时间召开小组会议，由每个受训人谈自己的情况，同时“检举揭发”别人。这些情况都要作详细记录，然后交到组织科。由组织科进行整理，并转给有关机构（如警察局等）进行查证。

审讯工作大部分是在晚上和深夜进行，这样办可能是怕受到外界干扰，或是为了保密。审讯科长姓程，东北人，大约有三十岁左右。因为他长着一脸落腮胡子，所以人们都叫他程胡子。审讯科要审讯哪个学员，预先就把要审讯的人员名单交给分队，然后由分队按时间给审讯科提交人员。学员们只要一听到审讯科提人，没有不害怕的，真是谈虎色变。我们分队部的住址距离审讯科约有二、三十米。因此，审讯中对学员的高声叫骂，或是学员挨打的惨叫声，常常把我们惊醒，扰乱得我们不能安生休息。

审讯情况虽然不得其详，但根本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完全是威胁打骂，任凭审讯员的摆布。如第一期有个学员叫丁戈夫，在审讯时，程胡子问他：

“共产党走时给你布置下什么任务？”

“我不是共产党，给我布置什么任务！”

“你不是共产党为什么叫丁戈夫？”

“那是在学校老师给我起的名字。”

“叭！”的一下，炉钩子打在了丁戈夫的头上，打了一个口子，鲜血从脸上顺着衣服流下来。第二天升旗上朝会，丁戈夫没有

到。班长说：“丁戈夫被审讯科打病了，不能到。”丁戈夫在青训队始终也没有承认他是共产党，但在当年十月的一天夜里，突然被纪律科抄了家，并把丁戈夫送到青年招待所。据说到一九四八年秋天，才从青年招待所放出来。再如第二期学员有个王执中，他在火车站开肉铺，生活比较富裕。程胡子想在他身上打主意，在审讯中一口咬定他是共产党。王执中一连被审讯了一星期，黑夜白天轮番进行，不让休息，脸上不知挨了多少耳光，也不知吐过多少唾沫。最后，还是王执中拿出一百元现大洋装进程胡子的腰包，才算了事。

凡是在审讯中“定案”是共产党人的，都要经过集体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这道手续。这样，毕业后仍可回到原单位工作。否则的话，就有可能被送到青年招待所去受“招待”。

关于宣传方面，则利用宣传周，组织学员分组到大街上宣传。宣传的办法和内容，主要是由学员自己“现身说法”，说明如何解决嫌疑并得到政府“宽大处理”的，从而诱骗那些同共产党发生过关系的人，也到青训队去受训。

毕业时，都举行毕业典礼。在这个典礼会上，除大队长王兰田训话外，还邀请有关单位，如省党部、新闻处的负责人讲话。会上还颁发毕业证书，每人一份。毕业证书上，大致是这样写的：某某学员在张垣绥靖公署青年训练队第×期受训届满，完成全部课程，准予结业。

张垣青训队同其它地方的青训队是一样的，如陕坝青训队、归绥青训队以及后来的北平青训队，都属于中统大特务张庆恩指挥之下。这些组织随着北平和绥远的解放才告结束。

（呼市政协供稿 1982、6）

绥远省“招致分会”

张 富 仪

抗战时期，绥远省会临时设在后套陕坝的时候，潘秀仁二次出任绥远省教育厅长。“招致分会”也随之活跃起来。这个“招致分会”的负责人，当然是由潘秀仁本人兼任，秘书是他的亲信韩梅圃担任。其他的一些工作人员，都是潘秀仁的喽罗。为什么叫做“招致分会”呢？这里，简略介绍一下。国民党CC系特务头子陈立夫于抗战前后，在全国各地都安插了他的爪牙，进行特务活动。尤其在国民党党务机构中，其绝大部分势力，属于陈立夫派系分子，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了。“调统”系统，则是其核心机构。抗战期间，陈立夫出任国民党的中央教育部部长，在教育部门中，又以CC系调统特务为主，实施法西斯教育，培植私人势力，进行特务活动，企图达到反人民反革命的阴谋计划。1939年，国民党中央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战地失业失学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简称“招致会”。起初，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领导。不久，改隶于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及至1941年，当时的教育部长，CC系特务头子陈立夫把这个机构抓到自己手里，由他本人出任该会主任委员，其嫡系分子操纵与主持这个会的一切活动。而在蒋管区的各省市，都设有“招致分会”。绥远省的“招致分会”，当然也由CC系分子所把持。

成立“招致会”的目的，是防止沦陷区的失业、失学青年转往陕北延安抗战圣地，参加抗战工作，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企图把这些青年进行法西斯教育，以便为蒋家王朝效力。绥远省“招致分会”负责人潘秀仁，秉承其主子陈立夫的意图进行工作。同时，为他个人培植私人势力，煞费苦心，搜罗网致，怂恿引诱，尽了一切卑鄙之能事。绥远“招致分会”从成立到解散，三年光景中，曾“招致”青年二百人左右。绝大部分被送到西南和西北各大专学校深造。在这二百余人当中，从沦陷区跑出来的青年，占三分之一左右。国民党中央规定，对于这些青年，应依照其老家和自身条件安置他们继续上学或者就业。但潘秀仁等在这些规定范围以外，又加了条件：第一没有“左倾”嫌疑；第二要有倾向潘秀仁的初步表现。得表现出“士为知己者所用”、“没齿不忘”才能得到“招致”的一切待遇。至于其他三分之二的被“招致”青年，并不是从沦陷区出来的，一部分是后套当地的，另一部分是其父兄与潘秀仁有关系的青年。家在后套的青年，本来按规定不属于“招致”对象，而潘秀仁为了在后套培植私人势力，加强CC系的力量，便大力拉拢。当时很有些青年上了其钩竿。为什么当时招致者和被招致者双方都热中于“招致”呢？因为双方都可以利用它。按当时国民党中央教育部的规定，凡是由各地招致分会介绍到后方报考学校的青年，成绩差不太多，就可尽先录取。在物质方面，还可以领到一些补助费等。据了解，由绥远招致分会介绍到后方投考大专学校的青年，都可如愿以偿，落榜的人几乎没有。抗战期间，尤其是在蒋管区，一般青年学生能考取当时大专学校，那是不简单的一件事。经过绥远招致分会的介绍，到后方投考学校的，去兰州技专、武功农学院以及四川各大学为多，报考以上这些学校的

青年学生，的确都被录取了。曾听到当时有后套籍的应届毕业生，凭自己的毕业证书和学习成绩，到后方报考学校没有被录取，托人经绥远“招致分会”介绍后，当即被录取，到期毕业。再如笔者知道当时有一个山西籍的女孩子，由榆林随其父到了后套，曾报考绥远师范，未被录取。之后，托人请“招致分会”保荐，仍用原名，只把山西籍贯改为包头籍贯，便被收为师范学校的学生，入校上课。诸如此类的事例很多，不必多举了。这样一来，绥远招致分会就成为一般青年学生深造的所谓保险公司。尤其是平时功课不好个人毫无把握的地富子弟，往往想尽办法，仰人说情，当然须与潘秀仁派有关系的人才能办到。这些人彼此间逐渐搭上了“套”，正中潘某的下怀，成为潘某的“培养对象”，甘心为潘某指使和效劳。

抗战时期，潘某曾苦心孤诣地计划要在后套地区发展私人势力，培养CC系分子。例如五原的张守仁、冯铭汤、吕璧、张锦明等，安北的王世英、晏江的王会文等，都是由潘秀仁一手培植起来的。就以冯铭汤来说吧，他于一九四七年夏，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毕业返绥，先分配荐任职视察员，一九四八年年底提升为萨县副县长，四九年一月一日马上提升为安北县县长。由学校毕业分配工作，到出任县长，仅二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提升这样快，是潘秀仁代省主席任人唯亲的结果。再如张守仁，他在五原县政府先担任科员，很快提为科长。48年间即由潘秀仁提升为五原县副县长，潘秀仁本来是CC系在绥远地区的唯一负责人，是多少年来坚决与人民为敌，进行反人民反革命的罪魁之一，所以，他很需要不断培养他的新爪牙，尤其在后套地区。这些人在他公开和秘密命令、指使下，从各方面进行反革命活动。在潘的影响下，这些人曾经是坚决与人民为敌，反动透顶的坏家

伙。都是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潘秀仁培植反革命势力的如意算盘，也有不如意的时候。有的青年学生，接受了“招致分会”的介绍，甚至也领过他们的“补助费”，但到后方报考学校半途改变了方向，转到延安抗大学习去了。这些事实潘秀仁之流知道后，大伤脑筋，但又奈何不得。

绥远“招致分会”的经费是比较多的，潘派曾经乘机大大地发财。当时有知其内幕的人透露说，“招致分会”很肥，很长时间都是造的假账簿，这些人藉此捞油水。潘秀仁在政治上占了便宜，又在经济上得了好处。用人民的血汗肥了自己，再把枪口对准人民，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逻辑。他们从中央到地方，如出一辙。

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东北 和内蒙古地区的特务间谍活动

正珠尔扎布

一、日俄战争前

早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副岛二郎即化装为中国人，只身潜入我国兰州、伊犁等地进行间谍活动。以后，又潜入阿富汗尼斯坦（现阿富汗王国）和中央亚细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称赞这一活动是了不起的“壮举”。其后，又有福岛安正少佐的西伯利亚单骑旅行。他也是由我国东北北部潜入帝俄领土的。这是日本现役军人明目张胆的军事间谍活动。他后来升为大将，曾任日本军参谋总长。这两个间谍分子在当时日本国内被广为称颂，并誉为近代日本国际间谍的鼻祖。

二、日俄战争时

日俄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争夺我国东北领土，准备

对帝俄作战，向我国东北派遣了大批的男女军事间谍。如女间谍河原操子、伊藤大尉、吉田中尉、冲贞介、横川某、中岛比多吉、边见勇彦、大岛与吉、松冈胜彦、镰田弥助、吉田忠三郎、花田少佐等等。这些军事间谍是由日本参谋本部，经过驻北京日本公使馆青木大佐而派遣的。女间谍河原操子，是通过公使馆翻译川岛浪速与肃亲王善耆拉关系，由肃亲王把她秘密送到喀喇沁右旗王府。肃亲王与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有亲戚关系，把河原操子介绍给贡王，名义上当贡王的家庭教师，实际上是秘密进行间谍活动。这样，日本即在我国东北领土上建立了间谍活动的根据地。河原操子在日本、上海已学会了中国文字，在北京肃亲王府又学习了日常中国话，并练习穿着满洲妇女服装。她感到最难的是穿高底满洲妇女鞋。中国妇女的脚一般细小，日本妇女平常光脚丫儿或穿牛蹄袜子，脚板又宽又大，成四方形。因此，没有她合适的鞋穿。人们只要稍一留心她穿的特制的鞋，就看出不是中国妇女的脚。这脚的问题，同样也是日本男间谍们头疼的一件事。这些男间谍虽然学会了一些中国话，穿着中国服装，留了发辮，但日本男人的脚和中国男人的脚也显然不同。日本男人的脚趾是散的，中国男人脚趾是二趾背着大趾。所以，他们最容易由此露出“马脚”。

河原操子以贡王家庭教师名义为掩护，陆续输送由日本派来的许多军事间谍到我东北和内蒙各地。河原回国后，代替她来的是鸟居龙藏夫妇。一九三〇年，鸟居夫妇和他的女儿绿等凭借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为满铁）的特务据点郑家屯满铁公所，在所长大特务菊竹稻穗（实藏）的大力帮助下来到林东、大板等地，伪装调查考古，从事特务活动。菊竹派所员浅野良三和萨嘎拉扎布等帮助他们工作。鸟居龙藏是日本考古学博士，一

贯阴谋策划侵略我东北。

日寇在喀喇沁王府建立了间谍活动据点后，派遣现役军人伊藤和吉田充当贡王的军事教官，打入这个间谍集团。又继续派遣冲员介和横川这两个间谍，企图深入北部破坏帝俄军后方运输线，炸毁东清铁路的嫩江铁桥。中途被帝俄侵略军发觉逮住，在哈尔滨被枪毙。后来日寇给他们俩在哈尔滨还建立了纪念碑。

还有日本间谍松冈胜彦，假称王大人，潜入到新民、新立屯、彰武等地，搜罗一些当地的土豪劣绅胡匪，编成“洋队”，扰乱俄军后方，切断运输线，抢夺粮秣弹药及其他军需物资。参加这个“洋队”的有冯麟阁、巴布扎布等人。这支“洋队”在俄军后方很活跃，配合日军长沼挺进队，进行破坏范家屯铁桥等活动。花田少佐假称花大人，编成“花帮队”，在东北地区活动。其他日本军事间谍，也都分布在我东北各地，进行了大量间谍活动。后来，日寇论功行赏，镰田被任北京、奉天满铁公所所长。大岛任满铁嘱托（即特务），每月以三百元的高薪被豢养着（他那时受伤，失去一条腿）。中岛、吉田等在伪满宫内府任高级官员，松冈在大连设立大连郊外土地株式会社。

上述这些，是我所知道的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军事间谍的一部分人。这些日本军事间谍，在当时虽然是为了在我国领土上对帝俄作战，但他们所得到的各种情报，却成了以后他们继续侵略我东北的重要资料。

三、满铁的特务组织及其活动

日俄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而告终。日本从帝俄手里

夺去东清铁路（后改为中东铁路）南端和关东洲租借地，于此更加猖狂，准备进一步侵吞我全东北地区，公开利用满铁的各种组织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务间谍活动。

满铁是日本侵略我国的大本营。早就有人说过，日本的满铁就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它的企业组织规模是庞大的，其子公司之多，包罗之广，不胜列举；投资额日益增加，由二亿日元（当时的日币），进而四亿日元，直达八亿日元。整个满铁是侵略我国东北的公开组织，我们只要抓住这一点，就可以了解它的全貌。即以伪满洲国的成立来讲，组织伪政府的活动，全是满铁一手包办的。伪“自治指导部”的重要成员，多数是满铁社员。而伪满洲国成立后更不用说了，绝大多数日系官吏都是满铁的少壮社员，各部门的中坚干部全是满铁出身。例如：伪蒙政部的前身兴安局刚成立时，任次长的是郑家屯满铁公所长菊竹，总务处长是满铁驻奉天情报主任白滨情澄，总务科长是满铁出身的小岛某，科员有满铁出身的浅野良三，劝业处长是满铁出身原某，畜产科长为满铁出身的仓重某，会计科长川口情次郎也是满铁出身。由此可见，伪满政府组织之快，满铁早就有所准备，甚至办公用的桌椅书柜、文件档案处理方法，都是满铁式的。伪满成立后，各地的特务组织满铁公所一律取消了，原因是伪满成立就用不着这种组织了。

关于满铁的组织、经营和在伪满组织里许多满铁派来人员的活动情况，这里不准备详说，只略谈它的特务间谍活动的一部分。我曾于一九二九年在一九三一年在郑家屯满铁公所任嘱托，在所长大特务菊竹稻穗手下做工作，所以对这个公所的特务间谍活动知道一些。满铁的交涉部（后取消）管辖的有奉天（沈阳）、吉林（龙井村，敦化有驻在员）、洮南（突泉县有驻在员）、齐

齐齐哈尔、哈尔滨、北京等满铁公所，上海、纽约有满铁事务所。这些满铁公所，表面上的事务是对外交涉，以及管理满铁各处的设施——学校、农场、医院等；实质上重要的任务是搜集我东北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以供本社扩展计划参考，同时为日本关东军提供战略作战情报。满铁公所实质上就是满铁特务组织的触角。

大特务菊竹是日本大分县人，个头中等以下，典型的日本人身材，光头，走路身体老是往左歪着。他毕业于日本东京外国语学校蒙古语科第一期，会蒙、汉、英等语，但都不大流利。毕业后，一九二一年由日本财阀三菱供给资金，在奉天省郑家屯开设三泰祥烧锅，自任总办。以此为据点，他开始了在内蒙古东部地区的特务间谍活动。他时常穿着中国便服，带着佣人韩鸿声（汉人）到各地旅行，深入到扎鲁特左右旗、阿鲁科尔沁旗、巴林左右旗、东西乌珠穆沁旗等地，结识了许多蒙古王公、活佛、大喇嘛，从而收集各种情报报告给郑家屯满铁公所。一九二七年，所长小川辞职，推荐菊竹继任。菊竹在蒙旗的活动，对满铁和关东军贡献很大。由于他详细了解蒙古地方情况，因而满铁把他提拔为郑家屯满铁公所所长，不久又升任满铁参事。

菊竹任郑家屯满铁公所所长后，利用满铁的有利条件，在内蒙古东部乌珠穆沁等旗活动更为频繁。他深知内蒙东部地理形势、人物和人情风俗，成为日本的所谓蒙古通，菊竹总办的名字为内蒙东部地区各地普遍熟悉。他除了自己直接工作外，还组织职员、嘱托等进行活动，以及收买地方人士为其利用。如当时郑家屯车站副站长即为其收买，还利用满铁的“免票”拉拢一些地方要人，并以满铁名义给蒙古王公喇嘛贷款，等等。他给莫林庙活佛阿旺图巴丹贷款，还卖给枪支，唆使造反。扎鲁特王用牛群作

抵押的贷款，到期无力偿还，满铁并不没收，仍然放在该旗，称为“预托牛”。他借口给预托牛打预防针，随意进出该旗。我曾随同公所职员林昌雄到扎鲁特右旗打过牛疫预防注射。菊竹花样之多，真是个中翘楚。他的手腕非常毒辣阴险。如往外贷款，并不打算收回，目的是把借款者掌握在满铁手中，好由他随意摆弄。他很讨厌关东军直接派遣军事间谍到蒙古地方。菊竹背后非常不满意地说：“关东军太粗鲁了，派遣现役军人太显眼，很容易被中国当局发觉，以后事情就不好办了。需要情报，这儿有我，要啥有啥呀，何必还派人来呢！”

菊竹当所长后，私人开设了一个买卖牛的店房，用他的私人爪牙张东昇为经理。张在本地有相当势力，有关该地的情报由他替菊竹搜集。菊竹还与当时的土匪“天下好”^①等有联系。“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菊竹仍任所长。伪内蒙古自治军成立，他在幕后活动，派职员笼谷参加。一九三二年，伪满洲国成立前夕，在他的主持策划下召开了“蒙古王公会议”，诱使东部内蒙古加入了伪满洲国。伪兴安局（伪蒙政部的前身）成立，他被任为兴安局次长，实际上掌握了统辖蒙古的实权。起初任命的伪兴安军司令官、伪兴安各分省长、旗长、各警察局长等人选，都是由他来选定的。

一九三三年，菊竹辞职回日本。经与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联系后，又回伪满当特务，关东军和满铁每月各给他机密费五百日元，从事活动。他在“新京”^②创办了蒙文《青旗报》，从事宣传日满一德一心，从思想上奴化蒙古民族。他经常向关东军方面

① “天下好”——系当地土匪某的绰号。

② “新京”——当时伪满洲国的首都，即现在的吉林省会长春。

提出治蒙方案和有关的建议和报告。这些情况在“新京”他曾与我谈过。

郑家屯满铁公所所长直接掌握情报工作，派庶务主任何野通一专管收集情报，所属的职员、嘱托他们侦察情报向他汇报。蒐集情报的手段多种多样，通过旅行收买各地的蒙、汉要人，从而探取情报；在蒙古内地调查地形、气象、资源、牲畜发展和疫病情况，以及地方治安情形；通过与地方人士拉拢，收买利诱，窃取各种军政情报。如他们在郑家屯、通辽以及开鲁街里，对当地粮价、产量、钱庄、金银钞票行市、各商店存货、出入货物数量和销售额、铁路运输情况，以至要人往来、军队移动、土匪活动等，都作详尽的侦察分析，用密码随时和定期地电报本社。

满铁公所还是一个日本特务间谍潜入转运的据点。它为来往的日本特务间谍提供种种方便。如介绍到蒙古地方应注意的、必要的知识，贷给需要的服装，等等。一九二七年，满铁派一批特务间谍（其中包括退伍大佐远藤寿俨）潜入外蒙活动。这批人到外蒙即被当局逮捕。满铁为了赎回这些人，当时曾派理事松冈洋右到北京活动，花了数十万元才获释放。远藤回来后，在郑家屯满铁公所整理了他的间谍活动报告。一九二八年，满铁向图什业图旗（科右中旗）派遣一批特务，调查了该旗资源和各种情况。后来满铁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图什业图旗资源调查报告》。

一九三四年，伪满成立后，日寇进一步明目张胆地侵入我锡林郭勒盟。当时满铁同关东军合伙组织了一支武装的特务间谍队伍（称为满铁调查队），由满铁派了五、六名各种专家，携带着电影拍摄机、盐水浓度计等等器材；关东军派小川太三郎大尉等参加；伪蒙政部派了调查科员五十岚浩五郎和正珠尔扎布等人。为了安全，关东军还派了林西守备队骑兵一个排，由仓重中尉指

挥，藤井队长也藏在军中。小川带着详细的军用地图，分乘十余辆卡车，由林西经五十家子到达乌珠穆沁右旗王府。小川游说该旗王爷，宣传伪满德政，威胁利诱，强行调查地形，对照地图，测量盐湖浓度及探查其它资源。当时还赶上敖包祭（那达慕大会），乌珠穆沁王亲自前往参拜。乌珠穆沁王非常肥胖，骑不了马，小轿车也挤不进去，只好跨在轿车的车沿上坐着、银鞍白马在后边牵着，两行仪仗队捧着各种各样的古式旗幡，长达四、五百米，颇呈奇观。这个场面也被拍入影片。

四、其他形形色色的特务间谍

早在旧中华民国成立初期，日本特务盛岛角芳娶了汉人妻子，装着一副穷买卖人的模样，长期居住在张家口，以此为据点在张家口一带至西蒙各地，从事特务间谍活动。日本人称誉他为张家口的活字典。

一九一六年，巴布扎布加入宗社党时，有不少日本特务间谍分子参加了巴布扎布的部队。如川岛量平、退伍军曹松隈据吉、井上晴能、北条某、斋藤某、退伍工兵大尉入江种矩、陆军大学学生本告辰二、退伍炮兵少尉西冈元三郎等。本告攻打榆县时战死。后来川岛量平管理肃亲王的露天市场，发了财，回国后修建了一所川岛宿舍。入江回国后入黑龙会当主要干部，操纵黑龙会。西冈回国著了一本名叫《吹呀，蒙古风暴》的书，宣传巴布扎布事迹和战斗经过。西冈又入了日莲宗改名为大元，于伪满洲国建立后在奉天北陵向溥仪要了一块地，建立了一座“满洲灵庙”。这庙是为了祭祀伪满建国时死亡的日本军人和汉奸走狗用的。他还与奉天皇寺隆喇嘛有联系。

一九一七年，日本邪教主出口王仁三郎妄想称王，勾结胡匪芦占魁在白音他拉（现在的通辽县）附近骚扰活动。不久，芦等被击毙，出口被逮捕遣返日本。回国后，他积极扩大邪教，在京都陵部盖了寺殿，还在横滨笼络一些蒙古青少年，培养汉奸走狗。伪满皇弟溥杰与嵯峨浩结婚前，出口曾请托肃亲王善耆第十二子宪均给溥杰说亲，并给宪均送礼五百元，但被宪均拒绝。

日本特务薄益三混入胡匪中，号称“天鬼”。一九二六年，到开鲁、林东、大板上等地活动，拉拢巴林右旗王扎噶尔。后来在奉天扎根，组织一些浪人，对中国人进行欺骗勒索，并进行特务间谍活动。

一九一九年，儿岛某潜入外蒙大库伦（现在乌兰巴托）开设私人医院，以医疗工作蒙蔽人们的耳目，潜伏活动。终被发现，驱逐出境。

一九二〇年，日本浪人特务高纲信次郎在我东北北部以及西伯利亚一带活动。回国后在东京开了极光咖啡馆。以后又回东北，潜伏在营口满铁国际运输公司当特务，也到过郑家屯等地。伪满洲国成立后，任伪兴安省次长、王爷庙（乌兰浩特）协和会本部长等职务。

一九二四年前后，日本间谍退伍大佐松井清助潜入锡林郭勒盟活动。他假借为上海、天津等地“跑马会”买马名义，率领着蒙古人宋福山时常来往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受关东军命令充当伪内蒙古自治军顾问。一九三二年，在开鲁北古鲁本井附近被击毙。

一九二五年，日本大阪外国语学校蒙古语科毕业的特务猪口三藏也潜入外蒙古大库伦活动，曾被捕坐牢。后来逃回到呼伦贝尔盟海拉尔，继续进行特务活动。伪满成立后在海拉尔日本陆军特务机关和伪满军顾问部当特务。他会汉、蒙、俄语。因为他会

蒙古哈拉哈语，曾参加过满蒙之间国境划界会议。以后发了财，在大连买一所房子闲住。

一九二五年，日本特务×目恒雄潜入东部内蒙古洮南、通辽、齐齐哈尔、呼伦贝尔盟海拉尔等地活动。在海拉尔，他以日本妓馆富山楼为据点，收集一些蒙古青少年领回日本豢养。伪满成立后，他又在一九四一年受日本参谋本部的密令，携带着照像机到锡林郭勒盟，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进行侦察活动。

一九二八年，日本浪人志村等人在东京日日新闻社的支持下，组织“满蒙骑乘旅行”，进行特务间谍活动。“骑乘旅行”的监督是退伍骑兵中佐中屋某，参加者有日本浪人在关东州大房身开过牧场的冈田猛马，退伍宪兵宗像仪一和大特务菊竹推荐的蒙古人巴图孟和吴宝山（假称汉人）。他们骑着蒙古马，由满州里日本领事馆前出发，沿中东铁路东进，到哈尔滨南下，他们骑乘过的蒙古马还曾在东京上野博览会展出过。这个骑乘旅行是选择我东北最严寒的季节进行的，目的是搜集在严寒地带作战的参考资料。他们把在我国东北所经过地方的详细情况记录下来，如气象、地形、人情风俗等等，呈报给日本参谋本部。在日本国内的旅程中，冈田猛马弹着琵琶、唱着歌曲，宣传侵略我满蒙的政策。途中参加了在偃冈志贺之岛日莲宗和尚高锅日统举行的“蒙古供养塔”揭幕仪式。这座塔表面上是为元朝进攻日本而死亡的蒙古人建立的，其实是借以宣传日本的“慈悲博爱”，号召“日蒙亲善”。骑乘会还出版了《满蒙铁蹄三千里》一书，大肆吹嘘他们的壮举。伪满时，冈田任满洲拓殖会社理事。宗像曾任伪军官，东奔西走，收集资金，在通辽建立了“蒙古忠魂塔”，以后当了大连马场的挥旗手。

一九三〇年，关东军间谍渡边卯一郎大尉，身穿中国便衣，

假称学蒙古语来到郑家屯，在两个月期间，调查了兵要地志，拍摄铁桥，绘制了地形图等。伪满建立后，他任国务院弘报处密码主任，将伪满所使用的密码掌握在他手里。“八·一五”解放，被苏军俘捕，一九五〇年由苏联引渡给我国。他在战犯管理所被管押期间，完全承认了这一特务间谍活动。

一九三一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其借口之一是中村大尉事件。中村大尉是日寇派到我国内蒙地区王爷庙、索伦一带的军事间谍，从昂昂溪日本特务据点昂茶旅馆，领着旅馆主退伍曹长井杉，又雇了一名蒙古人响导，潜入当时邹作华（张学良属下的一个部队长）的索伦屯垦区，刺探军事情况。他们在察尔森附近被发觉，逮捕枪毙。对于中村的失踪，日方非常焦急，但探查不清真实情况，关东军向各地派遣特务密探，继续进行侦察搜索。有一天晚上，两名中国军官到洮南一个日人妓馆游逛（妓馆即带有搜集特务间谍的任务），拿出一块金怀表玩弄着。妓女看到眼里，翌日即报告给满铁特务组织洮南满铁公所。该所听取了妓女报告的情况后，当即转报给关东军，关东军断定中村大尉等是被索伦屯垦军杀害的，于是向东北当局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和要求，以此借口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公开侵占我东北三省。伪满洲国成立后，日寇还为这些间谍在察尔森建立了纪念碑，在昂茶旅馆设祭井杉。在上述中村大尉潜入索伦一带的同时，日本关东军又派遣由青木兽医大尉率领的一批军事间谍去侦探打通线（通辽——打虎山线与满铁是平行线，日寇最反对的），侥幸没被发觉，达到了侦察目的。

一九三二年，日本特务长岭某到海拉尔，以“哈老少”旅馆为据点进行间谍活动。

一九三二年，日本浪人退伍中尉和田劲任东亚善邻协会主

事。有一天，和田找我要一名蒙古翻译，据说是要到锡林郭勒盟去旅行。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翻译，就推荐了一名叫满达呼的，他参加过巴布扎布部队，懂得几句日语。他们到锡盟后大肆活动，拉拢了该盟六、七名王公，组织他们到伪满各地参观，盛宴招待，蛊惑利诱。东亚善邻协会前后两次做过这种阴险毒辣的勾当。

一九三四年，日本特务女扮男装的中田美那子，年纪三十上下，在我东北各地进行特务间谍活动，并著有《满蒙纪行》一书。

一九三五年（？）的一天，日本大阪外国语学校蒙古语科毕业的特务某某，找我说有密事相托。他说要组织一个到乌兰察布、阿拉善等地的调查队（特务间谍队），由归绥（即今呼和浩特）出发，请我代找一个蒙古人做翻译。我当时找不到合适人选，遂令我家里的一个青年扎木萨（会几句日本话），权为充当。他们一行六、七人，扎木萨同他们到了归绥，准备起程的东西：买骆驼、粮食、帐篷等等，又各自带着武器。扎木萨感到情况不妙，有危险，怀疑它不象普通旅行，就偷偷地溜回来了。这批特务间谍潜入上述地区，为时不久即全部被击毙。这事当时还登过报纸。

日本特务麻生达男，化名麦德尔扎布。他是王爷庙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主要特务，在日本大阪外国语学校蒙古语科毕业后，即在大特务金川耕×大佐手下工作。他的蒙古语特别是锡盟语非常流利，经常穿着蒙古民族服装，举动言谈谁也看不出他是日本人。他还豢养着一名蒙古人，称作他的干儿子小麦德尔。他时常住在锡盟，主要是刺探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情报。大特务金川的一张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配备图，就是他编制的。光复之后，

小麦德尔被枪毙。

日本特务加藤某在葛根庙伪装喇嘛，把持庙的一切，强迫喇嘛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蒙效劳，并侦察和控制喇嘛们的思想动态。

四平街的日本本愿寺和尚佐藤某，是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的特务，活动在我东北地区和西部包头之间。他是受包头特务机关长野田又男少佐的指挥。他曾到郑家屯访问过野田，野田向我介绍过他的情况。

还有不少特务，如佐×富口、林某、平某、中泽达吉等人，在我东部内蒙古活动。佐藤在新京成立了蒙古实务学校，林某在海拉尔成立了“林塾”（私塾），奴化蒙古子弟。林某一直在海拉尔特务机关和伪满军顾问部当特务，后来，林塾成立了海拉尔蒙古小学。平某人娶了布里亚特蒙古女人白玛莉为妻，在海拉尔一带进行特务活动。另外还有伊达顺之助、甘粕正彦、諏访英武等，主要是在我东北汉族地带活动，他们与当地的日本守备队有密切联系。后来，伊达顺之助与张宗昌拜了把兄弟，改名为张宗援，任官少将，在我安东地区和山东一带活动。他是日本大化会（暴力团体）的会员，也与黑龙会有关。甘粕是一九二三年日本大震灾时暗杀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夫妇的杀人犯。当时他任东京宪兵队宪兵大尉，被判处徒刑。以后，来我东北活动。伪满时曾任满洲映画会社理事长。

日本军事间谍林义秀少佐于一九二八年到齐齐哈尔市，设特务据点于日人经营的龙沙旅馆，伪装为贩卖“太阳牌”胶鞋的老客，经常与日本领事清水八百一和黑龙江日本军事顾问水深中佐等取得联络。他直接领导孙仲元、张慕贤、张慕森以及日本人大吉等进行特务活动。“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他才换上了军

装，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代表身份出现，拿着本庄的亲笔信与马占山交涉。马占山“反正”后，他以特务机关长身份控制黑龙江省的军政各机关，直至一九三三年去职，由松室孝良大佐继任。

林义秀公开担任特务机关长后，为了奖励为他出力的特务腿子，派张慕贤在黑河、安北、龙江、哈尔滨、伪兴安南省各地开设赌场（设有花会局、宝局、牌九局及九点局等等），仍然继续进行特务活动。华北沦陷后，他又在河北、河南各地，开设赌场多处。他通过赌场掠夺的不义之财，一部分交给当地特务机关作为机密费，一部分给他的腿子们作活动费，一部分由他本人和特务头子分掉。他的收入相当庞大。他的腿子数以千计，是一个汉奸特务的庞大组织。

这个林义秀还派了张慕森（系张慕贤之弟）在黑龙江各地包揽工程，在工人队伍中进行特务活动。他还派孙仲元为黑龙江警备司令部中校秘书兼齐齐哈尔电灯厂厂长，以便在伪军中进行特务活动，监视电灯厂工人。

综上所述，在伪满洲国成立前后，日本帝国主义为贯彻其所谓满蒙政策，从而实现霸占我东北三省的狼子野心，明目张胆地在我东北地区设置领事馆、陆军特务机关、满铁公所等，广泛地潜入各地进行特务间谍活动，此外还向日商药铺、当铺、旅馆、妓馆、寺庙等，布置一定的特工任务。如齐齐哈尔金山当、大吉洋服店、富山堂药铺、胜利缝纫机店；海拉尔富山楼妓馆、太阳堂、洮南妓馆；昂昂溪昂荣旅馆等等。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东北的特务组织，真是密如蛛网，星罗棋布。这么多的特务组织，在东北沦陷前，为日本的侵略军服务；在伪满建立后，它们自然地转向镇

压人民群众。为维持其“帝国”的殖民统治而服务了，而且在组织领导上日益集中和加强。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八日

五当召日本化装喇嘛赴藏被捕始末

巴靖远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吞中国的野心日甚一日。除了部署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力量，向我东北、华北得寸进尺地进犯以外，还利用我国的民族败类——溥仪和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等先后组成了“满洲国”和“蒙疆自治政府”的傀儡组织，向华北及整个内蒙地区进犯。为了达到侵吞整个中国的目的，还配备了大量的特务人员，采取各种方法，深入我国各阶层各角落、搜集情报，刺探军情。出于这种特殊需要，还在我国东北蒙旗的召庙里安插和训练一些专门研究蒙族语文和“喇嘛教义”的特务喇嘛。这些人以喇嘛身分，周游各地，深入蒙古、西藏，藉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下面这段史实，就是根据五当召扎莎克大喇嘛禄补生开尊（亦称赤武大喇嘛，系原土旗总管荣祥的三胞兄，以下简称禄大喇嘛）在一九四四年和我同居绥西峡坝时亲口叙谈的情况，回忆编写的。

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占绥包以后，便重视并插手于喇嘛教三大召庙之一的五当召（广觉寺）。一九三七、八年间，驻包头的日本特

务机关，由一位部长叫乌格达（日语译音，此人也略通蒙语）的，代表特务机关，到五当召和负责的禄大喇嘛会见联系。他一再声明，日本也是信仰佛教的国家，对喇嘛教不但不见外，而且非常崇敬。所以，对内蒙古的召庙寺院，要负责保护，绝无破坏之意。当时召内的喇嘛们听了这些甜言蜜语，信以为真。认为中日信教一致，情感也就亲近了。所以，在日寇侵占绥包的初期，五当召的多数喇嘛，对日寇的侵略阴谋，并不认识，相反，他们还对日寇有一定的好感。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特务机关便认定五当召是学习蒙语、了解蒙人生活习惯、宗教仪式，培植特务的最好场所。所以，他们在一九三八年就派去两个日本喇嘛，名字叫萨赛（译音）和尼玛杜（译音）。这两个初到召上，虽然也穿着喇嘛装黄袍子，但是蒙语还不太精通，而且他们的生活习惯也与蒙族喇嘛不太一样，所以就声明是日籍喇嘛，是来五当召“钻研经卷，学习喇嘛教义”的。当时，召上的喇嘛们因为都知道他俩是日本人，谁也不敢得罪，就连该召的禄大喇嘛，对他们也非常尊重，更不敢歧视。此后，过了一个阶段，又由察哈尔多伦喇嘛庙来了两个喇嘛，他们拿着甘珠尔活佛（即多伦金鹏喇嘛庙的活佛）的介绍信，特来五当召学习经典，深造佛学。介绍信中说，“这两个喇嘛是东北郭尔罗斯旗的蒙人，曾留学日本，会一口好日语。因为他们从小都出家当过喇嘛，现在仍愿继续深造。”等等。这两个喇嘛到五当召以后，和该召的顶目气喇嘛索特巴丹京（系察哈尔白旗蒙人）相处的非常亲近。他们究竟是老相识，还是新交的朋友，那就不太清楚了。索特巴丹京顺着甘珠尔活佛的话说，“这两个喇嘛都是东部区的蒙人，一个叫塔吉尔，一个叫尼玛达，都是留学日本有文化的喇嘛”。他们虽然给大家作过这些解释和介绍，但从两

个来人所说的蒙语和日常的生活举动看，都与一般蒙古人不同，尤其在他们两人单独谈话时，总是说日语，别人听不懂。从种种现象观察判断，大家认为他俩不是蒙古人，很可能是日本人。公开场合上谁也不敢明说他们是日本人，怕得罪了他们惹祸。就这样，大家对他们都存着一种戒备心，表面奉承，内心怀疑，谨慎应付。

在日寇未进绥包以前，五当召的赤武大喇嘛一职（即执掌全召权威的札萨克大喇嘛）落到禄补生开尊肩上。而召中有的喇嘛，常常忌妒不满，暗中谋害，最明显的就是察哈尔喇嘛索特巴丹京。他本来也想升任札萨克大喇嘛，但多数人支持禄大喇嘛接任了该职。他便心存不满，时刻阴谋克制禄大喇嘛的工作。自日本化装喇嘛塔吉尔等来到召内后，他即百般逢迎，和他们认乡亲，拉关系，有时还伙同日本喇嘛，拉拢各旗来召敬香的王公贵族，结交朋友，搜集各种情报。当时五当召因处在日本法西斯政权的统治下，对他们也不敢得罪，明知他们不是正派的喇嘛，而是别有企图的特务，可是表面上装做不知，对他们也是一视同仁，甚至按上宾去对待。所以，禄大喇嘛执事期间，所处的境遇十分险恶，既有日本特务的潜入活动，又有内奸喇嘛的挑拨掣肘，真是提心吊胆，日夜不安。

一九四三年冬，五当召决定按宗教仪式的礼节，派朝觐团赴西藏朝拜达赖喇嘛。并决定由禄大喇嘛率领。翌年春暖时节，便赴西藏朝觐。此举引起日本特务喇嘛的重视，认为能随朝觐团混入西藏，是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就向禄大喇嘛提出要求，他们二人也要参加朝觐团，赴西藏朝拜达赖，顺便学习教义，深造经典。而禄大喇嘛一听他们的要求，就知道是别有企图的。如果带上他们通过“蒋管区”万一被查觉识破，不但他们要倒霉受害，

而且整个朝觐团和他自己也要负累受害。况且五当召历来的正派名望也将难以维护。所以，禄大喇嘛内心明白，坚决反对。便向他们作解释，宛言拒绝。但这两个日本喇嘛仍不甘心，便又想方设法搬门说情。他们一面唆使顶目气喇嘛索特巴丹京向甘珠尔活佛求情说合，成全此事，一面暗找他们的上级——绥包两地的日本特务机关，向五当召施展压力，强制吸收他们参加朝觐团赴藏深造。而禄大喇嘛值此软硬兼施之下，既得罪不起日本特务机关，也违抗不得甘珠尔活佛，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下来了。

到一九四四年春，五当召朝觐团将一切准备工作筹划妥当正要择日启程时，该召的顶目气喇嘛索特巴丹京暗中给日本特务喇嘛出主意，想借机陷害禄大喇嘛，以便达到他继承大喇嘛职位，独揽庙权的目的。于是暗中给日本喇嘛塔吉尔、尼玛达建议：赴西藏应暗备防身手枪，途中若遇不测，可先下手解脱。日特喇嘛认为有理，便采纳了他的建议，准备了手枪，暗带自防。此事被禄大喇嘛发觉，甚为惊慌，认为这种作法，无异给朝觐团带了“定时炸弹”，在途中一旦被检查暴露，全团必然株连受害，到时候良莠难分。故坚决反对他们携带武器，并严厉指示：如不接受劝告，非带不可时，他就辞退朝觐团长的职务，并建议暂不去西藏朝觐。这样僵持了一段时间，最后日特喇嘛听取了禄大喇嘛的劝告，都把武器卸掉了，同时给召上做了保证，随朝觐团出去，一定要遵守各种规则，绝对服从朝觐团长禄大喇嘛的指示命令。事情商妥后，就这样定下来了。

一九四四年三月间，五当召的赴藏朝觐团，由禄大喇嘛率领，决定乘骑骆驼，取道陆路。通过蒋管区的伊盟、河套以及甘、宁、青等省，直达西藏拉萨。出发前禄大喇嘛又指定专人把朝觐团的全体人员所带的行装和全身进行了检查，然后就向伊克昭盟

达拉特旗黄河南沿出发了。

禄大喇嘛和他的跟随心腹徒弟萨纪札布，自启程后，因心中牵挂着这两个日本化装喇嘛混杂在朝觐团里的危险问题，非常不安心。时刻琢磨着采取什么方法来对付。一路上经过反复考虑，师徒两人秘密商议：与其到国民党军管区被查出，全团跟上受害受累，倒不如及早主动地向绥省主席傅作义部秘密告发，进行处理。这样做对朝觐团有好处，还可安全到达西藏，进行朝拜。这样决定后，就改道先进后套，再转宁夏。他们从伊盟杭锦旗硷柜渡口过了黄河，进入绥西五原境内，到了傅作义部的前线某骑兵旅，与那里的官员相遇。

这时，禄大喇嘛就把随团出来的人员都安置在附近的民房，让他们休息煮饭，放牧骆驼等候。他只带了跟随徒弟萨纪札布，直接到了驻防的骑兵连部，声称有要事会见他们的首长面谈。后经该部连长，问明他们的情况后，就带领他俩去了骑兵旅部，见到了旅长。禄大喇嘛就缜密地把五当召派朝觐团拟赴西藏朝拜的情况以及日本特务机关强制随带化装喇嘛进藏问题，都一五一十地密告。同时提出要求，请他们的电台给榆林“蒙旗宣慰使公署”的荣祥秘书长（当时任土旗总管并兼蒙游三军区司令）拍一电报。电报内容是由禄大喇嘛自拟的，其大意是：我率五当召朝觐团，已抵五原傅部某骑兵旅部，因团内被迫夹带了两个日本化装喇嘛，两人企图混入西藏，恐途中暴露，受其牵连，已向傅长官（傅作义，当时任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告明，听候处理。希电请傅长官，对我团的进藏问题，给予协助等等。据说这个电报，当时就由傅部的军用电台拍给邓宝珊部，转给荣祥总管了。

这两个日本化装喇嘛，从五当召启程以后，警惕性也很高，随时注意观察事情的变化动态，并准备了应付脱逃的策略。据说

他们启程之时，两个人就装扮了两种身份地位全不相同的装束，一个化装为地位较高的上层喇嘛，另一个化装为随从模样的低级喇嘛，他一点架子也没有，路途中每到住宿或打尖休息的时候，他从不和大伙在一起休息，不是出去检柴拾粪，就是放牧骆驼，远远地观察。

就在禄大喇嘛告密的当天傍晚，傅作义部便派武装人员到他们的住宿处进行检查。问话中，发现那个日本化装喇嘛的汉语说得不象，再问到他的详细籍贯和在什么召庙出家当喇嘛的一系列问题时，回答前后矛盾，对答不上来了。检查人员就严肃地对禄大喇嘛说：“把你们同行的全体喇嘛都叫来，我们要检查问话。”这时天色黄昏，出去叫的人就向放骆驼的草场方向，高声吆喝，唤他们的名字，让赶快回来。而那个放骆驼的日本化装喇嘛尼玛达，因事先就见有武装人员进入他们的住处，很久也没有离开，知事情不妙，一定是查出问题了，便偷偷地向蒲草中溜走了。大家在附近寻找了一会，始终没有找到，知道是脱逃了。检查人员生气地对禄大喇嘛命令式地说：“你们的朝觐团有问题，现在不能让你们过境赴西藏，须到陕坝长官部，办理了过境许可手续，才能赴西藏。你和塔吉尔喇嘛今晚就到旅部去住，明晨乘汽车送你们到陕坝去。”说完这话，就把禄大喇嘛和他的徒弟萨纪札布以及日本化装喇嘛塔吉尔等三人，一起带走了。其他随行人员，让他们明晨一早，骑骆驼就往陕坝去。

在他们赴陕坝的这段行程中，土默特旗的总管也是“蒙游三区”的司令荣祥，接到禄大喇嘛的电报了。当即电请傅作义长官，对朝觐团的一切手续问题，给协助解决。并同时直接电令我，由陕坝我们的“蒙游三军区司令部”派员前往五原护理接送。（我当时任该部参谋长，随部队驻陕坝整训）我接到电令，即派骑兵

分队长贾淙带兵数名前往迎接。途中得悉禄大喇嘛等已抵陕坝了。我闻讯即由刘海圪旦（距陕坝西十数里的乡村，三军区司令部驻地）到陕坝“绥蒙指导长官公署”询问此事。据该署的负责人对我说，禄大喇嘛等三人，前一天就到了陕坝。那个冒充喇嘛的日本人，已被长官部（指八战区副长官部）查获扣捕，管押到军法处。禄大喇嘛已安排到招待所住下了。”我便到招待所，会到了禄大喇嘛和他的徒弟萨纪札布（萨纪札布又名润林，少年时在沙尔沁召当小喇嘛，和我一起玩耍，很熟）。我和禄大喇嘛虽有亲戚关系，但从来没有会过面，根本不认识。这时，萨纪看出我们不熟识的形色，便主动以蒙语给他师傅介绍说：“这就是荣总管的大女婿巴某，来看我们来了。”禄大喇嘛喜形于色，紧握我的双手，激动地说：“见到你们这就好了，我就放心了，总管有复电吗？”我把荣司令来电让照顾他们的意思，说了一番。他便以简单的蒙语对我说：“我们住在这里，很不方便。如能让我们先住到咱们三军区司令部，听候指示，比较妥善。”我即直奔长官部找到副官处的温永栋处长，把荣祥司令来电让照顾朝觐团，并拟接到我们司令部去暂住，听候指示等问题说了，请他向傅长官请示决定。后经傅长官的指示，让他们搬到我们司令部去住了。

未过几日，傅作义即以他的名义，给禄大喇嘛和我送来两个请柬，让到长官部赴宴会见。我们按时到了长官部，当即由一位副官领我们先到傅的接待室等候。时间不大，傅从里屋出来，和我们握手，互相寒暄了一通，傅就以恭维的口气对禄大喇嘛说：

“您这次主动密报日本化装喇嘛的事，做得很对。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我们的国家民族，应当爱护。您的这种告发，就是爱国的表现，我们表示钦佩。”禄大喇嘛听后也自谦了一阵。傅又接着

说：“五当召广觉寺不同于一般的召庙，它不属于盟旗所管，而是直属绥远省政府管辖的特殊召庙。您代表五当召这样的果断作法，维护了它历来的威望信誉。”禄大喇嘛听了这些话，也觉得很满意，就把五当召派朝觐团赴西藏朝拜的意义和日本特务机关强迫夹带它的化装喇嘛企图赴藏问题，也向傅叙述了一番。并请他开给通行证，以便通过甘、宁，青进藏。傅即答称：“关于你们进藏的问题，现正考虑中，耀宸（即荣祥之号）给我来电也谈到这问题，一定给协助解决。”

会谈以后，让我们一同到了他的小餐厅就座。这次的宴席是一桌西餐，长形桌上摆着四付刀、叉、杯、盘。我们正在纳闷中，从外面又请来一位客人，傅正要给我们介绍，而禄大喇嘛和那客人笑容满面地握手说：“我们是旧识朋友，熟悉得很。”又向我介绍说：“你不认识他吗？他是准噶尔旗奇子祥司令的参谋长席良，人们称他‘碰大仙’（因他原初顶过大仙）。”经这一介绍，大家都笑起来了。我心中暗想，傅请席良和我们同席吃饭，并以上宾对待他。可能是奇子祥派他潜来陕北和傅长官拉拢挂线作秘密工作来了。席间都不拘束，边谈边吃，直到晚上才散席。

禄大喇嘛和他的徒弟萨纪札布在我们司令部住了一个时期以后，“绥蒙指导长官公署”就通知禄大喇嘛说：“现因去藏的陆路不太平安，傅长官考虑到途中的安全问题，暂时不让你进藏了。”而禄大喇嘛因考虑到那个被捕的日本喇嘛和逃走的那个日本喇嘛的问题。朝觐团就是去不成西藏，现在也绝不能再返回五当召。为了安全也只好在外流浪避难，等待时局的转变，再作安排。所以，就让他们随行人员（除他的徒弟外）带着骆驼，都到黄河南沿的杭锦旗某召庙寄居，放牧骆驼。

一九四四年，禄大喇嘛和他的徒弟在我们“三军区司令部”

住了几个月，因生活不太习惯，他们准备要到乌、伊两盟去周游行医。据禄大喇嘛说，他的蒙医技术，在乌伊两盟蒙民群众中，特别是王公贵族中，尚有很高的威信，走在哪里也有医过病的熟人，能照顾他的生活问题。所以这年秋天他们师徒二人就离开后套，到乌伊两盟的召庙去行医寄居去了。直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中日战争结束后，他们才返回广觉寺。

据说被傅作义部扣押的那个日本化装喇嘛塔吉尔，在中日战争结束后，由国民党的十二战区长官部释放出来，也遣送回国了。而在逃的那个日本化装喇嘛尼玛达，究竟是回国了，还是潜伏到我国西北地区了，那就不清楚了，他的下落一直再没听人说过。

事后据禄大喇嘛对我们说，这两个日本化装喇嘛，平日的装束举动，都很诡诈，从他们的装扮和行动来分析判断，很可能那个逃跑了的化装喇嘛是其中的主角，而那个装扮上层喇嘛的日本特务，恐怕是个助手。被捕以后，大概也没审明他们的真实情况，便释放遣返回国了。

前面说过，这篇史料，主要是禄大喇嘛师徒二人在一九四四年和我同住期间谈叙介绍的。现因事隔多年，仅以自己回忆所及，编写而成。其中难免有遗漏或不符之处，尚希知情者加以补充指正。

五当召的“日本喇嘛”

云昌秀

我于一九四八年初夏，经五当召“赤武喇嘛”禄布生开尊的介绍，担任了五当召喇嘛煤矿的负责人。“赤武”为藏语领袖的意思。“赤武喇嘛”也称“铁崩喇嘛”，是总管庙务的大喇嘛。那时我经常因煤矿事务，向“赤武喇嘛”禄布生开尊请示或汇报工作，事毕在茶余饭后免不了谈些闲话。好几次，我听到他谈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有日本人伪装喇嘛在五当召住过，并有所活动。这便使我回忆起在伪伊克昭盟公署工作的时候，曾亲身见闻有关他们的一些具体情况。事隔二十多年，现在就记忆所及谈一谈。

(一)

一九四二年，当我在包头伪伊克昭盟公署工作的时候，有一次随同本盟民政厅长图布信巴彦尔和日本参事官黑泽隆世去五当召。在召内我亲眼看见两名相貌俊秀、言词流利、服装整洁，自称是伪满州国兴安北省甘珠尔庙来的喇嘛。其中一个年约五十岁左右，并说他叫瓦奇尔协吾仁喇嘛，原籍为郭尔罗斯旗人。他们是从新安北省甘珠尔庙来内蒙的。同行共四人，另二人已去五台

山，他带着一个随行喇嘛来到五当召，打算研究经典和考查佛教历史，以求深造。他还会说一口流利而清脆的日语，和日本参事官黑泽隆世寒暄了很长一会儿。

我从五当召回署二十多天后，忽然一天早晨，有四名穿喇嘛服装的人来到公署。其中就有五当召见过的那位瓦其尔协吾仁喇嘛和他那位随行喇嘛（名字忘记），还有赤武喇嘛禄布生开尊和他的一名徒弟。这是禄布生开尊陪同瓦奇尔协吾仁来作礼节性的拜访。他们首先拜访伪伊盟盟长阿拉坦鄂齐尔（阿王），并依次拜访日本参事官黑泽隆世、伪官房厅长柳田三郎、伪民政厅长图布信巴彦尔、伪警务厅长郭光举、伪实业厅长巴达尔乎等。当晚六时，由伪民政厅长图布信巴彦尔代表伪伊盟盟长阿王，在包头市胜利路西祥饭庄设宴款待了他们，下榻于三官庙街五当召驻包头办事处。他们在包头期间，还接受黑泽隆世的邀请参加了地方的求雨诵经大会。会后黑泽隆世请瓦奇尔协吾仁吃饭时，二人用日语谈话，在座的人都不懂。后来禄布生开尊谈到瓦在吃饭时，曾当面请求黑泽隆世设法帮助他去伊克昭盟各旗较大的召庙旅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所侵占地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域之间，因战事关系，交通断绝，行人来往不易。黑泽隆世接受了瓦奇尔协吾仁喇嘛的这一请求，允予帮助。

半个多月后，瓦奇尔协吾仁喇嘛的请求得到实现。黑泽隆世为了帮他们顺利前往，请阿王给他们找了个领路人，名叫禄布升（不是禄布生开尊），是伊盟杭锦旗人。出发前一天，黑泽隆世把禄布升找去，交给他几项任务。因当时叫我作翻译，所以我现在还记得。那几项任务是：

（1）禄布升一定要想尽办法，把黑泽隆世的一封致伊盟鄂托克旗三王爷扎木色仁扎布和四王爷杨森扎布的信，亲交本人，

(2) 要想尽办法，到伊金霍洛成吉思汗灵寝所在地了解一下，那里是否有军队把守（指国民党军队），军队有多少人，再向当地蒙古老乡了解国民党政府把成吉思汗灵柩移往何处，搬走些什么东西，现在伊金霍洛成吉思汗灵寝的负责人是谁，哪里的人，他的家属住在什么地方；

(3) 设法到伊盟扎萨克旗再生庙，了解国民党政府在那里成立的“国立伊盟中学”情况，有多少学生，是否都属伊盟各旗青年学生，其中有无汉族青年学生，校长是什么人，是蒙古人还是汉人；如果是蒙古人，是伊盟蒙古人还是其他地区的蒙古人，该校有多少教师，其中有几名蒙古教师，是什么地方的蒙古教师；

(4) 从扎萨克旗再生庙，顺便西去乌审旗的桃力亚素泰章京孟克巴彦尔家，把阿王和黑泽隆世联名致孟的信亲交本人；

(5) 了解一下驻伊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某师司令部所在地点及该师所辖各团的防地范围。

黑泽隆世将以上几项任务向禄布升交代清楚后，即拿出国民党地区使用的法币二千元交给禄布升。并说这两千元，只是作为路途盘费，待事成归来后，还将重礼酬谢。禄布升当即向黑泽隆世表示，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完成交给他的任务。第二天，便领着瓦其尔协吾仁喇嘛及其随行喇嘛骑着三头骆驼，从昭君坟渡过了黄河，由黄河西岸伪蒙古军森盖的部队接应，按黑泽隆世的指示，秘密偷越封锁线，派兵数名把他们护送到杭锦旗去了。

次年，旧历正月下旬一天，禄布升带着两个杭锦旗的蒙民，回到包头，见了阿王。阿王便叫住在他的公馆里，不准他们和外人接触，怕走漏消息。这时候，黑泽隆世已于前十几天奉调为百灵庙伪乌兰察布盟公署的参事官，继任者叫山口德一，还带着一个姓金的秘书。山口德一不论在大小会上讲话还是和个人谈话，

均有金秘书作翻译。因此，禄布升一到包头后，阿王便派他的副官居日本图通过金秘书作了汇报，山口德一即派金秘书到阿王公馆和禄布升见面交谈。随后禄布升还连见山口德一两三次，就返回伊盟地区去了。

(二)

一九四三年，我在张家口伪蒙疆学院学习时，曾在明德北街伪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扎布家中，看到五当召的赤武喇嘛禄布生开尊和两个日本和尚。经介绍，知一个和尚叫龚本治二，一个叫藤田义良，是东京靖国神社的大师来内蒙观光的。这个龚本治二说一口流利的蒙古话，他不断地向禄布生开尊打听五当召的召庙情况，介绍日本的宗教历史和源流，宣扬中日亲善。这年十一月，我学习完了返回包头伪伊盟公署，曾被邀请参加五当召举办的宗喀巴佛农历十月二十五日的开光典礼，见龚本治二、藤田义良，随着甘珠尔瓦呼图克图（系察哈尔盟多伦诺尔甘珠尔仓的活佛）也前来参加开光典礼。我与甘珠尔是老相识，晚上在一起聊天时，谈到这两位日本和尚的情况。据说，这个龚本治二还有个蒙古名字叫“塔吉利尔”，他曾于一九四〇年夏季，以日本关东军嘱托特务的身分，到察哈尔盟多伦诺尔善因寺，来研究喇嘛教义的。一九四一年初，他回长春，九月间又领来一位日本和尚，叫藤田义良。他们还到锡盟贝子庙（锡林浩特）、张家口各住过一个时期。这次来五当召，据说是想在召内研究喇嘛经典教义，并要到乌盟达尔罕旗、茂明安旗和乌拉特三公旗，考察一些召庙的沿革历史。这无疑是一种掩人耳目的借口，实际上是去完成他们所负关东军嘱托的任务。

我当时对禄布生开尊和甘珠尔瓦所谈这两个日本和尚的活动，还没有作什么理会。后来才明白这两个日本和尚伪装蒙古喇嘛参加五当召朝觐团，是想利用五当召的喇嘛为他们作掩护和响导，以便深入西藏，完成日本关东军嘱托他们的更重大的特殊任务。

(三)

一九四四年元月间，我因公去张家口市，住于明德北街十一号我姑夫图布信巴彦尔家里（不是前面说的伪伊盟公署民政厅长图布信巴彦尔，他是察哈尔盟多伦诺尔甘珠尔瓦呼图克图的喇嘛印务处处长）。一日，他谈到已故的甘珠尔瓦呼图克图的忽毕尔汗大喇嘛杨仁丕勒时说：“杨曾于一九三〇年五月，陪同甘珠尔瓦呼图克图到呼伦贝尔甘珠尔庙游历讲经，结识了一位好朋友，叫瓦奇尔协吾仁大喇嘛。此人学识很深，通达日俄汉三种文字，和杨结为盟兄弟。在杨回来时，瓦奇尔协吾仁大喇嘛赠送杨一套银佛杯，赠送甘珠尔呼图克图一盘象牙繁珠。杨认为瓦奇尔协吾仁喇嘛是个蒙古人。直到前几年，从我亲身的见闻中，才知道他是个日本人。那是在一九三九年秋天，瓦奇尔协吾仁第二次路过多伦诺尔前往百灵庙，我受甘珠尔瓦的委托负责招待他。有一天，我陪同他去澡塘洗澡，暗暗地发现他的脚上，大足趾和次趾张开象个人字（日本人从小都穿木履，因而大足趾和次趾张开，象个人字），从此我就怀疑他是个日本人。”他离开多伦诺尔后，我和他的一位朋友金喆云闲谈（金是朝鲜人，担任日本军驻多伦诺尔冈本部队的翻译），据金说他是日本人，前些天还到我们部队里去拜访过呢。佐佐木中尉称呼他是中山先生，说他俩都是静

冈县人，还谈到静冈县不久前发生火灾，家乡来信说他两家都没受什么损失。金又说：“这位中山先生（指瓦奇尔协吾仁）确实是个日本人。我从他和佐佐木中尉的谈话中，还听说他是关东军的嘱托呢。”

图布信巴彦尔还认识一位日本朋友，原来就是前边所说的日本和尚龚本治二。图邀请龚到她家吃过饭，我也被邀在座，听他们闲谈提到瓦奇尔协吾仁喇嘛，谈到他渡过黄河到伊盟地区考察各旗召庙情况，龚对这个情况很关心，打听过黄河怎样办手续，有没有危险，并表示自己很想到西藏朝见达赖，并了解西藏宗教情况，待赴满州国新京（即现在长春）参加忠魂庙的落成典礼后，不久还要回五当召去。一九四四年三月间，我由张市公毕回包头后，听到五当召要派朝觐团去西藏朝见达赖喇嘛，伪伊盟公署答应这一请求并办了渡河证件。不久，禄布生开尊大喇嘛亲见伪伊盟公署盟长阿王和民政厅长图布信巴彦尔，提出日本和尚龚本治二、藤田义良二人也要伪装蒙古喇嘛，随朝觐团前往西藏。对此，经日本参事官山口德一与有关方面慎重商议，最后决定让龚本治二一人随同前去，藤田义良言语（指蒙语）欠通免去。并给朝觐团又重办了渡河证，在证上写上龚本治二的蒙名为塔吉利尔。

禄布生开尊喇嘛对此事很不满意，感到带上这个日本喇嘛去西藏，路途那么遥远，怎能保险不出事故，深为忧虑：一旦出了事，五当召朝觐团的全体人员后果很难设想，如果不带这个会说蒙语的日本喇嘛，又怕得罪了山口德一，给五当召惹下祸。最后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一九四四年四月间，以禄布生开尊为首的五当召朝觐团全体十六人、其中包括日本和尚龚本治二，骑着骆驼，从昭君坟（黄河右岸）渡黄河向西藏出发了。事后，据说

在朝觐团禄布生开尊等渡黄河后，西行不久，即被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发觉扣留，解往陕坝（当时傅作义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所在地，今巴盟杭锦旗政府所在地）。

（政协包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

清末日本女间谍河原操子 在喀喇沁的活动

邢复礼

前 言

一九〇三年(光绪廿九年)喀喇沁旗王爷贡桑诺尔布在旗内创办了毓正女学堂。我母亲也在毓正学堂念过书。那时贡王从日本聘请了一位女教师,名叫河原操子,一般都称为河原老师。我从小就听我母亲和她的一些旧日同学,经常谈到她们的河原老师如何如何好,甚至对于河原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她们都是颂扬和赞赏的。有时听到喀喇沁王府附近居民中的老年人,也谈到河原如何给人看病,如何待人亲切等等,对她表示好感。可以看出,河原操子在喀喇沁旗不算太长的岁月中(她在毓正女学堂执教两年多),不但给她的门徒们留下了良好印象,而且在一部分居民里也有影响。我在童年时期,因为受我母亲的影响,对河原这个人也多少抱有好感。

一九三六年春,我东渡日本留学,和笃多博(喀喇沁贡王的长子)在东京寄居在乌居龙藏博士家里(河原操子离喀喇沁旗后,贡王曾经聘乌居夫妇分任喀喇沁崇正、毓正两学堂男女教师)。

那时河原操子依然健在，乌居夫妇怂恿我们喀喇沁的留学生去拜见过她一次。

她以我们的老前辈自居，说起喀喇沁的旧事来，还能历历如数家珍，记得非常清楚。她向我们打听喀喇沁王和福晋的一切（此时喀喇沁王已故，福晋犹在），向笃多博殷殷垂问，似极关切。离别时还送给我们一部她的“大著”《蒙古土产》一书。读了这部书，我发现被喀喇沁的上层人物奉若神明的这位河原女史，原是日本军阀在日俄战争前夕，派到中国大陆来的一名女军事间谍。

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为《蒙古土产》作序说：“关于战时的一些事情，因大半属于军事秘密，不得不进行削减，遂使本文徒具皮毛，而无骨肉之感”。河原自序也说：“旧版《蒙古土产》一书的写出，由于我从事清国女子教育，被喀喇沁王聘为教育顾问，表面上充当女学堂教师，暗中则根据军部之内命，在喀喇沁王和福晋的掩护下，在日俄斗争中得能完成秘密使命的一段事实。”根据她们的这些记载，关于河原操子在喀喇沁的间谍活动，虽不能从这一本书里窥其全豹，但至少可以了解到很大部分。

河原操子不只是一名初到中国大陆上的日本女间谍，同时也是初到中国大陆上来的第一名日本女教师。她在中国历史上首创的上海务本女学堂和“蒙古数千年来所未有的毓正女学堂”（贡王自吹自擂的话），先后执教达四年之久，努力推行日本化的教育，培养亲日分子。我们从这个披着教师外衣的军事女间谍的具体活动中，可以充分看出日本帝国主义当时的所谓大陆政策、满蒙政策的侵略阴谋和领土野心。从一个不满二十岁的日本女间谍，竟在中国领土上横行无阻、为所欲为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清朝末叶，在所谓门户洞开、利益均沾的情况下，列强在中国大肆

侵略的具体史实。喀喇沁旗王爷贡桑诺尔布创办的这个蒙古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女学堂，竟成为日本特务的巢穴，贡王就是这样开门揖盗，为虎作伥的。《蒙古土产》一书的问世，实不啻日本军事女间谍河原操子在华活动的一部罪恶供状。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在清朝末期，兴学练兵，名噪一时，可是在这本书里，却找到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为害国家民族的罪证，是很值得注意的。

下面我根据河原操子在她所著书中的自述和我自己的一些见闻，片断纪述河原操子在喀喇沁旗的活动，希望知者予以补正。

一、河原操子和毓正女学堂

河原操子生于日本信州松本藩的一个士族（日本国民分为华族、士族、平民三个阶级，士族即古来的士人，明治维新后，改称士族）家庭。她的父亲河原忠和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长福岛安正大将（在明治时代，曾做过一次横断西伯利亚的旅行，闻名国内），在童年时代就是很要好的朋友，以后也经常在一起，钻研中国哲学和中日两国的关系问题。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中日战争结束以后，他们都以熟悉中国情况的“支那通”自居。他们都是“明治大帝大陆政策”的最忠实的拥护者和执行者，成为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当福岛大将在一九〇一年（光绪廿七年）左右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部长时，接二连三地派出一批又一批的特务间谍，潜入中国大陆，调查民情风俗，测绘山川地形，对于满蒙王公贵族则施以威胁利诱，一切都为了军事侵略行动，积极做准备工作。这时，河原忠也把自己的独生女河原操子交给大特务头子福岛安正，在日俄战云密布的前夕，作为日本历史上最初一名国际军事女间谍，派到中国内蒙古的丘陵起伏、草原连绵的喀

喇沁右旗王府。她以“王府教育顾问”和“毓正女学堂”教师等名义为遮掩，进行了不少的间谍活动。日俄战争结束后，河原受到日本政府勋六等的奖励。

河原操子最初到中国，是在上海担任务本女学堂的教员。嗣因内蒙古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赴日本参观回旗以后，决定创办一所日本式的女子学校，请日本驻上海领事给介绍一位日本女教师。这时日俄之战已迫在眉睫，喀喇沁这个地方处于日俄两国势力均能接触的微妙地位。当时已有日人伊藤柳太郎充当喀喇沁武备学堂教官，但他是军人身份，在战争爆发后就要离去，日本正需要再有一个人能够代替伊藤大尉，不但使喀喇沁王对日本的好感要继续保持下去，还要和北京及其他各地进行情报连络工作。因此河原操子就到了喀喇沁旗，应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之聘，筹办喀喇沁右旗毓正女学堂，

毓正女学堂对于学生供给午餐及教科书等一切学习用品，并有其他种种奖励办法。校舍为先王时代所建筑的“燕貽堂”戏园，校名由贡王定为“毓正”二字。“毓”与“育”字同义。成立时有学生二十四名，除王妹及王府侍女外，多为王府附近的旗官们的女儿。

有一份《毓正女学堂学则》是河原用日文拟出，经喀喇沁译成汉文的，兹录在下面，以见所谓毓正女学堂日本化，奴化的面貌。

毓正女学堂学则

（第一节）宗旨，第一条，发达知识，健全身体，养高尚的性情，立贤良之基础。

（第二节）学科、学期、学期，第二条，原设寻常科备年幼聪

明者肄业，核设高等科各毕业后升人，另设专修科各年长有志者研究，特设补习科各充补学力之不足。第三条，学科之分例如下：修身（语本、口授），蒙文（讲演、拼语、作文、文法），汉文（讲读、拼语、作文、文法），日文（读本、会话、作文、文法），历史（中国、外国），地理（中国、外国），算术（珠算、笔算），理科（博物、卫生、生理），图画（自由画），家政（礼式、衣服、装束、烹调、料理、住居、使役、簿记、看护、育儿），裁缝（缝法、裁法、完成法、叠藏法），音乐（唱歌、洋琴），体操（游戏、普通体操）。第四条，学年，每年二月十五日开学至十一月放学为一学年。第五条，每学年分为三学期，自二月十五日至五月十五日为第一学期，自五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五日为第二学期，自八月十五日至十一月十五日为第三学期。〔第三节〕职员：第六条，总理一员，总理堂中一切事务，褫晋当之。干事二员，分司庶务书记，总教习一员，总理教务。蒙文教习一员，汉文教习一员，门公一员，稽查学生出入，管理门户一切事务，以年老有德之男子任之。〔第四节〕经费：第七条，概由公家支出，不取私家分文，以示提倡（如有深明义务，自愿捐款助经费者随时斟酌）。〔第五节〕年龄：第八条，年龄八岁以上，专修科不在此限。〔第六节〕人选：第九条，无论贫富，女子品行端正，体质强健者，均可入选。第十条，每日学习时间，自上午十时至午后四时，惟冬日自午前十一时至午后三时。第十一条，考试分为二种：曰大考、曰小考，大考于每学年末行之，合式者升班以进。小考于每学期末行之，凭其优劣以定次序。〔第七节〕凭照：第十二条，毕业者，授以毕业凭照，年长而品学兼优者，加给特别凭照，准其充当本堂副教习及其他小学堂教习。〔第八节〕年限：第十三条，寻常科四年，高等科四年，专修科三年，补习科二年。〔第九节〕休息日：第十四条，定

例如下：一、星期一，二、星期前半月，三、清明节，四、家庙大祭日（四月初十日），五、端午节，六、王爷千秋（五月初九日），七、皇上万寿（六月廿六日），八、鄂堡大祭日（七月初三日），九、家庙大祭日（七月初十日），十、中秋节，十一、皇太后万寿（十月初十日），十二、家庙大祭日（十月初十日），十三、学堂开办日（十一月初十日），十四、年终冬假，十一月初十日起二月十四日止（日本国新年假三日，纪元节、天长节、地久节、冬假一日）。〔第十节〕退学：第十五条，学生不准半途退学，如遇不得已之事故，当由家属具事由书呈堂，经总理许可，方准退学。〔第十一节〕优待：第十六条，堂中准备午餐、路远者准其寄宿。第十七条，来学诸生均以子女相待，务使人人如得家庭之乐。第十八条，学生如有身体不适，验系确实，停学数日。〔第十二节〕服式：第十九条，一律蓝布长衫，距袖口二寸，第一年生钉黑袋一条，第二年生钉黑袋二条，余类推，着黑布快靴、夏戴草帽、冬戴暖帽，不得以华丽竞外观。第二十条，平日在学堂及途次，遇王爷、福晋、太福晋及王府等贵均行最敬鞠躬礼。第二十一条，对堂中教习及办事人员亦行鞠躬礼，第二十二条，对同辈亦行鞠躬礼。〔第十三节〕学生必要：第二十三条，学生均须正心励行养成温良贞淑之女德。第二十四条，平日均须厚礼让、重信义，坚守堂规及教习之教训。第二十五条，宜节饮食多运动。第二十六条犯堂规重者当众斥退，轻者罚如下：一、训戒，二、申斥，三、面壁立（轻者一点钟、重者两点钟），四、立课堂外（轻者两点钟，重者三点钟）。〔第十四节〕游览学堂必要：第二十七条，普通游览者，须先一日具名报总理许可，领有凭签，即可由干事领观。第二十八条，特别游览人，先一时具名通知总理。第二十九条，无论普通、特别游览人，参观后无所疑问，即退出，不得迟留。第三十条，妇女来堂参观，仅由门

公告知干事可领观。

在《学则》第十一节第十四条中，明定日本的纪元节（日本开国纪念日）、天长节（明治天皇诞生日）、地久节（明治皇后诞生日）为休假日，这不啻把蒙古地方视同日本的殖民地，同时也可看出这一名军事女间谍，对于这一所蒙古有史以来所首创的女学堂，肆意操纵，把喀喇沁王和福晋则玩弄于股掌之上。

二、河原在喀喇沁的间谍活动

河原操子到达喀喇沁王府的数日前，日本陆军步兵大尉伊藤柳太郎，由日本参谋本部长福岛安正大将的介绍，已被贡王在极秘密中聘为创办不久的守正武备学堂的总教官。和伊藤一同到喀喇沁的，还有吉原四郎等二、三名日本人，他们都算是伊藤大尉的助手。贡王把一行日本派进来的“坐探”，都安排在距王府约八、九华里的守正武备学堂居住。河原操子因为是女性，又是女学堂的总教习，受到王爷和福晋的特殊礼遇，让她住到王府的后院。同样都是日本政府派到喀喇沁的几名间谍，因为表面上的职务不同，男女有别，住所相去数里，使河原和这些男同伙，很少有见面的机会。在翌年一月，伊藤等一行，因另有其他任务，都被日本政府召回。这样，关于如何在喀喇沁地区执行军事间谍的这一秘密使命，就全部落在河原操子的身上。

一九〇四年（光绪卅年）日俄两国在中国领土上正式宣战后，站在俄国方面的北部蒙古人，不断地到喀喇沁地区进行活动的同时，俄国军官也伪装为英国人、法国人、比利时人，道胜银行行员或俄清银行行员，毛皮商人等，频繁地出入喀喇沁及其邻近

各旗，利用各种手段进行调查活动。河原在这个时候，虽深居在“候门似海”的王府后院，但不放走任何机会，了解俄国人的实际活动情况，随时向北京日本大使馆汇报，以利由北京行将潜入蒙古地区的日本挺进队（即特别任务班）的行动，使他们完成任务。因此她把喀喇沁地区及其邻近各旗的动态，和他们对日俄两国的观感，都写成极密情报，请求喀喇沁王派出“健脚”送往北京。兹将其情报中的一段，节译如下：

喀喇沁右旗的一般旗民，不知道日俄战争为何事，对于大炮、地雷、水雷等近代战争武器，更是闻所未闻，即勉强加以说明，他们也很难理解。对于这一次战争的态度，与其说冷淡，莫如说漠不关心。他们把战争看成“春风吹来，柳絮乱飞”那样简单。至于王府的官吏们，则恰恰与此相反，他们很了解战争的意义，更清楚俄国的现状，认为俄罗斯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富强之匡，蕞尔日本，非其所敌，可能俄国在战争中操必胜之券。所以很大一部分人对俄国表示好感，对日本则怀有敌意。这一事实说明，俄国人对这些化外民族的怀柔羁縻政策，取得相当成功，而日本人则瞠乎其后矣。

据说，先王（指贡王之父、旺都特那木那勒）在晋京参观的时候，俄国驻京公使，必飨以盛宴，殷勤款待，在回旗时，还要馈赠程仪四千两，以壮行色。此项飨宴和馈赠，虽公使更迭，亦照例如此，从不间断。因此旗官的大部分有亲俄排日的倾向。喀喇沁王和福晋，固极贤达，然俄国多年来的怀柔与笼络，已经给他们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在此日俄衅端已开的紧要关头，舍彼就此，立即转变为日本的同情者，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当我以日本与朝鲜的关系为例，反复说明以后，喀喇沁王和福晋，不顾臣僚的反对和阻挠，已首肯背俄支日，我们的初步工作已获得成

功。我们日本朝野，对于喀喇沁王的善意殷殷，应该表示十二分感谢。

在表面战场上，有很多爱国勇士，壮烈牺牲；在背面的战场上，也有不少的志士，纵横活跃。现在这些人所组成的特别任务班第一组，已于二月二十日到达喀喇沁王府；第二组已由热河出发，正向东方挺进；第三组于三月十二日，第四组在二十日先后均到达喀喇沁王府，并已做出最后部署，整装待发。此次深入虎穴，今后所履的艰险，绝非笔墨所能表达。

河原的一封情报中，谈到特别任务班是当日本对俄国宣战以后，日本驻北京大使馆的武官室，在极秘密中组织起来的。这个特别任务班亦称挺进队，以爆炸东清铁路铁桥为目的。队员总数为四十名，分为四个组，其中的三个组都经过喀喇沁王府，再向东北方各目的地进发。在喀喇沁王府预伏中的河原操子，除了由热河出发向东方挺进的第二组外，和第一、三、四组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便利了他们的行动。她首先把喀喇沁旗的贡王争取过来，在日俄战争的整个过程中，使他变为日本的大力支援者。

特别任务班第一组，从北京出发后，途中又分为东西两个小组，东组的成员除横川省三、冲祯介（此二人在哈尔滨附近，被俄国护路队所捕杀。伪满时，在哈尔滨、喀喇沁两地，均立有“冲、横两烈士纪念碑”）外，还有四名组员，有名勋光三者，也参加在这个组里，和河原的关系最密。西小组则由数月前还在守正武备学堂充当教官的伊藤柳太郎、吉田四郎两人负责，另外还有组员四人。他们从北京登程之日起，即改换为蒙古喇嘛的服装，只有伊藤和吉原二人，在途中怕被中国人所识破，仍着日本陆军军服，达到喀喇沁王府，才化装为喇嘛。

东西两小组于一九〇四年（光绪卅年）三月二十日夜由北京出发，二十八日午后抵达喀喇沁，下榻于距王府七、八里的大西沟门守正武备学堂。二十九日，这两个组的成员共十二人，晋谒贡王于府邸，并蒙赐宴于毓正女学堂教习汪某的住室。在宴会进行中，彼此都说了些很简单的应酬话，并未涉及到其他问题。饭后均归住旅舍。贡王仅留伊藤、横川、冲、吉原等四人，密谈到夕阳西下。贡王并允许为他们代买乘用的马匹。他们在喀喇沁逗留几天，略事休息，同时等候由北京日本公使馆派出来的密使的到达。

深居王府后宫的河原操子，在二十八这一天，并未得到和她这些同伙们见面的机会。河原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三月廿八日，喀喇沁王府来了很多喇嘛装束的“不速之观”，其中有一位比较年青的，事出一包东西并附信一封，托王府内侍，送到河原教习的住所。信的内容是这样：

“河原姊：我们特别任务班先遣队一行，现已抵喀喇沁王府，把昭在即，曷胜欢忭。兹送去什物一包，是度预先准备好送给蒙古孩子们的礼物，请代分致贵校的学生。我们都变装为蒙古喇嘛，如无其他意外时，明日就可以畅叙一切。盼光三上。”

在三十日下午，河原在王府后宫自己的住房里，迎接了伊藤、横川、吉原、冲、胁光三等的来访。并举行一次河原参加的秘密会谈。他们对战争进展的情况，做了极详尽的估计和分析，并决定了特别任务班今后如何行动的方针。

河原说，“我虽一个弱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特别任务班的前进道路上，谋求了不少的方便，这也算是报国的一端。在沙漠积雪、四顾茫茫的征途上，非有一名熟悉道路的向导者不可。跋千里的旅程，也非有马匹代步不可。马乎，人乎，若在

平时，并非难事，在今日求之，均不简单。因为喀喇沁王严守中立，王府官吏，又多亲俄，日本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在这种处境里，虽细微小节，也要慎重从事。终由于喀喇沁王对我的信任，满足了我们所有的要求，这何尝不是一件幸事。”

特别任务班于三月三日借贡王所派的向导二人乘马由喀喇沁出发后，五月到九月的这一阶段，做为一名军事女间谍河原来说，可能是繁忙而最紧张的时期。这时内蒙古各地所寄来的军事情报，都要集中在她的手里，她又把这些情报，按类区分，有的要用电报向热河方面日本特务机构汇报，有的还要派出专人，直送北京日本公使馆。她还用中国人假名，不断地和外地通信。河原很自豪地说，她都随机应变，办得很巧妙，几乎以生命做赌注，完成了这些任务。她说，由于她频繁活动，早被俄国方面所注意，但因在表面上拥有喀喇沁王府教育顾问的合法身分，暗中又有喀喇沁王和福晋的多方护庇，她的活动还是很顺利的。

三、河原回国和喀喇沁派女留学生赴日

河原于一九〇四年末一度离开喀喇沁旗。喀喇沁王福晋，为了延长河原操子任毓正女堂教师的雇佣年限，曾给日本东京实践女学校校长下田歌子写了一封信。原信如下：

下田先生收：久闻芳名，恨未识荆，敝地教化未兴，人民顽陋，女学尤所未讲，去年曾创办学堂，以开风气，惟师范难求，幸令徒河原女史具此热心，不以寒苦肯来教授，感佩之至。兹未年余，而进步之速实出意外，将来敝地妇女之输入文明，无非出自先生也。惟去冬条约暂定一年，今将期与女史续约，多处数年，俾得教化普及地方，幸甚。尚望函致女士，请其多住，不胜盼甚。再前承厚贶，拜谢拜谢，久慕芳名，未知日何得拜识也，专此敬请文安。喀

喇沁王福晋十一月十七日。

因此，河原操子又二次来到喀喇沁旗，她一手包办了毓正女学堂，几乎把这个学堂完全日本化了。除了使学生普遍地学会日本话和日本文字外，并奖励唱日本歌，她更毫不客气地把日本的纪元节、天长节、地久节等三大节日，明定为学堂休假日。同时更注意到使学生在日常谈话中，对日本的一切都抱有好感，目的在于使喀喇沁地区，逐渐变为日本殖民地，做为将来侵略中国大陆的跳板或根据地。为了进一步达成这个阴谋，她认为有使若干学生东渡留学的必要，便向喀喇沁福晋提出这个建议，马上得到赞成，由毓正女学堂选拔了三名成绩优秀的女生何惠贞（十五岁）、于保贞（十五岁）、金淑贞，送日本留学。

一九〇六年（光绪卅二年），日俄战争已告结束，毓正女学堂已步入正轨，河原认为所负的使命全部完成，在边塞荒漠风气未开的蒙古地方，河原操子再没有继续住下的必要，她就回国休养去了。日人即介绍东京帝国大学讲师乌居龙藏夫妇，继任喀喇沁的崇正男学堂和毓正女学堂的男女教习。

这一年的年底，河原偕喀喇沁女学生三名，从北京出发，踏上了归国的途程。喀喇沁王和福晋亲到车站送别。据说，王爷和福晋亲临车站给外国人送行，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河原领着三名蒙古少女，回到日本，她把这三名喀喇沁女学生送入下田歌子为校长的实践女学校学习。她也从此结束了在中国大陆上的种种活动。可是从此喀喇沁旗王爷贡桑若尔布保送到日本留学的，不但有蒙古族的男青年，而且也有了蒙古族的女青年，一直继续到伪满时期为止，喀喇沁旗陆续派了不少留日学生，贡王也培养了不少背叛祖国、认贼作父的亲日分子。这正是大名鼎鼎的贡王兴办教育的实质。

蒋介石集团与内蒙 德穆楚克栋鲁普反动势力

沈重宇遗稿

沈元加整理

一九四五年至四八年期间，我在蒋介石的“委员长侍从室”工作。曾担任过“总统府第三局”少将高参兼第四科（党派情报）科长、国府专门委员，仍在“军务局”内办公。一九四八年五月，我离开蒋的“侍从室”，到国民党政府立法院当立法委员，曾一度担任立法院国防小组委员会召集人。

由于我所主管的“军务局第四科”的前身是蒋介石的亲信唐纵所主持的“侍从室第六组”，即戴笠的军统局与蒋介石之间的情报中转站。唐纵离任后，又由国民党的“共党问题专家”徐佛观接任组长。按照惯例凡军统局报送的情报和呈文，除属核心机密与急待批复的直接由军务局局长办公室和机要室处理以外，大多送第四科。因此对涉及内蒙古的军事、政治、外交情报有一些了解。我当了“国府专门委员”后，“军务局”各个科不愿详阅的一般性或综合性的情报报告与不公开的书刊资料，也都往我的“专员室”送。抗日战争以前我曾担任“重庆行营”秘书兼调查科长，主持过“川康甘青边政设计委员会”的工作，对有关“边

政”、“蒙事”的情报资料也有一些兴趣。当了立法院立法委员之后，与来自热、察、绥等省的蒙、汉族委员，偶尔在会上会下交谈。由于我过去留学美国时攻读《各国宪法》，得过硕士学位，立法院内研究和讨论涉及地方自治与少数民族问题的提案、法规的时候，有些委员来询问我的意见和看法。因为我具有上述这些条件，对于蒋介石集团与德王反动势力的关系有一些了解和认识。

(一)

一九四五年九、十月间，伪“蒙疆”反动政府头目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及其亲信死党，在其日本主子倒台之后，跑到重庆“晋谒”蒋介石并遍访国民党的“党国大员”，寻找新的靠山。

德王等人是由戴笠的军统局负责联系的，到重庆后由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接待。“侍从室”对德王在重庆的活动行踪作了记录和报告，跟一本流水帐差不多。我翻阅有关材料后，对于德王这个久闻其名而又有神秘感的人物，产生了最初的印象。

我同“侍从室”内的人交谈，都觉得德王这个“天外飞来”的“蒙古王爷”到“陪都”重庆来，实在是“不识时务”、“自讨没趣”。事实上，他的重庆之行的根本目的，是谋求内蒙古“高度自治”，在蒋家王朝支持下由他来“从头收拾旧山河”，但他的设想落空了。回北平后就被“监护”起来，当了坐食俸禄的“寓公”。蒋、德双方在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目标上是一致的，但他们的想法却南辕北辙。德王对蒋的主观设想背离现实，对此，国民党中略有官场经验之人闻之莫不引为笑谈。

德王久居塞外，远离国民党“中枢”，对蒋介石之心机和手

腕体验欠深，对重庆军政界内幕亦未能洞悉，易被蒋邦某些冠冕堂皇的空话所迷惑。其实，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和杂牌军的策略万变不离其宗，着眼于两个基点，一是“驯服”，二是“有用”，对德王亦不例外。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根本否认国内少数民族的存在，胡诌什么“宗族”、“分支”，到抗战胜利之初还把少数民族称作“土著民族”。在这个大汉族主义独裁统治者看来，边疆民族地区的土皇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德王的政治地位勉强曾为蒋所承认，实是得利于时势与地利。东北沦陷后，蒋介石允许德王在察绥省内搞“蒙旗自治”，是为了在伪满与华北、西北间布置一个“缓冲地带”。伪蒙政府建立之后，蒋通过军统特务与德王暗通音信，支持其“曲线救国”，是为了利用伪蒙军力控制绥察热三省，扼守“三北”之间的战略要地与交通要道，以“地下军”、“先遣军”的姿态迎接和协同“国军”“收复失地”，发动反革命内战。而当德王到重庆与蒋见面时，他已经快要变成丧家之犬了。伪蒙“首府”张家口已被人民军队解放，德王、李守信差点成了俘虏。伪蒙军号称九个师，每个师不过三、四千人，大部分已被苏、蒙军和八路军歼灭，或者溃散。据国民党陆军总部的统计，伪蒙军所余兵力仅一万三千人，成分杂乱，素质甚差，龟缩于少数据点。尽管德王在内蒙上层反动势力（尤其在锡、察盟）中还有--定的政治影响，伪蒙残渣余孽也可收罗、使用，但这个“空军司令”的实际价值大不如前了。

蒋介石、戴笠接见德王，本来是想了解内蒙的形势，摸清伪蒙军的实力、装备、驻地与动向，听取德王处置内蒙军政问题的具体意见。他们急于“受降”、“接收”，忙于部署内战，对于德王所陈述的“大而无当”、满纸狂言的“内蒙自治”论，当然不会产生好感。事实上，那时“蒙疆”小朝廷已作鸟兽散，乱成

一团，远在重庆的德王也很难作详尽而确切的汇报，或提出切实可行的措置办法来。

那年八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外蒙古经公民投票宣布独立。这个条约可说是美苏两大国首脑雅尔塔协议的产物，蒋介石及其党羽颇感不满，咒骂斯大林、罗斯福“出卖中国”，西南联大教授、“战匡策”学派代表人物雷海宗为此而当众大哭。反动党派“中国青年党”的一个头目竟说：外蒙“割让”、东北“遭劫”，好比祖国母亲被外人“强奸”。总之，亲蒋分子对外蒙古独立一事是持强烈反对态度的。德王紧接着外蒙独立而起劲地弹奏“内蒙高度自治”的曲调，只能引起怀有“恐蒙”病态心理的蒋介石集团的疑虑和厌恶。在蒋看来，让德王之流“统一”内蒙，“反共防苏”未必有实效，而“蒙疆自治”局面的重演，对他在北方的统治也极为不利。

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时期消极抗日，大部分时间坐山观虎斗，而在日本投降后则大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大吹大擂自己“抗日有功”。许多汉奸也挖尽心思给自己涂脂抹粉，表明自己如何“忠诚谋国”，从事“地下抗战”，待机“易帜反正”等等。本来，国民党对“曲线救国”的“英雄”是赞赏、宣扬的，身为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居然在公开演说中鼓励国民党军队向日寇“伪降”和所谓“回归”等等。而德王等伪蒙军政头目是臭名昭著的卖国贼，尽管与蒋介石、戴笠暗中搭线，但有助于“抗战建国”的“事迹”却难以编造出来。这个民族败类在欢庆抗战的胜利声中，到“大后方”抛头露面，东奔西走，阿谀奉承，钻营门路，对当时当地的政治气氛和官场行情体察得太不够了。德王到重庆后大摇大摆、风头十足地到处登门拜访，与国民党党政军头面人物拉关系，那些以“抗战英雄”自命的家伙对这个名牌蒙奸只

是勉强表示欢迎，略表礼貌而已。德王所访问的大官中，有的人根本不会帮他的忙。如陈诚，是以对“非正统”的地方军阀势力砍削、并吞著称的。德王还找陈立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吴铁城、于右任、戴传贤（考试院院长）、商震、贺国光等人游说，推销“内蒙自治”的货色。这类人物虽有名气，但在内蒙的军政问题上，却无决策之权。德王对这些人物大做工作，其效果究竟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二）

下面着重谈谈“八·一五”以后蒋介石集团对内蒙问题的决策。

蒋介石集团决策机构没有把内蒙古地区和蒙古民族的问题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筹划。这主要是蒋家王朝继承满清和北洋军阀衣钵，实施对内蒙古分割、压迫政策的结果。内蒙古在行政上、军事上、经济上被划成好几大块，这也与国民党统治机构的腐朽风气有关，官僚主义泛滥，机关庞杂繁多，办事效率低得出奇，在有关内蒙的问题上，也是“一国三公”，“十羊九牧”，政出多门，各行其是。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直属的“蒙藏委员会”，名义上是边疆民族事务的主管机关，设有一个“蒙事处”，而实际是一个联络、传达、交际机构。我在国民党“中枢”工作了几年，也没有弄清楚“蒙藏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有多大。所谓“边务”、“蒙事”是各省军政当局权限以内的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蒙古地区局势急剧变化，情况复杂，国民党各个部门都插手管，很少协调。伪军改编为

“国军”后，直接受制和听命于驻防地区的军政主管机关。李守信先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任为“热察先遣军司令”、“第十路军司令”，他的残部改编为“华北暂编某总队”，归李宗仁的北平行营”管辖。后又奉蒋介石之命到辽宁、热河招兵买马，收罗伪满、伪蒙残渣余孽，组织所谓“热河人民自卫军”，则受熊式辉的“东北行营”、杜聿明的“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指挥。国民党在“收复”“接收”内蒙地区时也讲“军政配合”、“剿抚兼施”，蒙藏委员会组织了一个以国民党蒙族“元老”白云梯为首的“蒙古宣导团”，“东北行营”又成立一个“蒙旗复员委员会”，蒙藏委员会驻北平办事处也插手进去。

国民党特务系统在内蒙的工作，抗战时期戴笠的军统特务跟德王的联系从未中断。军统特务主要据点设在陕坝，起初是特派员高荣负责与德王集团联络（高荣曾任“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陕坝训练班副主任”），以后较长时间由军统局华北区区长、华北办事处处长马汉三负责做伪蒙上层工作，与德王本人关系甚密。此外，军统局还在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冀察战区司令长官部设置了专事搜集情报的“调查室”，由军统局绥北办事处处长史泓任这两个战区“调查室”主任。C. C系的中统特务系统抗战时期在绥远开展谍报工作，主要是通过党部“调统室”进行的。“中统”还从中央党务学校、政治学校的蒙古族学员中吸收特工干部。来自热河省的立法委员薛兴儒就是其中之一。听说中统局局长叶秀峰、副局长郭紫峻对他甚为赏识。抗战胜利前后，军统特务头目郑介民担任军委会军令部第二厅（后改为国防部第二厅）厅长，自立门户，主要抓军事情报，也插手“东蒙”。郑介民充任国民党政府驻军事调处执行部首席代表之后，常驻北平，与原伪蒙官员中的某些人拉上了关系。

我到蒋介石“侍从室”后，从粗略翻阅军统局、中统局的工作总结报告中，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它们在内蒙地区的谍报工作虽曾下过一些功夫，但其弱点及缺陷极多，主观失误亦不少，从全局战略观点看，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方面的情况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工作布局不均衡。他们的做法大体上是依托国民党统治区，逐步渗透到沦陷区与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点线工作”。工作重心偏在内蒙西部，且局限于城镇、交通线与战地。蒙古族人口较多、经济文化程度较高的内蒙东部，几乎成了国民党谍报工作的空白区。抗战胜利以前，军统特务虽设有“东北区”，工作却很少开展，基础颇差。国民党“接收”东北时，日伪留下的有关西满东蒙的情报和调研材料，一被发现，即视若至宝，翻译、整理后上报南京。李守信、吴鹤龄、乌古廷等人都被国民党“东北行营”招揽、重用。他们过去生活与活动的地区，此时，大都成为解放区，所能提供的情报多是“回忆加推测”，主观编造，为所谓“筹蒙大计”拼凑材料。

第二，情报来源与活动方式侧重于依赖蒙古族上层及“内线”。蒋帮特务组织在蒙族区域没有根基，缺少社会关系，特工力量薄弱。加之内蒙环境艰苦，民情不熟，语言不通，风习各异，很难在内蒙古境内，尤其是纯蒙区、边境和要害地带，做深入的工作。所以，勾结德王、李守信，是军统局在抗战时期的一项“杰作”。但德、李一类头面人物利欲熏心，老谋深算，又不愿冒险背着日寇干为蒋帮效劳的事。所以，德王对蒋说来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一块肉。

第三，内蒙情报的搜集和呈报，往往从属于国民党政府军事、政治、外交的当前策略，应付急需，零敲碎打。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一点。

抗战胜利以前，蒋介石、戴笠对伪蒙的情报计划与预拟措施，几乎集中于德王手头有多少兵，多少枪，占有哪些要地，等等。把伪蒙政权及其牵涉的问题，看得跟策反、收编关内伪军与散匪的问题一样简单，易于解决。

日本投降后，苏蒙军、八路军解放东北及内蒙东部，蒋介石集团对苏联、外蒙怀着猜疑、仇视而又恐惧的病态心理，耽心苏、蒙乘战胜之余威与驻军之便利，长期占领和割裂内蒙古，迫迁、同化、“赤化”蒙古族民众。美、蒋从自己编造的“苏联欲霸满蒙”、“苏、蒙、中共为一体”、“苏将与中（蒋）美冲突”的“三段式”出发，拟定了内蒙古境内情报工作的重点项目。其内容大致是：

苏联、外蒙军队驻扎内蒙时之实力、编制、部署情况及司令官姓名、简历；

苏联、外蒙在内蒙古的情报组织、人员及其活动；

苏联企图促进内外蒙联合或统一的动向；

苏联、外蒙与内蒙境内革命力量之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内蒙的军、政、民运组织及开辟工作之情况；

驻内蒙人民军队的实力、番号、指挥系统、首长姓名；

内蒙民众对民主政府政策的反应及对苏、蒙与中共关系的态度，等等。

这样，以进行虚夸的“防苏（蒙）斗争”与假想的“三次世界大战”作为基点，搞“命题作文”式的情报工作，出“题”者在内蒙问题上愚妄无知，又远离内蒙“现场”，答“题”者粗疏匆忙，敷衍应付，材料的核实和分析做得很差。

国民党官方叙及蒙古民族的文字材料，常常不加掩饰地流露出轻蔑、嘲讽甚至辱骂态度，把蒙古政教上层、王公贵族、牧主

地主圈子中的种种腐朽、破落和荒唐的景象，歪曲解释为整个蒙古民族普遍染上的“不治之症”；把在深重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之下陷于贫困落后状态的蒙族人民的坚韧不屈的斗争精神与变革前进的力量，一笔抹杀。因此，内蒙古地区人民解放战争和民主改革的巨大胜利，一直是被国民党反动派所忽视和低估的。一九四七年五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这个重大消息，在蒋党报刊上似未作及时公开的报道，只是在供内部参阅的“匪情”资料中略有提及。

下面谈谈蒋介石的“侍从室”。

所谓“侍从室”，顾名思义，是蒋介石集团最核心的情报和决策机构。改称“军务局”后，更令人联想到满清皇帝身旁的“军机处”。按照常人推理，“侍从室”对于内蒙问题应该够得上是“内行”和“权威”，其实不然。“侍从室”的“幕僚”们对有关内蒙知识的缺乏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涉及内蒙情况的情报、文件到达军务局之后，分门别类送到各个科。局内没有设置专门研究和处理蒙古问题的机构或人员，也没有综合和交流内蒙情报的定期汇报或专题会议。蒋介石的“侍从室”一向任人唯亲，蒋的同乡浙江人最为吃香。全部人员中南方人比北方人多，原籍内蒙的人几乎没有，更不用说蒙古族的人了。能够通观和熟悉内蒙情况的人在这里是找不出来的，每个科长只能够接触到有关内蒙古的零碎的片段的情况。

国民党政府机构中，名义上对内蒙事务负总责的是行政院蒙藏委员会。但“国府军务局”，很少收到蒙藏委员会报送的文件、材料，收到的大多由“国府政务局”经办，多系例行公事，官样文章。政务局长陈方是个“有名的风流才子”，此人是没有功夫和兴趣研究蒙古问题的。

“国府军务局”人员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也较多。可笑的是，这些人对有关蒙古的常识性问题都是不懂、不通的。例如，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蒋军攻陷张家口，军务局有的校级参谋说不清张家的确切地理位置。内蒙古和外蒙古相同和不同之点，有些人也弄不清。一提到内蒙，他们多把它想象成清一色的穿蒙袍、住蒙古包、过游牧生活。

(三)

内蒙地方反动势力之所以不易得到蒋介石集团的重视和信用，甚至被视为政治玩具和包袱，也是与他自身的衰朽腐败、四分五裂分不开的。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先后召开“制宪”和“行宪”“国大”，那时，我在南京，对于国民党所谓内蒙“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们的言行举止及社会舆论的反应，是亲见亲闻的。

活动于南京官场中的少数民族（时通称“土著名族”）人物本来就很少，所谓“国民大会”的堂皇场面也是多年来少见的。“物以稀为贵”，蒙古族“民意代表”们的形象和行迹自然引起许多人的注视和兴趣。新闻记者“跟踪”采访、拍照，把一些“秘闻”、“奇事”、谈笑资料披露于报端。一九四八年“行宪国大”开会时，热察绥等省蒙古族的“国代”、“立委”齐集南京，住在秦淮河畔珠江饭店。他们与汉族官僚政客一样，招摇过市，酗酒闹嚷，聚赌耍钱，抽吸烟土，买卖金银，以至追逐歌笑，寻花问柳，丑态百出。蒙古族上层分子，与其他少数民族相比较，由于地近东北、华北城市、商埠，从清朝高唱“满蒙一家”、袁世凯侈言“五族共和”以后，蒙古族王公贵族、知识分子和行政官

员，在官场政治中，在生活方式上，在语文使用上，与汉族统治阶级越来越接近，从某种意义上讲，“汉化”的程度要高一些，汉族剥削阶级肮脏腐败的东西也被他们吸收、溶化。南京有些人骂蒙古“代表”不成体统，太不争气，其实，这不单是个人品质问题，而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我认为，蒙古族上层政治势力，就整体而言，跟蒋介石国民党打交道，从来是不成功的，颞预糊涂，毫无“长进”。

前清以来，内蒙古从未真正统一过。袁世凯“抚绥”蒙古，也是分东西两片召开内蒙王公会议。张作霖当“蒙疆经略使”，徒挂空名而已。“九·一八”后，内蒙古地区被截成三大段：伪满、伪蒙、国民党统治区。德王妄图统一内蒙，重温“大元帝国”旧梦，日本人连内蒙东部都不让他染指。日本投降以后，内蒙上层反动势力，一派以“抗战有功”“民族英雄”自炫；另一派吹嘘，只有他们才能“代表”沦陷区蒙族人民。所谓“行宪国大”“竞选”及开会期间，蒙古族“国代”“立委”中间，也出现了派别之争，所谓“元老派”白云梯、李永新是图保既得权位的国民党官僚；所谓“少壮派”，则是野心勃勃的“蒙古青年同盟”成员；还有在蒋介石和德王之间拉线的“中间派”陈绍武等。这些来自内蒙的新老官贵只是在“蒙古自治”的空泛口号上达到了一致，而在涉及权力和利益的具体问题上则各持已见，莫衷一是。到一九四八年春季，内蒙古大部分“国代”、“立委”都与原籍“选区”脱钩、分离，寄人篱下，乞食度日了。国民党政府施舍一点东西，也是僧多粥少，难以满足，这就更促使蒙古族的“民意代表”们，在“流亡”生活中相互争吵，争权夺利。

在理论上政治上拿不出象样的东西来，甚至不能自圆其说。蒙古族“政治代表”们向蒋家王朝递交的“请愿书”、“提案”，

一个劲地叫嚷“内蒙古自治”，至于“自治”的具体内容和法定权限则是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甚至自相矛盾。“立法院”第一会期（一九四八年五月开始）审议过“行宪国大”交来以全体蒙古代表名义提出的《蒙古自治实施方案》，我还看过一些类似的“建议”、“呈文”。它们所陈“内蒙事务凡属国防、外交，皆由中央统筹、主持”，纯系废话。因为，内蒙古不是，也不可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享有主权的政治实体，纵使“中央”政府让内蒙古分享或代行国防、外交方面的职权，在实践上也未必行得通。德王等人开口闭口不离“高度自治”，蒙古族上层多有附和和支持，他们自己也解释不清这“高度”究竟高到什么程度。至于内蒙地方自治机构与国民党中央、省两级政府的关系如何规定，始终提不出一个有关各方都能够接受或妥协折衷的方案来。“自治”的内蒙古在“中华民国”内处于何种地位，有的比喻为英联邦中的自治领，有的比喻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有的甚至比喻为美国所属的菲律宾，真是无奇不有，不伦不类。说此话的人连自己的“议员”身分也否定了。因为菲律宾不是美国的一个州，它在美国国会没有代表。

内蒙上层反动人物要求“自治”的惯用的论证手法，就是强调内蒙之“乱”和“变”，以证明求“治”求“稳”之必要。例如，日本侵占东北后，德王借口“东蒙”失陷，向蒋介石索取“地方自治的权力，成立“蒙旗政务委员会”，由是而登上政治舞台；抗战时期，内蒙王公中又有人以抗衡伪“蒙疆”政权为理由，要求成立“西蒙自治政府”，抗战胜利后，又把“苏联主使外蒙独立”与“中共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作为在内蒙古建立“高度自治”政权的缘由。国民党统治集团往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内蒙的弱点和“危机”推导出必须加强“中央”控制、

“统一政令军令”的结论。回答是：“抗战”“剿匪”为当务之急，“民族自治”之类纯属“误国”的“空谈”。

蒙古族上层分子涉足于国民党“中枢”的，多集中在“行政院蒙藏委员会”与“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两个系统。蒙藏委员会是并无实权的公事衙门。有一个“蒙事处”，曾由楚明善任处长。既曰“蒙事”，内蒙、外蒙兼而管之，但外蒙古独立了，内蒙古早已划设行省，各级政府根本不会听命于蒙藏委员会。况且有兵有枪的军阀把持了内蒙地区的大权，连省政府主席都由军人兼任。

由于国民党向来“以党治国”，在“行宪”后还自称为当然的“执政党”，这就吸引了不少蒙古族上中层分子往党务系统钻营，充当国民党党棍，而国民党中央党部为了在基础薄弱的内蒙地区开展工作，也培养和任用了一些年纪较轻的学生出身的蒙古族干部。绥、察、热、辽等省都成立了“蒙旗党部”，还设有作为中统特务机关分支的“调查室”。“当选”立法委员的李永新，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的处长，薛兴儒是中统局的专员，中统特务头目叶秀峰、郭紫峻对他们甚为看重。

据我个人体会，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一旦受到汉族反动政权高官厚禄的引诱，陷入光怪陆离、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容易沉缅于官场交易、酒色逸乐。所谓“民族利益”，实被置诸脑后“民族代表”身份成了牟取一己私利的资本。

蒙古族上层亲蒋势力，时而摆出“团结一致”的阵容，实则各个派系、个人都有自己的盘算，在宣言、口号上或能一致，触及具体的实质性问题则意见分歧，争吵不休。有些人凭自己的能耐自寻门路。例如，李守信随德王赴重庆以后，即撇开德王与国民党军政头目挂钩，凭借他曾任伪蒙军事“统帅”的身分，利用

他与旧奉系、伪蒙、伪满、军统等方面的关系捞到一官半职，在东北拉起一支蒙汉掺杂的反动武装队伍，重新挂起“国军”的招牌。听说一九四五年冬季蒋介石初赴北平视察时，曾召见李守信，“垂询”有关情况，“面授机宜”。在蒋介石心目中，能够抓人弄枪为他打仗的李守信自然要比“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德王有用一些。

国民党绥远“国大代表”的产生

张富仪

1947年秋季，国民党为了选举傀儡的国大代表，在各省市成立了选举事务所。绥远省也成立了这个机构。绥远选举事务所的唯一负责人，由当时民政厅厅长王则鼎担任。该事务所的办公地址，设在民政厅西边的一幢房子内，就在当时公路处的对门。该所设有秘书室，两个科，分别掌握行业性和地方性的有关选举业务，如选民的人数，选票的印发，票纸的制作和分发以及指示各县市办理有关选举事宜。笔者以社会处科长主管各人民团体的关系，兼任了该所的科长之一，依照规定，办理一切有关选举事务。我现在所要叙述的，是进行投票时的一些情况。

归绥市的国大代表柴生华，是当时的归绥市长兼归绥市警备司令陈光斗率领他的文武喽罗们，靠压力产生出来的。在投票以前的一瞬间，柴生华已经被宣布为归绥市国大代表的第一候选人，同时又由归绥市政府向各区所属的各保甲长作候选人简历介绍，并责成保甲长向居民宣传。但适得其反，如有的居民对选举不感兴趣，可能弃权，有的选民表示要选能代表他们的人，只有极少数选民投柴生华的票。投票前三天，柴某在反动政府的支持下，利用当时国民党归绥市党部书记长的职权，在归绥市通衢巷

道的墙上和电杆上印帖柴某本人的照片、简历和其他骗人的鬼话。表面上说是为选民知道“柴生华”三个字，预防音同字不同而成废票，实则另有企图。

记得1947年11月8日，归绥市举行投票，设有投票场所数处，旧、新城和火车站都有票匭。各处代表，均由归绥市市长陈光斗保证投柴生华的票，如果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顺利的选出柴生华，惟该市市长是问。因此在选举这天，天气虽然很冷，太阳将出山的时候，陈光斗市长坐着汽车已走遍了各选举点。每到一处，总是“谆谆告诫”代笔人，不管选民说选谁，你们代笔的人，都写成“柴生华”，并以违者处罚相恫吓。如果选民自写的话，选票要先交监票人代投票匭，这是为了杜绝投别人的票，如果发现别人的票，即予扣留。即使这样，还不放心。举行选举的一整天之内，从早到晚，有专人在这几个投票场所，不断巡迴视察。起初到场的选民寥寥无几，当即令保甲长鸣锣催促。当选民陆续在場投票时，他一人唯恐照料不到，又给各场所加派市府秘书或科长监视。投票之后，当众计票，结果是柴生华当选了归绥市国大代表。

行业性的国大代表，其产生经过，更是丑态百出。例如商业国大代表阎肃和工业国大代表吴佑龙的选举。其选票是按全省各县市投票数来计算的，但归绥市的选举有决定作用，现在把归绥市进行的情况谈一下。它同地方性的国大代表同一天投票，投票场所只设一处，设在舍力图召大院内。这里的“保证责任”，由社会处担任，处长杜品山责成笔者负完全责任。我记得这一天，正是国民党的“空军节”。归绥市防空司令部举行纪念会，要笔者抽暇去帮助布置会场，所以晚到了投票场所几分钟。杜品山在电话上竟破口大骂，斥责笔者说：今日何日，希望你不要粗疏大

意，如果完不成“保证责任”，不要说你负不起这个责任，连我也没法交代。我到舍力图召投票场所，未到十分钟，杜品山本人也来到。这时已经开始投票了，我为了完成“保证责任”，索性令在场监视的工作人员，不等投票人来到代写票的地方，就迎上去，把票收过来，直接交给代笔人写上“阎肃、吴佑龙”。间或有已经写成别人的票，干脆不投入票匳，另行保存，最后只统计投入票匳的票。商界的投票人对阎肃这个候选人虽然不感兴趣，但尚不陌生。阎某当时是全省“商联会”理事长，归绥市商会理事长，归绥市电面公司主任委员，又是省参议会副议长。至于工业界候选人吴佑龙，他本是包头市的人，归绥工业界的，根本不认识他。大家来投票，更是应付场面，听凭代笔人去写，票既投出，转身便走，连票匳都不看一眼。杜品山眼巴巴看着这种情况，既满意，又放心。这天下午三时许，计算收到的票数，已经差不多了，又把不是指定的候选人的票，投入票匳不足十分之一，这是为应付场面。宣布正式“开票”了，商界的阎肃当选，工业界方面吴佑龙当选。后来有人诙谐地说：女婿岳父，同时入选（吴佑龙就是阎肃的女婿）。

农业方面的国大代表候选人，当时指定为龚国华和郭连英。龚国华当时是绥远省农会理事长，提出他为国大代表候选人，好象还在情理之中。但郭连英这个人，被提为农会的国大代表候选人，可就是驴唇不对马嘴了，郭某不是农民，而是一个投机商人。他从小在包头市以经商为业，后来经常往来于京、沪、津、汉与包头间，进行投机倒把。此人取巧赚钱，广事交游。经人介绍，于四七年初，在上海参加民社党。四七年秋，被该党提出为国大代表候选人之一，因为他是绥远籍，国民党中央便决定由绥远产生。绥远方面接到这项命令后，起初遍找其人不得，后来在

包头市总算找见了，但这时郭某本人尚未回到包头，仍在外地。待郭返包后，地方负责人与郭某接了头，证明无误。此时已经接近投票选举的日子了，地方性的国大代表候选人已经分配完毕，从包头产生，事实上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便由省农业方面解决。经研究，把已定未宣布的候选人，取掉一人，由郭取而代之。原先决定的是谁，我不知道。把候选人向各县市宣布之后，料各县市负责人，会偏重产生地方性的代表，所以有些疏忽大意。至选举开始后，据各县市先后电报选举结果，关于地区性的和其它职业的代表，完全按照计划选出，惟郭连英的票很少，按规定须五万张以上选票，方能当选。后经检查，凉城县的选举结果尚未报来。于是电报命令县长乔汉奎立即到卓资山火车站等候，说是有要事办理。同时派与乔汉奎有旧的社会处一科科长张维立带了空白选票五万余张，从归绥市出发，并以省政府名义同归绥铁路方面负责人崔某交涉，要求他们想尽办法，让张维立马上出发。因当时东去的火车已无，临时决定用手摇机车送去。张维立到达以后，乔汉奎已赶到。张维立将选票如数交给乔汉奎，并把具体办法交待清楚。后来听说乔汉奎回到凉城后，在一夜之间，动员了县政府的全体公务员把五万多张选票填好，投入票匭，而选民投入的票，取出焚毁。一切弄好之后，当众“开票”，郭连英当选农会方面的国大代表了。（完）

绥远青帮和伪蒙疆民生会

卢健飞 王明远 刘吉悌（卢健飞执笔）

一、关于青帮源流的传说

社会上都知道青帮是一个会道门，但对于它的根源，不仅外界人，即使象我们在帮多年的人，也很难说彻底，因为师父们所传的主要是帮名、三代和一些规矩仪式及行话，至于它的来源和真正宗旨，则不但说得少，而且说得乱，现在仅就我们能了解到的综述如下。

首先在名称上，外界多以青红帮并称，其实只有青帮称帮，红帮并不称帮，其所以称帮，因为它是从运河船运上的米粮帮发展起来的。虽然称帮，但在总的名称上，帮内人则说是“安清道”。

这个道是怎样产生的呢？据师父传说：当清朝康熙年间，运河漕运开通，南粮北运，船行所至，常被沿河的官兵拉夫封船，勒索财物，因而清江的船夫，首先创立米粮帮，团结自卫，接着沿河各口岸的船夫，也都效法结帮。清廷虽不同意船夫结帮，却又怕取缔后影响漕运，因而只好听之，米粮帮遂得半公开于社会。

但在帮与帮之间，因各立帮头（最多到过一百多帮），互不统属，时常有彼此矛盾的事发生。到雍正年间，有清门教徒翁岩、钱

坚、潘清师兄弟三人，向清廷活动，要求把漕运上所有米粮帮都组合起来，以清门教规治理。经清廷批准，在河南开封府成立了安清道友会。由此米粮帮的人都去参加，会外的人便把这个会叫做是青帮。

安清道既来源于清门教，清门教又来源于何处？据帮内师父们传说：“清门教的始祖是金清源，在五台山拜佛门禅宗临济宗派第卅六传鹄头禅师为师，后来创立清门教，成为临济宗派的一个支派；他留下清门教卅十四代的排字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理、大通无学。”这些字都是佛法上的话，也就是它立教的宗趣，可见清门教是来源于佛教。同时，在摆香堂的牌位上，首先供在上面的是西天佛祖，达摩祖师，接着是禅宗的各位祖师，然后才是清门教的始祖金祖（清字辈）、二祖罗祖（净字辈）、三祖陆祖（道字辈），然后才是翁、钱、潘三位祖师（德字辈，他们是安清道友会的创始者，也是清门教的第四代祖），这也说明了他们最初的根源是佛教。

为什么在青帮又叫做“在家理”或“进家里”？这前者有佛法上的传说：认为临济宗派是属于佛法的禅宗，禅是佛性，只重修性，不重修形，不但出家可修，并且在家可修。清门教所讲的是在家修行之理，要普渡在家之人，不易服，不受戒，在家里带发修行。这种修法，有别于僧尼出家之理，所以对参加清门教的叫做“在家理”。后者有帮内沿习的传说：认为在过去各帮摆香堂收徒，都必须黑夜里在船上去摆，不许在旱地上去摆，后来漕运停止没有船只，便打破这个成规，都是由师父在家里摆香堂收徒，因此便以为进青帮必须先进入师父家里，才能得道，这便对进了帮的人叫“进家里”。也有的传说，在家里收徒，并不是漕运停止后就开始，在此以前就有一位师父，因为病在家里不能上船收

徒，改在家里收，虽当时为同道所訾议，认为有犯帮规，但终因他有病，承认了他这一次所收的徒弟是帮里人。由此便开了例，各帮师父也都纷纷在旱地上自己的家里收徒了。此外还有人说：天下青帮是一家，有人进了青帮，就是进了青帮这个大家里来了，所以叫“进家里”。

青帮是否具有民族革命思想和活动？从青帮的传说看：曾说到翁、钱、潘三祖原来都是天地会的会员，这个会就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族革命组织，后来失败了，他们便藉清门教进入米粮帮，继续作民族革命的活动。虽然在表面上说是要以清门教治帮，有利于清朝的漕运，但实际上是藉此作掩护，仍要暗中进行反清复明。最显著的有潘祖留传的遗像可作说明，他的遗像是一只手提着一个雀笼子，一只手把个人发辫拖在胸前，並怒目而视。这暗示着什么呢？师父们谈论说，“那雀笼子是指的汉族人民，像小雀一样，被关在牢笼之中；那发辫是代表清朝（因为发辫是清朝逼汉人留的），拖起来是叫人们认清敌人；怒目而视，是表示民族仇恨，要反抗，打破牢笼”。同时这个意旨也见诸行动，如嘉庆年间李文忠的八卦教，王伦的清水教，联合起义反清，青帮第十二代慧字辈王祖正纪，就在河南滑县响应了这个起义，率领着帮内人兴汉排满，结果被镇压下去，王祖及其参与者均壮烈牺牲。从此清廷即裁撤米粮帮停止漕运，对青帮严加查禁，如稍有嫌疑者，即有杀身的可能。青帮在这时期大受摧残，原有一百廿八帮半，只剩下兴武二、兴武四、兴武六、杭三、江淮泗、嘉海卫、嘉白、双凤、湖州头等不到十帮，因之十二代以下的“本来自性”四辈前人的姓名，也在青帮中纪载最少。但青帮並沒有屈服，仍转入地下秘密活动，所有后来的一切秘密行话，多是这时产生的，並积聚力量，在辛亥革命中积极地参加了孙中山

的反清斗争，曾牺牲过不少的人。此外，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民族反抗的暗示，如帽子要翻放着（暗示要变天），领子要掩起（暗示要恢复明朝汉族的圆领），其它还有，都可资说明。

为什么有人说青帮是投降清廷的叛徒，不象红帮那样坚贞不二？说这样话的也不无原因。首先是因看到翁、钱、潘三人离开了原来的民族革命组织的天地会，却投向清廷以清门教治理米粮帮，为当时统治者的漕运服务，这就是投降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定名为安清道友会，更把投降的旗子鲜明地打出来，因为要安清就是要保清，不再反清。其次是看到青帮在杭州的家庙，在乾隆下江南时，曾御赐头门匾额为“安清门”，三门匾额为“异姓堂”；门联为“君恩臣当报，父业子当传”。另外还御赐蟠龙杖一根，作为他们的家法刑具，对违犯帮规的打死勿论。可见青帮在投降后忠心保清，得到当时统治者异乎寻常的欣赏，更证明是叛徒。红帮人就这样看，并且还和青帮人闹过矛盾。但青帮人却不这样看，认为翁、钱、潘三祖虽离开了天地会投向清廷，成立了安清道友会，是为了要藉米粮帮扩展民族革命的力量；把会的名字称为安清，是为了迷惑统治者；拿乾隆的御赐匾联和蟠龙杖，是为了利用它作掩护，以有助于组织的秘密活动。如果青帮是真投降，潘祖不会有那样的遗像传给后代，王祖正纪也不会在滑县起义遭到镇压；青帮的活动，也不必要有这样的秘密。这两家谁说的对，时远事迁，很难稽考，但到了辛亥革命前，青帮积极地参加反清活动，这个对立的看法，便随着消失。

既然青帮出自佛门，是不是它按佛法行事？按佛法禅宗道理，为了要达到它所说的明心见性，不论在家出家，都要研究消极无为的经典，修习自我麻醉的禅定。但青帮的师父们，从来没有人做过和说过这一套，甚至于在香堂上传道时，满堂上香烟缭绕

接连地请送神佛，充满了一派神秘气氛，也没见师父传授过有什么禅宗上的东西。相反地，香堂上五字抱头香的五个字“敬学吃怕求”，倒是儒家的东西占了上风。如敬是敬的天地君亲师，学是学的仁义礼智信，这是儒家的封建的纲常伦理，吃是吃的金木水火土，求是求的四季平安福，这也是属于儒家人生哲学的范畴，只有怕是怕的生老病死苦，这一个怕字是佛家的东西，但也不过是作个点缀而已。特别是有些师父们，不但对青帮的根源说不清，并且因不理解佛法，以讹传讹，把青帮廿四代的排字都传错了，如“能仁智慧”，竟错传为“仁伦智慧”，因为他们不了解“能仁”是“释迦”的译义，“本来自性”错传为“本来自信”，因为他不了解“自性”是佛法主观唯心论的核心；“大通无学”，竟错传为“大通悟觉”，因为他不了解“无学”是阿罗汉的果位。这些都说明它不但不按佛法行事，并且对佛法无所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历史上进行革命活动的组织，为了有利于动员号召，不少是打着神佛迷信的幌子，如黄巾、白莲教都是如此，青帮对于佛法，也不过是为了打幌子，如果它真按消极的佛法行事，那就要和民族革命的旨趣对立起来，不可能去进行斗争。

为什么青帮吸收的人多是社会下层？这首先是青帮旧有组织的传统问题，由于青帮是运河米粮帮的船夫发展起来的，正如毛主席著作各阶级分析一文对青帮的解释中所说，他们多是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者，本身就是负重苦的社会下层，他们为反抗政治和经济上的压迫，要求互助，才组织米粮帮。青帮虽把他们进一步团结起来，但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他们和中上层的阶级关系悬隔，和下层的阶级感情接近，这就很自然地要把下层很多群众吸收进来。其次是青帮进行民族反抗的组织路线问题，因为当时在异族统治下，所有社会上层，特别是士大夫

之流，有的被清廷镇压吓倒了，有的是养尊处优，放弃了斗争，这就只有向受压迫较重具有反抗性的社会下层去发展，尤其是在滑县起义失败后，米粮帮裁撤了，有些人牺牲了，有些人转入地下，更只能是在社会下层中秘密活动，使统治者不注意他们。因此青帮吸收的也就多属于社会下层，甚至于地痞、流氓、劫盗、绺贼什么样的人都有。

究竟青帮的传统精神是什么？用帮里的话说是“家理义气”四个字。这个义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民族斗争上，要天下青帮，树立起民族气节，团结互助，反清复明。一方面是在社会生活上，要天下青帮，互相扶穷济困，帮丧助婚，团结犹如一家。这就是青帮的传统精神。虽然，这种精神具有一定的革命团结情感，如青帮自己所说，“入帮后，地不分东西南北，姓不分张王李赵，使无亲无友无靠者，能有亲有友有靠”。但由于他们当时为小生产者的狭隘性所局限，这种情感，只能采取封建的家长制的组织形式，如摆香堂、拜师父、认同参，要师徒如父子，同参如手足，一师皆为师，一徒皆为徒等等，因而青帮的传统精神，也就兼具着封建的、宗派主义的落后情感。同时，青帮之所以打着佛家迷信的幌子，而所装的却是儒家的内容，也就是因为儒家的那一套封建的纲常伦理，适合于他们这一套拜师认徒的封建组织形式。但这些落后的组织形式和内容，正如毛主席著作中对青帮的注释所说，不可能使这一些社会下层求得出路，而相反的还促使一些帮的首领成为大把头，更加深了他们的压迫和剥削。

以上所说，是辛亥革命以前的青帮。辛亥革命以后，清朝被推翻了，民族斗争的对象消失了，青帮再没有提出新的政治内容，这就失去了灵魂，只剩下躯壳，结果是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为

反动的国内外敌人所利用，变为反动的力量；不但充当过国民党特务的外围，并且当了日寇的汉奸工具，即使有某些好的表现，也只是个别人的问题，而不是青帮本身有什么好的政治指导作用。绥远的青帮是全国较小的一部分，但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来，现在将我们的亲历和见闻介绍出来，惟此事所涉较广，又以日久记忆不清，难免乖漏，请知者补充和指正。

二、刘长荣未到归绥前的绥远青帮

绥远偏处塞外，虽有黄河的水运，但因龙门的险阻，与内地河运不相关连，因此青帮伸入这个地方很晚，一直到京包路修通，才有了他们的码头（公共会所）。据说青帮先到的地方是包头，因当地红帮势力大，参加红帮的多，未能得到发展，反倒是后到归绥的青帮占了先。首先在归绥收徒的是兴五四帮通字辈张恩泽（人们叫他张八爷，曾在北洋军队张绍曾部干过事），后来其它帮也陆续地来到归绥收徒，到了民国廿年左右，已经有了六大帮，人数约一二百人，除大部分集中在归绥者外，其余都散布在外县，如集宁、凉城、武川、兴和等地都有。现在，仅把在归绥的各帮情况介绍一下。

1、兴武四帮。以贾生福为首。贾是归绥市人，在本市旧城西街开裱糊店，无字辈，拜张恩泽为师，他收了不少的洋铁匠等小手艺人和小买卖人及乡民作徒弟，人数较其他帮多一些，贾本人和军政各界的关系，也拉拢的较多。

2、兴武六帮。以宁尚衡为首。宁是河北人，在归绥车站旁开妓院，拜北京兴武六大字辈蒋万春为师（蒋系华北青帮五老之一，字筱亭）。他一方面收了一些妓院捞毛的和车站搬运夫以及

旅馆跑街的作徒弟，一方面还代蒋万春收徒，把平康里开妓院的刘小三、边小三、叶慎斋、苟振声等拉为同参。同时也还拉一些其他界的人，如王明远（车站天享粮站经理）、陈建勋（旧城金声旅馆经理）、刘玉山（旧城大观园坤伶白牡丹的丈夫）、都是他拉去拜蒋为师的。陈建勋自己也收了一些旅馆茶房和流氓等作徒弟，但人数不如他的多。

3、杭三帮。以李侗为首。李是河北人，学字辈，以塑神像、包油漆裱糊工为生，在归绥市收了一些小手工艺人和小商小贩作徒弟。

4、嘉白帮。以安定帮为首。安是河北人，通字辈，是北京嘉白帮大字辈宋殿邦的徒弟（宋也是华北青帮首领五老之一）。他原以誊写石印和抄录官商文件为生，后来看青帮有利可图，便到北京拜宋为师，在本市收有一些毛店工人、学徒和小手艺人、小买卖人为徒。

5、嘉海卫。以王志诚为首。王是山西人，通字辈，是吕祖庙理门公所的老道，收有一些小商贩和旅馆茶房作徒弟，人数不多。

6、江淮派。以李国华为首。李是河北人，在当时任归绥警察局保安队长，通字辈，除收了一些保安队的队兵和警察外，並收了一些买卖中的学徒和服务行业中的茶房、剃头的、修脚的。

由上可见，各帮所收的徒弟基本上是社会下层，其所以如此，不外乎前章所述的是由于旧有的组织传统、路线使然，是由于“家里义气”对这些社会下层人们的吸引。但到此时期，是否青帮人们还理解这个组织传统、路线的革命意义呢？可以说，随着清朝的推翻，民族革命对象的消失，已经忘掉，甚至于传法的师父们不但不再提它，而且有另一种无耻的打算和说法。如兴武六大

字辈的蒋万春，就有徒弟问他：“师父，你为什么专爱收那些开妓院的和地痞流氓等下九流的徒弟呢？这对于咱们的道，有点不太光彩吧？”蒋万春却很轻松地回答说：“徒弟，你不了解这些人地位低下，为社会上的人看不起，我们收他，他就能感到我们是抬举他，要比其他的人把道看得重，把师父看得重，就能够听师父的话，多办对师父有利的事，这为什么不多收他们呢？”事实上，蒋万春就是这样大得其利。如他来绥远收了不少下九流的徒弟，因绥远盛产烟土，就叫这些徒弟们给他凑烟土，运到北京去卖。这些徒弟，也的确奉命唯谨，照着他的想象行事，结果他发了不少的财。至于其他帮收徒，一些师父们和蒋万春一样的想法，为的是便于“吃”徒弟。如安定邦、王志诚，对那些学徒、跑街等没钱的穷徒弟，也要在三节两寿上揩他们的油，并且还有时因此和徒弟闹对立，嫌徒弟不孝敬他们。到这时，所有组织传统的革命意义，已经连影子也没有了。收徒主要是为了有利于师父个人。

是不是这时青帮传统的“家里义气”还存在呢？这应从两方面去看，如果从民族革命团结的情感去看，由于清朝推翻了，斗争对象消失了，青帮再没有提出新的政治斗争内容，也就不可能再有新的革命团结情感，所谓“家里义气”，已经是随着时代消失，不复存在。但要从封建的宗派主义的情感去看，则这种“家里义气”仍有所存在，但已经有了变化。如各帮的帮丧助婚，仍常常有人去办（大北旅社老板于化门和张子含都多张罗过），对失业者和无住处者，也有时替想办法（如陈建勋的振大旅社就常有帮内人住闲），但这必须帮内有头脸的人去提倡，才能办到，一般地想这样做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外来的帮内人，更必须找到这样有头脸的人，才有可能得到帮助。如果只是向一般的帮内人

露出暗示，也无济于事（虽有的穷朋友互相同情，但多有心无力）。甚至有的故意不认，而这些有头脸的人作帮助，也不是真正为了帮的利益，主要是为了树立个人在帮内的把头势力，拿众人的钱，给自己贴金。特别是有一些地痞流氓，依仗着这种“家里义气”的势力，欺压良善。如李国华的徒弟石朝珠等，就是些混混，向地方商民白吃白拿东西，经常招摇撞骗，外地唱戏的来了，如不买好他们，就聚众起哄，叫戏唱不下去。集宁的青帮张义星，也结伙在地方横行打人，只是还未发展到象南方上海的青帮那样肆无忌惮绑架杀人罢了。

是不是到这时青帮人还能守住往日的帮规？事实上早已守不住了，而且已经是大大地破坏了。不要说象那些进入青帮的地痞流氓，依势欺软凌弱，破坏了十大帮规，就是一般的帮内人，也破坏的不少。如帮规不准奸盗邪淫，嘉白帮首领王志诚，以一老道竟公开地把妓女叫到他庙里同宿，被人捉住。如帮规低香头不准爬高，本市旧城西街帽子铺经理李双义，竟由悟字辈爬上通字辈，帮规不准江湖乱道，要对外保密，而青帮人在社会上竟随意谈论，几成公开的秘密。又帮规收徒要经过小香堂、大香堂、开山门各个程序，不准“连香起”（即大小香堂开山门一次办），而这时收徒则连香起的人很多，甚至于视为当然。其它还有，不及细述。即使有的人能遵守帮规，也由于丧失了政治斗争目标，只能作形式上的遵守。

三、王若瑟的来绥远

在上述时期中，也並不是没有中层以上的人参加，如天亨粮栈经理王明远，中西药房经理高松声，就都是这时参加的。这並

不是各帮首领们不愿吸收他们，蒋万春所讲的要收下层，只讲了一半心里的话，那一半想收中上层心理的话没有讲。其所以收不进去，主要是中层以上的人，认为青帮是下流团体，有些不屑参加。

但到了一九三三年，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那时蒋介石要实行法西斯统治，也就是要实行其特务统治，他认为青帮是有群众基础的社会团体，便企图把它利用起来，作为特务组织的外围团体。因而在华北把青帮最有名的大字辈首领王若瑟、吴鹏举、蒋万春、顾炎年、宋殿邦，邀请到北京，尊为华北五老，由特务们在幕后策动，在北京大摆香堂，广泛收徒，特别是多拉拢当时的军政首脑和地主、资本家等进帮，一时风声传播，青帮的声价，在各地的中上层人物中，顿然提高。有不少的人，都改变了过去的看法，愿意参加。绥远也不例外，最显著的是王若瑟来绥远收徒。

据张子含亲身看到和听到的经过是：王若瑟是在一九三三年夏初，由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头子潘秀仁、赵允义等亲身把他从北京接来，为的是要他摆香堂收绥远党政要人作徒弟，并听说陈立夫还从南京给王若瑟一封劝驾的信。当车到丰镇时，当地的青帮首领郑文轩（通字辈）上车随侍。到了归绥后，国民党的头子们和当地各帮的首领们都上站欢迎，下车后住绥远饭店。晚间绥远省党部设盛大宴会招待，作陪者都是当时的军政要人。青帮人往谒者，必须经郑文轩传达方得相见。接着就摆香堂，新收的徒弟有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常务委员潘秀仁、赵允义、陈国英，有兼省会警察局长袁庆曾，督察长张公量，有归绥交通银行经理蔡书禾，丰业银行经理王赞庭，电话局经理沈伟臣，还有其他军政人员，均到香堂拜王为师父，特别是驻绥远的晋军第七十师师长

王靖国、骑兵司令赵承绥，也从防地赶来，拜王为师父。另外王明远还听到郑文轩说，傅作义也向王若瑟递小帖子，认王为师父，王因其身分大，免在香堂行礼，並叫徒弟们不要对外公开传说。（北京帮里人则传说王因傅身分大，不敢当他的师父，是代师收徒，拉他作同参兄弟。但王的师父已早死了，这样做是不合帮规的）。

隔了两天，省党部的头子们，在正风中学的大礼堂开了一个欢迎王若瑟的大会，当时参与者，除了新进家的党政头子外，还有一些当地的青帮首脑人物，再就是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属下的一些骨干分子，王进会场时，头戴黑绒道帽，上嵌一块亮晶晶的玉石，身穿黄缎袍，上绣团龙，右手拿金漆龙头拐，左手拿玛瑙念珠串，白须飘飘，由郑文轩手拿拂尘随侍在后，真是装模作样，派头十足，各党政头子们见了后，都殷勤致礼，鞠躬如也。讲台上专备有太师椅，由潘秀仁恭请上坐，並致欢迎词说：“安清道过去对革命有贡献，王若瑟老先生的道德和义气，都值得钦佩，应当欢迎。”接着就请王讲话，王首致谢意，除了讲一些安清道的源流外，就着重吹嘘着说：“我们的道，最重义气，只要是帮内的人，没有不帮助的。我们的人到处都有，南京、上海、广州、武汉，我都可以给你们介绍，吃饭路费不成问题，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发展我们的道，并尽忠党国。”会后，张子含对王明远说：“咱们的王老头子，真够神气的啦，想不到青帮能这样！”

接着又收了几个徒弟，但对于那些地位较低的人，都推辞不收，不几天就回了北京。听说王走时，各党政头子进帮的都对他有新馈赠，连同押帖礼弄了好几千元，真是饱载而归，而青帮在绥远的声价，也由此有了显著的提高，不少衙门的官儿，地方的绅士们，买卖中的老板们，都转变了眼光想参加。但这些人都是眼睛

向上的，愿意当爷爷，不愿意当孙子。都是想找个班辈大的师父（当时以大字辈的最大），但华北大字辈的五老离得太远，并且不容易投进，而绥远则仅有杭三帮的刘长荣是大字辈，这就把刘看作求师的对象，愿拜在他们门下的日多一日，而刘也由此成为绥远青帮最有力的首领人物。

四、刘长荣的大收徒

刘长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现在先把他的身世介绍一下，他是山东肥城县侯家庄人，历代以木匠业为生，在十岁时，跟父亲学木匠手艺，十八岁投入老毅军当兵，到了河北。因同棚子的士兵都是在青帮的，他拜到了礼字辈的郑忠思为师（郑是六合县人，当过武术教官），后来到了济南结婚，又转到山东混成旅前路巡防队当兵，并升任排长，到民国十六年，该旅被张宗昌改编为直鲁联军混成旅，他递升营长，这时才重视收徒，新收的多是小买卖和小手艺人，一九二八年，直鲁军失败，他退到天津，被傅作义改编，仍任营长，曾驻过天津近郊韩柳墅、小站和沧州、青县、马厂一带，每处都有他收的徒弟。他的护兵崔朝海也是他的徒弟，专办摆香堂的事（此人现在集宁），但他怕上级官长猜疑，不敢收军队内部的人，所收的多是当地人，什么样的人都有，而且是地主老财居多。如他在韩柳墅收过一个姓马的，就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他拉拢这些人，为用钱方便，这些人为的他有营长的势力，能仰仗庇护。

到了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他随着傅作义在津浦线上和蒋军作战，进到山东汶上县，结果傅军大败北撤，在退到汶河一带时，当地红枪会逢起截击，有不少的部队被解决。但他所带的一

营，因他有青帮的关系，一露出帮内的秘密暗示，红枪会中的同帮即认为自家人，不仅不加阻害，并且筹助给养，沿途护送，因是得以安然北撤。他营内有个孟排长，此人平日很反对刘搞青帮，到这时也改变了态度，很惊奇地说：“想不到这个玩意有这么大的好处。”撤退到山西后，不久即调驻绥远，次年改编，仍任营长，曾驻防包头、旗下营、平地泉等地，收了些徒弟，但仍怕上级猜疑，不敢在部队中多发展。

刘本人貌似忠厚长者，不善言谈，但接触之下，使人感到老实可亲，并且面不阻人，只要是对他有所请求，办到办不到，总是张罗去办，因此他虽然办不到，人也不反感，这也是他善于伪装之处。他家里经常有无职业的帮里人住闲，由营内顶个兵名字吃闲饭，甚至于有些作奸犯科的亡命徒，以青帮关系来找他，他也庇护。最显著的一件事，在傅作义剿王英匪部时，王匪四处逃窜，他在武川县担任堵击，当时有王匪的参谋长南汉人，因走投无路，以青帮关系化装到他营里求掩护，他和南素不相识，竟把南隐藏起来，南有大烟瘾，刘还给他大烟抽，叫护兵崔朝海伺候他，一连住了几个月，事定后才走。

刘到绥远后，虽然一方面怕上级猜疑，不敢多收徒弟，而另一方面还由于当时青帮声价不高，中上层不屑参加，下层虽愿参加，却又因为自己的班辈大，怕收了后为帮内人所反对，说是给他们收进爷爷来了，这只能让徒弟们去收。因此就使他在收徒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但自王若瑟来了以后，青帮的声价大为提高，有不少的中上层愿拜刘为师（当地的统治者也对他看法变了），于是他就放手大收其徒，而帮内那些忘了旧的组织传统的人，因见他所收的多是中上层有头脸有势力的人，虽然是给一些人当爷爷，有些不愿，但为了攀高结贵，趋炎附势，却又是心甘情愿了。

这些徒弟有包头面粉公司经理刘豫、包头景兴池澡堂老板郭毅臣、包头庆春园老板王浩然、三道营车站站长巩佑愚、归绥机务段段长李开顺、陶卜齐监工魏子明、归绥车站杂工大把头赵庆波、平地泉土店老板杨玉升、平地泉皮毛店老板宋连三、平地泉马店老板马林、集宁县仲士张振声、陶林县大地主张忠义、归绥利中照相馆老板孔夏亭、豫芳照相馆老板张占鳌、大北旅社老板于化门、亨得利钟表眼镜公司经理张子含、济盛元马店老板艾香亭，还有绥远宪兵司令部的参谋高恒、归绥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局长韩伯琴、第三分局局长郑冠三、五原垦务局局长慕松鹤、民国日报社编辑杨丕滋、卅五军营长黄济五、国民兵大队长范政通，卅五军副官史继高、刘鉴训，其他资本家、地主和军政界的人还有，不尽列举。这些徒弟又多是各自收徒，因之他这一杭三帮的派系，人数最多，在绥远哪一界哪一行业都有，甚至蒙古的王公贵族，也请求参加，达拉特旗的康王进帮，就是突出的一例。

刘也很爱钱，并善于“吃”徒弟，在他收了这些地主、资本家的徒弟后，就择肥而噬，常常出题目向他们借钱，崔朝海就多给他跑过。因此他来到绥远不久，就在平地泉桥东买了一二十间铺面房子，在归绥开了个“新新饭庄”，这都是由有钱的徒弟凑起来的。

在王若瑟来后和抗战前，可以说是刘的极盛时期，他那时已不干卅五军的营长了，先是军部少校附员，后任绥远省政府调查员。家住在归绥市北门外牛桥下的济盛元马店，屋里陈设整齐，成为绥远青帮的总码头，什么样的大小人物都去，大烟灯、麻雀牌经常摆列，犹如一个大俱乐部，真是座上客满，笑语达旦。由于各行各业都有徒弟，用什么，吹口气就来，并且拣最好的去敬献师父。出门看戏吃饭，戏园子、饭馆子的老板们，都预先把最好的

座位留下。在当时生活上，即使是一般的军政头子们，也没有他那样的方便如意。在他五十岁时作过一次寿，当时各地青帮首领和徒众以及当地军政各界人物，多来祝贺，收下的寿幛、寿桃、寿面、寿屏，几间屋子都摆不下，同时还包下几个饭馆子大摆酒席，包下大观园戏园唱吉祥寿戏。象这样大的排场，当然是花钱不少，但用不着花他的，因每个徒弟的寿礼，最多的有几十元，最少的也是两元，不但够开支，而且有盈余。

这时，他手眼大了，有了势力了，对帮内的徒子徒孙们，也就显示着比别人有“家里义气”了。如他的徒孙于少恒，想开饭馆没本钱，他就叫徒弟们凑钱帮助于开起来，名为“小小饭馆”。徒弟张占鳌开豫芳照相馆，本钱少，他给张凑借，徒孙李麻子的母亲死在人市街，无力埋葬，他给凑棺材钱，徒孙李双顺想买一辆人力车没有钱，他帮助买，隔帮徒孙韩令文，因所开的云华池澡堂失火，无力重修，他也给筹借。至于对其他帮内人帮丧助婚赠旅费的事，还不少，只要是找到面前，总要多少想点法，这也是他在帮内有威信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他这样做也主要是为了猎取他个人的威信，要当帮内最大的把头。

但刘虽如此，他的爱人却不是这样，待人极其刻薄。据崔朝海说：“她很势利，对有钱有势的徒弟们视若宾客，不叫大哥不说话，对无钱无势的徒弟，则冷眼相待，甚至不答理。尤其对三节两寿看得重，十元以上的留吃饭，钱少的连茶水都不愿招待，但人们都以刘长荣的态度好，对她不作计较。他有两个儿子，当时都长大成人，大的叫吉孝，二的叫吉梯，因所处的那种生活环境，都是花天酒地，无所用心，成了浪荡公子。这也使他很伤脑筋，认为继承不了他的事业。”

虽然刘在青帮里有这么大的威信，但却曾遭到他本帮内小首

领李侗的反对。前边已说过，李在刘未来前，是归绥杭三帮的首领，刘来后不但在本帮称尊，並且在其他帮称尊，这就使李黯然无色。但李却不承认刘的大字辈是真的，据李说：“杭三帮祖传有两句话，‘杭三不离马，离马即是假’这是说杭三帮大字辈以上的师父、师爷、师太，总有一人是姓马的，没姓马的就是假的。”而刘的师父是郑忠思，师爷、师太也都没有姓马的，並且他还没有同参兄弟，所以就认为刘是假的。李侗的话，在帮内也有人认为有道理，但多数人都认为刘从廿几岁就在济南、天津等地摆香堂，如果是假的，早就被帮内人以违犯帮规驱逐出去，不会闯荡江湖有这么些年之久。而且“杭三不离马，离马即是假”，这个说法也无法证实，有可能是捏造的。同时也还有人说：刘有这么大的声势，给青帮添了光彩，即使是假的，把他承认下来，也不辱没青帮的门户。因此李侗虽然反对，並提诉到华北五老面前，但因没充分证据，无人理会，也只得罢手。而刘也由此更顺利地大收其徒。

五、青帮收徒的程序和仪式

青帮的收徒，一般地要经过必要程序和仪式，现在把它介绍一下。进家人要先经过引进人的介绍，向所要投拜的师父递上拜师的帖子，在得到本师允可以后，即开小香堂收为记名徒弟。小香堂的仪式很简单，堂上仅供翁、钱、潘三家祖师的牌位，供桌上仅点一番二蜡，在场仅有本命师及行进师，由请进入头顶正式拜师帖子，向祖师和本命师磕记名头，即算是记名弟子，但非正式弟子，帮内人称之为“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到了一定时期，

本命师认为可以收为正式弟子,即开大香堂。大香堂在帮内是一个极为隆重的典礼,按所供牌位,应有西天历代佛祖,有禅宗始祖达摩,二祖印可、三祖僧灿、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有清门教始祖金祖,二祖罗祖、陈祖、林祖,三祖陆祖,有安清道始祖翁、钱、潘三祖,有王降、肖隆二小祖,朱、黄、刘、石四小祖,有十二庵堂师,有安清道历代祖师。按到场的人应有各帮的师父及同参,并且只要是在当地的帮内人,都应通知参加,本人的传道师、引进师,更必须参加。按香堂职事分工有十二人:①当家师,总理香堂一切事务;②讲经师,指导传道受戒,由传道师兼;③陪堂师,协理内外事务,由引进师兼;④执法师,管理帮规纪律;⑤护法师,担任安全;⑥巡堂师,负纠察任务;⑦执堂师,管香堂司仪;⑧散香师,照管香烛,指导上下香;⑨抱香师,协助散香师接香插香;⑩福德师,管庶务和办斋;⑪知客师,管招待来宾;⑫站堂师,管护卫站班。在十二师中有主香者一人为香堂领导,例由当家师即收徒者自任,但如有收徒者的长辈到场,则由长辈主香。按各祖师牌位前的陈设,应有一大供桌,桌里边设四乾四鲜果供,桌当中设五个香炉和六个蜡烛杆。五个香炉的摆列,有两种形式:一种将香炉一字排列,名为“长江炉”;一种在桌中心摆一炉,前后左右各摆一炉,名为“梅花炉”(在当时一般都用梅花炉),五个香炉的重量共五斤四两,含有五湖四海来聚会的意义;六个蜡烛杆,分摆在五炉两旁,作雁翅形。然后在五炉前又摆一个香炉,叫“接驾炉”,在供桌下也摆一个香炉,叫“扎根炉”。另外还用一丈多长的红绳,将五炉六蜡都一个一个地绕起来,缠在一起,据说红绳是代表拉船的缆绳,缠在一起是代表亲密团结的意思。再就是在供桌靠墙的左边,摆一窄长的木板,名为“家法”,

在堂口设有火盆，专供焚烧佛袋、钱粮、黄表，在供桌前设蒲团一个，两旁设红毡或拜垫若干个，都是供参拜之用。同时在香堂门外，还专设一桌，摆香烛一份，说是供三家未上过 大香 的小祖。

在参加香堂时，必须遵守以下的规定：①对外须严守秘密；②服从主香者指导，发生任何变故，都要听指挥；③遵守香堂规则，千拜万拜，不得违怨；④必须穿长衣；⑤要肃立低头垂手；⑥不得自由进出；⑦不得闯香；⑧不得藉词惊扰。此外，在举行仪式前，还须净手漱口。

香堂的仪程是：①请祖，即供上各位祖师牌位；②献供果；③献香，在五炉里献的是“五子抱头香”，即每炉各燃香一束，四外各炉的香头，均攒集当中一炉的香头，表示帮内人在祖师前的抱头亲热，犹如五子在父母前的抱头亲热，故名此；④请蜡；⑤请线绳，即将红绳缠绕五炉六蜡；⑥请家法；⑦朝祖，由司仪人唱礼，向各位祖师牌位一个一个地叩参，叩头的姿势是以左手压右手，先放在左膝，然后再右膝着地，两手抚地叩头；⑧转朝门外小爷；⑨朝引进师、师爷、师太；⑩朝传道师、师爷、师太；⑪朝本命师、师爷、师太；⑫回朝在堂各帮调卫的师父、师爷、师太；⑬回朝在堂执事的师父、师爷、师太；⑭本命师 慈悲 三代，帮头、船号、班辈，所谓慈悲即传受之意；⑮传道师慈悲十大帮规、十大禁止；⑯送祖，香堂也就于此结束。在请祖、朝祖、送祖、献香、献蜡等节目中，司仪者还念些香歌、赞歌。

以上是一般大香堂应有的节目，这就使进家的叩的头多了，如请祖。每个祖牌，都要一个一个的叩，对本命、传道、引进的师父、师爷、师太，都要一个一个的叩，对在堂各帮的师父、师爷、师太，都要一个一个的叩，对在堂执事者和同参师兄弟，也

要一个一个的叩，在送祖时，还要向祖牌一个一个的叩。每叩一次，都要叩四个头，这就把头叩的多了。因此帮内曾流行过这几句话，“要进家，须叩头，够不够，九百六”。为什么要这样呢？据师父们说：“一是为了要显示帮规的隆重，二是为了要使人带的人认识到自己叩了这么多的头，就是盟了这么多的誓，不忍去背帮叛帮”（实际这是树立师父的尊严，在组织上加强封建家长式的约束制度）。但到后来，在帮内人数较少的地方，开香堂凑不够那么多的帮和人，就把仪式的规模缩小了，并且把应叩的头简化了。如对禅宗的二、三、四、五、六祖和十二庵堂师以及本命、引进、传道各师以外各帮的前人们，有的就不叩了，或者是合并叩一次就算了，这就减少的多了，但主要的祖师牌位和近支的前人们，仍一个少叩不得。

在进家人给师父师兄叩头时，师父只是拱手答礼，并说：“祖师的灵光，前人的慈悲，家里义气，弟老的请起。”师兄则必须回叩答礼，叩完后，互相拱手说：“义气千秋”。这不但在香堂如此，在过节庆时，见了面也是如此。但平常见长辈则只说不磕，如晚辈说，“要给师父见礼”，长辈则说，“咱们香堂口见”。这就不磕了。

在摆完香堂后的第三天，进帮人应进行认家和领法。由进帮人预备两份礼物到引进师家，一份送引进师，一份由引进师陪同送往本命师家，除向本命师叩拜外，并向师娘叩拜，向师兄弟、师姐妹互相见礼，然后由本命师传给道法，在领取道法后，就成为一个正式的安清道徒。但这还不够收徒的资格，必须经本命师作过一定时期的考察，认为可以收徒，并举行开山门的仪式，才可以收徒。开山门时，香堂的布置与上大香基本相同，只是不要叩那么多头（对远支的祖师，可合并叩参），在叩参后，先由司

仪念两段香歌、赞歌，次由传道师传给青帮的前后廿四代，作为收徒的辈次（前廿四代的排字，已在第一章介绍过，后廿四代的排字，不知是那位祖师续的，字的次序为“万象依皈，戒律传宝，化度心回，普门开放，广照乾坤，带发修行”，仍是佛法上的话）。再就是由本命师给开山门，方式是改变叩参时的手式。如在未开山门叩头时，是左手压右手连在一起抚地的，到此叩头，本命师用手将他的两手分开抚地，就算是山门开了。并且以后叩头，都是两手分开抚地，作为已开山门的标志。

师父收徒后，徒弟要在三节两寿孝敬师父（两寿是师父师母生日），师父要对徒弟的婚丧大事帮助。所谓孝敬，实际上是叫徒弟送礼，作为长期剥削徒弟的手段。

六、康达多尔济的进家和领法

康达多尔济，是伊盟达拉特旗的札萨克（王爷），由于王若瑟的来绥远，地方的军政头子多参加青帮，因而打动了，由五原垦务局长幕松鹤介绍，投拜刘长荣为师。听说递小帖子的押帖礼就是三百元现洋。在开大香堂的那一天，刘长荣把全归绥市的大小青帮首领都邀了去，地点是他家住的济盛元马店，时间可能是一九三五年春夏之交，我（以下的“我”是卢健飞自述）是兴武四帮的通字辈，也在被邀之列。到后，刘长荣指我为站堂师兄（这时没大字辈的师父，执事者都以师兄代），香堂的陈设，大体如以上所说，据说这是在归绥开香堂最大的一次。旋即按香堂的仪程进行，由康王站在供桌前的蒲团前，传道师（由传道师兄张占鳌代）站在供桌的左上首，本命师站在供桌的右上首，其余执事者各执其

事，无事者按帮头分班站列。我记得六大帮的首领都有，以杭三帮的人最多，张子含是执堂师兄，由他司仪（司仪人称为朝奉，亦称办行道的），在事前刘长荣因康王烟瘾很大，身体很弱，又王爷身份不小，曾叫张子含照顾他，少磕头。张子含在进行时，虽然尽量裁并磕头，並少念香歌缩短时间，但主要节目仍磕的不少。我在站堂时，曾亲眼看见康王因头磕的多，累的受不了，头上的汗珠子滚滚流下来，当场吃了点烟药才好了一些。特别令我感触的是这位王爷，平素在旗内作威作福，架子十足，想不到他今天能这样。我曾在包头会见过他一次，他旗下有个仕官来见他，这个仕官头戴亮蓝顶子，官儿也不算小，在见他时先行跪叩礼，随着就垂手立站，康王躺在大烟灯旁连看也不看，不要说让坐了。接着问话，康王说一句，他“喳喳”的“是”一句，最后仍行跪叩礼退出门外。而这次康王在香堂上，不仅要给祖师爷叩头，要给本命师、引进师、传道师的三代叩头，还要给各帮的前人们叩头，给同参们普遍见礼叩头，虽然所叩的头数达不到“够不够，九百六”，但可以说他一生从来没有叩过如此多的头，特别是给象这样一些人去叩头，这真是在他们这个阶级的历史中罕见的事。

现在再谈一谈康王的领法，也就是介绍青帮的传法。按青帮的传法有两部分：一部分在香堂上传领，主要是传所人的帮头、船号、三代和帮规等；一部分在师父家里传领，主要是传帮内教义和秘密行话等。这两部分在康王领法时我都参与，和我所领的没什么大的不同，只是他是杭三帮，我是兴武四帮，在船号、三代各有所属而已。

在香堂上，首先传给他帮头、船号说：“帮是杭三帮，满运船四十二只、七只停修，卅十五只运京，归三房祖师所拉，长房

拉两只，八个窝子，次房拉九只，卅六个窝子，本房拉廿四只，二百二十七窝子，共拉老窝二百七十一窝。所是分三所：长房琥珀所，次房阴阳所，本房是紫金所。旗号是白旗红银边阴阳月亮，上红下黑，火燎雀杆，外打小偏毛，前半所当家的姓郭，后半所当家的姓毛，运粮是在浙江嘉兴府嘉兴县，石门平旺玉石码头，兑嘉兴三县的粮，归浙江廿一帮。（窝子即小划子，在水浅时可分开装）

其次传给他的班辈，先告给他青帮廿四代的排字，后说他是通字辈，是第廿二炉香进家。

随着就传给他三代：先告给他本命师的三代，说：“师父他老人家姓刘，上长下荣，字华亭，大字辈；师爷，他老人家姓郑，上忠下思，字筱亭，理字辈；师太，他老人家姓孟，上广下源，字茂贤，行字辈。并且还要把他们的籍贯住址都传给。接着就传给引进师、传道师的三代，也是这样传法。

在传给三代后，进帮人必须要牢牢记住，因为作为一个安清道徒，最大的标志是能记清自己的三帮九代，特别是要能记清本帮的三代。如果记不清，就会被帮内人认为冒充，因为帮内人有这样两句话：私充安清到处有，提起三代发焦愁。在帮人千万不能忘了本帮的三代，江湖上主要是盘问这一点。

再就是传给他十大帮规和十大禁止。十大帮规是一不准欺师灭祖，二不准藐视前人（各帮师父皆是师父，分帮不分家），三不准扒灰倒坵，四不准奸盗邪淫，五不准江湖乱道，六不准吃里爬外，七不准扰乱帮规，八不准开闸放水，九不准以卑为尊，十不准欺软凌弱。十大禁止是：①一徒不准拜二师；②父子不准同拜一师；③师死不准再拜师；④关山门不准重开；⑤徒不收不准师收；⑥不准兄弟字派有高低；⑦不准本帮与本帮引道；⑧师过

方（即死）后，不准代师收徒，⑨在道不准诽谤道，⑩香头低不准爬高。从这些戒条看来，很显明地是要维护帮的团结和利益，更着重的是要维持师徒的封建秩序。

但香堂上传授的这些道法，在当时是记不完全的，因此各帮都有抄本，将这些记录起来（还有其他许多细目）名为通抄，又名“通漕”，在事后由进家人照抄，也有翻印的作为密本。其中还载有过去船运上的行话，这时已不重视。

在师父家里所传的是帮内的教义和秘密行话，那是康王在上大香的第三天，由引进师兄陈建勋引到刘长荣家中认家，由刘传给。刘还邀我和张子含到他家中陪坐。这时，刘所传的道法，在教义上说的道理较少，主要是说，“你入帮后，应知师徒如父子，同参如手足，一师皆为师，一徒皆为徒，对帮里人应患难相助，要做到帮丧助婚，扶老携幼，以义气为重，要抱打不平，不要凌弱欺寡。总之，要严守十大帮规和十大禁止”。接着传秘密道法说：“青帮是秘密组织，不许在社会上公开表示自己 是帮里人，只能在言语行动上作暗示。如放帽子，应帽口向上，但帽内应放手绢或其他物，这表示帽子是船，帽内放有东西，是船内满载，如果不放东西，同帮人看见，认为你是空船，便会有人向你帽子里倒水，说船已卸载空了，应当刷船。又端茶拿烟，都是左手用三个指头（屈母指和食指）右手用四个指头（屈母指）这表示是三老四少。所谓三老，远的是说翁、钱、潘三祖，近的是说师父、师爷、师太；所谓四少，远的是说朱、黄、刘、石四小祖，近的是说现在帮内的弟老的（徒弟），小弟老的（徒孙），少法师（徒重孙），少法孙（徒曾孙）。出外远行捆行李，要绳子横三竖四，向人家敲门，要先三下、后四下，这都是表示三老四少。如遇见同帮的见礼，应叉手整顿（叉手是两臂交叉，将手搁在

肩下；整领是双手並起，提提前领），在谈话时，应开口称老大，如他问你“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姓什么？”你应说，“从杭州来，到通州去，姓潘”，如问你的班辈是哪一炉香孝祖，你应说，“头顶大字，怀抱通字，手拉无字，后跟学字，是第廿二炉香孝祖”。如果对方的班辈小，他说要给师父见礼，你应说，“不要了，咱们香堂口见吧！”你如果出门在外没有钱，想向同帮的求帮，可在茶馆酒肆里，要一壶茶和两个茶碗，除把帽子翻放在桌子上外，在坐时应左膝压右膝，並使左手压右手放在右膝上，这样暗示出自己是帮里人，如有帮里人看见，就会问你，你向他请求帮助，他有钱就会把钱搁在你帽子里，如果你不说道内行话去拿，他便认为你是冒充，你必须用手向他腕子上一擦说：“请老大开闸放水吧！”他才会给你。特别是你在路上遇到危急的情况时，过去头上有发辫，要把发辫从脑后转搭在胸前；又穿有大襟的衣裳，要把大襟的上领掩起，象出家人的园领一样，就会有同帮人把你搭救。现在虽然没有发辫或有时穿的上衣不带大襟，但只要把衣领掩起，成为园领，仍然有效。在住旅店时，为了多得帮里人关照，更要多暗示自己是帮里人，並且放鞋也有暗记，如在要住的时候，是鞋头向内，要走的时候，是鞋头朝外。

按过去师父们相传，把发辫搭在胸前，是表示不要发辫之意，把上衣掩成园领，是表示要恢复明代的服制，帽口翻放是要变天，以及潘祖遗像的表示，都含有反抗异族的意旨。但到这时，刘长荣和青帮师父们，都不再传这个意旨了，虽然是时代变了，没的可说了，但在当时外侮严重、国难方殷之时，为什么青帮不能把这个民族革命的精神转移到抗日救国上，向徒众灌输呢？这足见青帮的无人和腐朽。

在开山门方面，刘长荣因那时连香起已打破了旧例，康王又

是高贵的徒弟，更当示以优待，便随着上大香就当堂给他开了。

康王进家后，为了联欢，曾在归绥市绥远饭店摆了好几桌酒席，宴会青帮的大小首领，当然刘长荣是首座。当康王向他敬酒的时候，我看到他面呈得意之色，很有点飘飘然。以后康王每来归绥，都和他有接触。

关于康王进家的消息，没多久就传到社会上，有不少的人都很惊异地说，“想不到康王以王爷的尊贵，也要走上这个道儿。可能是他好奇心的驱使”。但实际上，他并不是为了好奇，乃是有他的政治用意。在那时，他本旗（达拉特旗）人民，因不堪他的剥削压迫，曾闹过“独贵龙”反对他。他为了维护王爷的宝座，便多方面想办法增加自己的力量，因而也就想在青帮上打点主意，一方面，他是想借此拉拢些汉人给他帮腔帮势，如他和绥远蒙旗指导长官公署的处长慕幼声，谘议吴瀛洲，就以帮的关系拉拢得很亲密，遇事多得帮助，刘长荣也多方面给他吹嘘，说他聪明；另一方面，他是想借此在本旗组织些人作为自己的亲信，如张子含就以帮的关系当了他的副官主任。他还把一些随侍的护弁收作徒弟，以求能更忠实于他。可见他当时放下架子磕头认师，并不是什么好奇心的驱使。

七、傅作义和青帮

傅作义对青帮一向是不重视的，并且怕传染了他的军队，影响了他的统治，因此把刘长荣调离军职，在归绥市住闲。但不久他的看法和做法就变了，先是有人传说他对上海的青帮很欣赏（一九三三年长城战役后，杜月笙首先以慕名赠给他像片，随后他到上海与杜见面），接着他又向王若瑟递过拜师的帖子，并且由不

公开到公开地利用青帮。这首先表现在我身上。我那时担任伪绥远省政府秘书，有一天，他叫我成立密查组，由我当组长，要我学包文正铁面无情地去检查军政人员的贪污不法行为。我那时认为他对我看得起，並想藉此向上爬，便欣然接受。干了几个月，甚感人手少，耳目不灵，密查不出什么名堂来，这就想起在安徽宿县老家时，远房伯父卢正金和我说过的关于青帮的话。他是个老青帮，通字辈，收的徒弟很多，经常有外边的人到他家里去。他常和我谈到青帮的事，说加入后走遍天下皆朋友，困难时有人帮助，危急时有人搭救，再好没有了。我回禀我父亲卢正卿（是地主，秀才），他说：“你伯父不务正业，和下流人为伍，才弄那些玩艺，你不要听他那些话，跟他学。”虽然我再没跟他学，但帮内的“通漕”，我曾在他家中偷看过，什么三帮九代，什么船只旗号，什么三闸、五坝、七十二个半码头，什么七飞禽、八走兽、十二道金牌（系指船上部位和用物），这些表皮上的船运行话，我都知道一些，但对于上述师父传法所说的那些暗示，则无从知晓，一直到后来出门在外，也再没有人和我谈此事，因而我伯父的话，也早就忘怀了。这时搞密查组，遇到了人手少、耳目不灵的困难，又适王若瑟来绥远，煽起参加青帮一股风，这就使我想起我伯父“走遍天下皆朋友”的话儿来，动念参加青帮，从而利用它，以期能到处有人相助，耳目灵通。但这时王若瑟已经走了，无人介绍，想拜我伯父为师，又嫌他的辈小。

有一天，我在绥远省政府西院办公，绥远省政府的谘议张宣泽（伪中央介绍来的军统分子）到我屋内闲谈，在谈到王若瑟时，我说：“我也想拜他为师，惜无人介绍。”他说：“不必一定要拜他，华北五老都是大字辈，在北平收徒，我就是北平拜兴武四大字辈吴鹏举为师的，吴是华北五老年岁最大的一个，你

要想参加，我可以给你介绍，押帖礼要十元钱，连请客送礼，约需廿多元，象这样大的班辈，虽花这些钱，也够便宜的，因为他们现在大开山门收徒，才有这样的机会。”我那时正是求之不得，即请他介绍，由他写信给吴，得了回信，我便拿上他的介绍信到北平卧佛寺找见吴，拜吴为师，并且是连香起开了山门。吴那时已年近九十，老态龙钟，徒弟们在寺内来来往往的很多，在开香堂时，和我同时参加的，还有四五个，香堂陈设的非常讲究，一切礼仪都由徒弟们代办，他不过是进来看看而已。他家住在北城（地名忘记），领我认家的是引进师兄许人亭，过去不认识，是在香堂上临时指定的。从此我就成为帮里人。

回绥远后，我想我已经是开了山门了，为了广布耳目，可以利用它大收徒弟。但一转想，自己新进帮，年岁又轻，在帮内一切生疏，不压众，怕收徒自己弄不好。不如一方面和当地的同帮多联络，请帮忙，一方面叫密查员们分头参加，给他们作徒弟，和他们厮混在一起，把他们都利用上。结果就按后一个想法办了。那时是一九三四年初，刘长荣已经在归绥颇有名声。我首先和他拉拢，其次是和各帮的首领们拉拢，他们认为我是省政府的秘书又兼密查组长，是傅作义的亲信，也愿意拉拢我。那时拉拢的手段就是吃喝嫖赌抽，无所不干。花街柳巷，饭馆酒楼，都常有我们的踪迹，因而大家也就臭味相投，无话不谈。同时，我组内的副组长杨雨帆，密查员孟广才、麻带雨、杨松茂、杨玉清、赵大义、费德明、牛成焕、沙省三、花宏源、李明甫、张文海、庞子政、岳进升、王宇先等廿来人，也都参加了青帮，他们的班辈，有的是无字的，有的是学字的，还有的早拜刘长荣为师是通字的。也都因此而取得工作上的便利。（此外还以帮的关系，吸收一些有职业的青年做密查工作，如马映光、吴希圣、毛郁文等人）。

从此我组的“耳目”就比较过去大大地灵通了，报告的材料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了。至于报告的内容，比较重要的能记起来的，有武川县县长席尚文的贪污，集宁县县长赵承绅的贪污，绥远电信局局长王继畲的贪污，绥远公安局裴会的贪污，包头县绅士李聚五、牛申之的不法，固阳县科长张国玺的不法，兴和县绅士王宾绥的不法，这些问题的查出，都与帮内人的帮助有关，其中经过记得比较清楚的，是绥远电信局局长王继畲的贪污，由于他的管料员是青帮，被我组密查员以帮的关系，向这个管料员进行拉拢而查出的，他买料是买少报多，用时是用少报多。

但我这个利用青帮的办法，是否得到傅作义的同意呢？可说是得到的。我曾将这个做法，当作工作计划的一部分报告给他，他开始不作表示，我就猜想他的心理，并不是不愿意这样做。如果不愿意，他在当时就会提出来阻止了。他不作表示，是怕允诺后，被我传出去，帮内人会借着他的名义在社会上招摇，与他的声名有碍。因此，我为了解除他这点疑虑，便说：“这以我个人的名义去做，与主席不发生关系。”他便点头允诺了。我照计划去做，报告一天比一天增多，他很感满意。有一天，他愉快地告诉我：“你可以和刘长荣那些人多联系，做好这个工作，并要在调查贪污不法以外，附带调查地方情况。”接着不几天又发表刘长荣为绥远省政府调查员，叫刘尽可能利用青帮的关系，做百灵庙和绥东敌伪的情报工作，可见他已经是公开地要利用青帮了。

在利用刘长荣方面，傅作义得到的甜头更多。刘接到这项情报任务后，即运用帮内人从归绥市到敌伪区各旗县，组织了一个情报网，并且还派些人化装打进李守信、王英的部队里，因而对百灵庙德穆楚克栋鲁普如何搞自治运动，日本人如何进行侵略活动，伪蒙军的人数和装备，得到了不少情报材料。这些材料，有

助于那一次百灵庙战役的胜利。刘长荣还利用青帮关系，把动摇不定的绥东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龙争取过来。当时德穆楚克栋鲁普以达密凌苏龙是他的老朋友，屡次以复兴蒙古民族相劝，要求达归向于他，达甚为动摇。傅作义侦悉后，以正黄旗在绥东和敌伪接壤，如达有变，不仅威胁前线，并且影响后方人心，甚为着急，便叫刘和慕幼声同去正黄旗，要求达共同防御敌伪。刘以达的亲信秘书赵××是青帮无字辈，便利用此关系，请赵向达做工作，经赵多方劝说，达才坚定下来。刘向傅转报后，傅即委达为“司令”（绥东蒙旗兵司令），拨给了些械弹，达甚为高兴，即和刘结为金兰好友，并送刘好马一匹。经过这一事件，傅作义更看重了青帮，不久即委刘成立绥远国民兵骑兵团（因臂伤未到差，骑兵团始终未成立），直到抗战时期，仍继续利用刘搞青帮，这是后话。

在那时，我和刘长荣的关系搞得非常密切，一方面是我要利用他在青帮中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他要利用我和傅作义接近多。因此两人经常会面，比其他帮内人都亲切。他有了地方军政人员的情报就告诉我，我得到敌伪活动的情报也告诉他。他曾把小儿子刘吉悌介绍给我当密查员，我也把没有参加青帮的密查员，介绍参加他这一帮。就这样搞了有二年。百灵庙战役后，我离开密查组，彼此没什么可互相利用了，才渐渐地淡远了。

除傅作义这样利用青帮外，在他警宪机关的大小首脑也利用青帮。兼省会警察局长袁庆曾亲自参加青帮。所属分局长郑冠三、韩伯琴，侦缉队长薄仁山等人也都参加；宪兵司令副参谋长张公亮、参谋高恒也都参加。他们的目的和我是一样，都是为了打进青帮，用作侦察的工具，不过侦察的任务有所不同而已。同时，我还了解到我组的个别密查员，以青帮关系给他们找情报，两头“吃”。

此外，我领导密查组两年多，虽然利用青帮查报了不少的贪污不法材料，但傅作义认真究办的极少，即使有所究办，也只是捕打几个苍蝇（如有的连长吃一两个空名子、军需冒领点款、税务员开了大头小尾的税票，不幸被我们碰上查报了，因而受到处罚，其实这是普遍的现象），或者是靠山不硬的（如武川县县长席尚文的靠山不硬，就是由我组查报他有贪污五百元的线索，经傅令省府复查丢了官的）。至于靠山硬的，如集宁县县长赵承绅是赵承绶的弟弟，电信局局长王继畲，是建设厅长冯曦的亲信，塞北关监督张秀升是阎锡山放下来的人，虽然查报他们有重大的贪污，傅作义也不想触动他们，只是把材料看一看就完了。同时我还了解到傅作义本身也并不是干净的，他把各地人民对绥远抗战的捐款，大部分挪用开了“共济社”做买卖，名义上说是为全军谋福利，实际上都作了他自己的买卖资本，由他的亲信王子才，在各大城市广为活动获利无数，至于他叫军需处向上虚报冒领，就更是常事了。特别令我们难过的是，在我组查报有某人的材料时，傅为了表示信任某人，竟将原报告交给某人看（这些人都是亲近他的大官），结果某人对原报告人永远怀恨，借机报复。如傅的参谋处长张濯清，就被我组密查员麻带雨查报过，说他吃某些军官的贿赂和吸大烟成瘾，傅即将这个报告转给张看，张对麻带雨始终衔恨，后来麻到部队，遇有保升机会，都被张压下去。至于我被这样的人视为仇敌的就更多了，甚至于他们有的遇到傅作义对他们耍态度时，都疑心是我在暗中说的坏话。因此就使我感到象傅作义这样的做法，如何能制止贪污。他是拿着我们做幌子，虚张声势，叫我们替他挨骂，把我弄成众矢之的，而且我对他如此卖力，他也并没有给我加官加钱。还有好心的朋友劝告我说：“你快不要干这个了，你能保险你的密查员说的话都对吗？如果查报错了

就‘缺德’了，就是傅作义不办，也给人家抹了黑。”我想了想，不但不敢保险密查员，连自己也不敢保险，因此就向傅作义表示不干。傅起先还劝告，后来看我一再表示消极厌倦，便把我调为绥远省政府设计室主任，从此就离开了密查组，这时已经是抗战的前一年夏天。

我到设计室后，因是领着一些新毕业的大学生搞设计，无利用青帮的必要，也就不再继续做利用青帮的活动，所有旧日交好的帮内人，就都逐渐地淡远了。

八、伪中央特务和绥远青帮

我和张宣泽虽同在绥远省政府供职，但开始我只听说他是伪中央介绍来的，并不了解他的底细。至于他介绍我参加青帮，我当时也只认为是一般朋友性质的帮助，不认为还有其它目的。接着在我参加不久，他就以帮的关系和我亲近了，并且时常有意无意地问我傅作义的政治态度和当地军政人员的情况，但我还不大理会。到一九三五年春，有伪中央的“蒙古旅行团”到了归绥，住在新城东街旗杆巷姓倪的院子，恰恰和我是院邻，团长是李才桂。在他们来了后，社会上就有些传说：“他们打的是旅行团的幌子，实际是要做蒙绥的军事和情报工作，这些人都是蓝衣社的分子，蓝衣社是蒋介石的秘密组织”。这时候，我心里就想，蓝衣社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团体？我倒要了解了解。在和李才桂认识了以后，不久张宣泽也来了，把我和李拉在一起说，大家都是帮里人，李也是兴武四帮通字辈。接着李就约我和张同往刘长荣家去拜访，叙一番青帮交情，并请同到麦香村吃饭，我和刘也回请了

他们。从此李也同张宣泽一样，常常找我闲谈，有意无意地问我绥远的军政情况。同时，我也听刘长荣对我说，这两个人常常到他那里问长问短。由此我才觉察到这两个人都要利用青帮关系作情报工作，把我们俩看成他们利用的主要对象。我因为那时傅作义对我还看得起，颇感知遇之恩，便对刘说：“他们问是问，咱们可不能出卖主席。”刘说：“那是当然的。”但同时我还有另一些想法，我认为当时傅作义在绥远的处境并不是舒服的，除了德穆楚克栋鲁普在百灵庙搞高度自治和他对立外，特别是阎锡山这个婆婆，对绥远军政大权，都不放手。阎在绥西派有嫡系部队王靖国，在绥东派有嫡系部队赵承绶，把傅作义的部队夹在中间；行政方面，以他的亲信冯曦（建设厅长）对傅作义作无形的监视，这都使傅很受制，无可奈何。因此我认为傅作义如果这样跟着阎下去，日久天长，决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并且从全国来看，晋绥不过是一隅之地，泥潭里翻不起大浪，鸟儿应该向高处飞，因此也就认为傅作义要想有发展，不如投向蒋介石，这是替傅想的一方面。同时，在个人方面，因看见伪中央派来的李才桂这些人，举止豪奢，花钱如流水，由不得眼红心热，从而想到跟着傅作义蜷居绥远，究竟是出息不大，如果傅作义能走蒋介石的路子，他有了发展，我个人也能随着升大官、发大财。从此这两个人一问到傅作义时，我就把傅作义受阎锡山挟制的这些话告诉他们听，并说傅虽想脱离阎锡山，但没有力量，不能不相机应付。中央要分化阎的力量，就应当多方面培植傅作义，对付蒙古的变乱，也只有傅作义能对付的好。这些话，刘长荣也同意，他也是这样谈。他们在表面上都认为我们说的有理，但是否真以为然，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们俩这种反阎投蒋的思想，和阎的排外也有关系，因为我们俩都是外省人，万一傅被阎弄下去了，我们在阎的势

力下不可能吃得开，所以愿傅离开阎）。

我和张宣泽、李才桂的拉拢及对傅作义处境的想法，並不瞒着傅作义，並向他说，应利用他们替咱们向中央说好话，这比较有效力。傅作义听了后，面帶微笑，不作可否。但不几天，他就专请蒙古旅行团的全体团员在绥远省政府内宴会，並对这些人表示得非常亲切。特别是他历来宴会客人，都没有请我作陪过，而这次竟只请我和张宣泽作陪，並告李才桂有事可和我们俩联系，究竟他心里是什么意思，这就不言而喻了。（其实傅早已暗中投靠蒋介石，他走的是他的晋南老乡四大家族之一孔祥熙的门子，对李这样做不过是个小配搭。孔作寿时，曾派他的亲信王丹九去祝寿，向王透露傅献给的寿礼是极为贵重的砧石。傅认为王办的好）。

由于这样，我便和李才桂一天比一天接近，经常聊天。在那时，我因傅作义叫我在密查贪污不法的同时，並附带密查地方情况（在这个任务上，傅只说碰着什么查报什么，並沒有指出重点），虽说是附带，但也查报了不少材料，如绥远乡村建设工作的不同反映、地方党派互相斗争的内幕、阎锡山和伪中央派来人员的活动（最显著的是我组密查员张文海在邮电检查中查出《边疆通讯社》社长赵尺子不少秘密通信，赵也是伪中央派来绥远的特务，他的密信是用药水写的，但一经火烤就显出来了）以及当地军政人员生活的形形色色，我都查报过（多不深入）。因此在他问我时，我就以此和他谈，但只说有利于傅作义的，不利的就不谈了，即使谈也是把坏根子归到阎锡山名下。如绥远种大烟就说是阎锡山的指使，“禁烟稽查处”是阎直接指挥的机关，在绥远收土又敛钱，傅作义並不愿这样干。在共产党问题上，他虽问我，我却没有什么具体的可说，因为傅作义没有特别指示我查

报，只当一般的地方情报看待，没有作为重点。傅还把一个有共产党嫌疑的军官杨雨帆，放到我组里当付组长，也没有叫我特别注意杨的行动，同时我也没有发现杨有什么秘密活动（杨抗战后到山西解放区），只是密查员报告过宋志刚的女儿宋守莲有共产党嫌疑，我向傅转报过，也未作深究，此外再没看到什么材料。但这并不是我有意忽视，而是傅没有特别指示和我没有多碰上的关系。

过了些时，我弄清楚他们来绥远的主要目的是要向各蒙旗打进军事人员，去掌握蒙旗的武装力量，从而瓦解蒙古的自治。他们搜集绥远军政情况固然重要，而搜集各蒙旗情况更为重要，但在这方面我不专做蒙旗情报，不如刘长荣了解的多（刘这时已经给傅作义组织青帮情报网，调查蒙旗敌伪活动），因此就叫李多找刘谈。刘也因彼此都是帮里人，尽量地告给他。

与此同时，我也常常问他：“中国是否能把日本人打出去？中央为什么不动员打？共产党是否能剿除？”他总是说：“有蒋委员长这样的英明，一定能把日本人打出去，把共产党剿除，使中国复兴。现在不动员打，是在储备力量，我们应暂作忍耐。”我还一再问他对中央对傅作义的看法，他只是抽象的说：“对傅的看法很好，认为他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军人，蒙边的事，一定要依重他，但对阎锡山也不能不应付一番。”此后因交往较久更熟惯了，我便问他蓝衣社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组织？始而他不承认，后来我以社会纷纷传说作证，把他逼急了，他说：“即使有，也没有蓝衣社”（直到前年，我看了文史资料选辑康泽写的关于复兴社的史料，才知道当时只有复兴社，没有蓝衣社这个名称，这个名称，是刘健群个人向蒋介石建议提出的）。我又问如果有了，我们能参加不能？他说：“不好说，那须要经过多方面的

考察。”后来我又进一步向他表示要参加（这其中虽也有点想看看他们的内幕，而最大的目的是想借此抱蒋介石的粗腿），他说：“这里办不到，将来我回南京见了他们再说，这是由于咱们帮理和朋友的关系好，我才这样说，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数月后，他回了南京，随着就来信说“此事办不到”，又说他不再来绥远了，所有蒙古旅行团的事已交给团员常荫森代理，希望我多和常荫森及阎家屿（阎当时搞伪中央军校通讯活动，也是特务）联系，并帮助他们。我这时很感到失望，并认为李是伪中央参谋本部的课长，是黄埔三期学生，和当时要人多有交往，在南京尚办不到，说明他们俩人官小职微，作用不大，我和他们联系该能联系出个什么名堂？这明明是敷衍我。因此我就对他们不感兴趣，虽然常荫森还有时找我谈，我也只是淡淡地应酬，不和他说什么有关系的话。我想他们不让我参加的原因，可能是认为我做的是傅作义的密查工作，怕傅作义叫我打进他们的组织，捣他们的鬼，因此只能是以青帮的关系，利用我作为他们的外围而已。

在刘长荣方面，除李才桂、张宣泽利用他外，还有人说另一个国民党的特务艾香亭也利用他。这个人来归绥后，在牛桥下开济盛元马店作掩护。为了利用刘长荣，专拜刘为师，并请到他店里住家，不要房钱，照顾毕至，其中详情如何？没听刘谈过。

由上可见，傅作义要利用青帮为他的统治服务，蒋介石特务要利用青帮作为特务活动的外围，甚至于封建的王公康达多尔济，也要在青帮上打点主意。在这时，绥远的青帮，广布在社会上中下各个阶层，好象人多势重，显着兴盛，但实际上已经为剥削统治阶级所把持。同时，在家里义气上，也好象有些人交往亲密犹如家人，但实际上是互相利用，各有用意，一旦无后利用，就视如路人，我在抗战期间就亲身经过类此之事。因为那时我在傅

作义面前失宠了，很不得意，想另找出路，听说张宣泽在兰州（他是抗战前离开绥远的）当了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的大女婿（还听说朱的大女儿给朱管家很有权力），借裙带关系大走官运，我便想起和他在绥远有青帮的交情，托他在后方给我找个一官半职。不料去信后，他连理也没理，使我很伤脑筋。但后来一转想，我们这些人的青帮交情，本来就是互相利用，根本谈不到什么家里义气，现在自己没有利用的价值了，当然人家也就不理了。不仅人家是这样，就是自己也是这样，如自己不干密查组，就和青帮的朋友淡远了，不就是个例子吗？因此对青帮就不再存什么幻想，仍然跟傅作义干下去。

九、刘长荣留绥和民生会的成立

抗战开始后，傅作义率部队由大同撤往山西内地。不久敌人即侵犯归绥，傅作义令绥远军政人员向山西撤走，一部分国民兵自行撤到后套。刘长荣那时没有能随着撤走，据他家中人说，是因骑马摔伤，在家中将养不能出门之故。但后来人们谈论起来说这不是他留绥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他留恋自己的房产家财和怕走出去受艰苦。也有的说，当时傅作义的卅五军撤往山西，日本军迅速打到归绥，他在家中仓皇失措，待想走时，部队已撤出，便跟不上了。但不论如何，他是留在归绥了，最后演出了一出悲剧。

在日本人侵占绥远后，开始对青帮尚无暇顾及。到了一九三九年，就着手利用它，指使青帮的首领们在张家口筹办“民生总会”，目的是要把伪蒙疆的青帮成员统一组织起来，在张家口特务机关直接领导之下，作它们的特务工作。

日本人的做法是这样的：首先由华北的特务机关从北京把青帮大字辈的首领蒋万春、顾炎年、宋殿邦（吴鹏举已死去，王若瑟不详）请到张家口，刘长荣也同时被电邀去，这几个人被推崇为民生会的元老，号召一切，随着就叫张家口通字辈的青帮首领祖呈焜负筹备成立“民生会”的实际责任。祖呈焜是华北著名汉奸殷汝耕的亲信人员，在殷汝耕成立冀东自治政府、分裂祖国国土、献媚敌人时，祖担任殷的秘书，发了不少财，后来不干了，回到张家口，拿他的赃钱大作旅馆、饭店等买卖，并拥有青帮徒众，成为张家口的坐地虎。这时日本人把他起用搞民生会，他就和张家口的青帮头子金小忠（通字辈）、魏健（无字辈）着手筹备，于一九三九年四月间召集到各地青帮首领，开了成立大会。

在开会时，张家口的宪兵大队负责人和伪蒙疆政府内务部部长王振华都到场讲话，大意说：青帮的人都是大大有用的人，虽是个团体，但没有能统一起来，这次成立民生会，就是为了把这些有用的人组织在一起，协助皇军作有利民生的事。现在首先要作好登记工作，把所有的帮里人都登记进来，然后再发展组织，帮助皇军和政府作好调查工作。接着就在张家口设民生总会，以青帮大字辈的师父们为元老，在元老下设理事会，由祖呈焜任理事长，魏健任秘书；青帮成员较多的地区设分会，分会设干事长一人，干事若干人。计有宣化分会，干事长为金小忠，平地泉分会，干事长为朱尚真，厚和（即归绥）分会，干事长为元老刘长荣兼，包头分会，干事长为刘寿山，萨县分会，干事长为崔江。分会由当地特务机关就近直接指导，下设六个股：①登记股，②调查股，③会计股，④朝奉股，⑤传道股，⑥总务股。发表后，因各地区的干事长都是当时与会之人，日本人即叫回原地着手

组织，有问题可向当地特务机关请示办理。

刘长荣回到归绥后，即暗告王明远说：“我看这事情要坏，日本人组织民生会是要把我们都登记起来，等到登记齐了，好把我们一网打尽。我听说日本人进了东北后，就有过这种做法，但我们现在又不敢不登记，只好照着办，听天由命罢了。”王明远说：“那也只有这样，别无他法可想。”接着厚和市的特务机关就叫刘长荣着手组织，经刘和帮内的人商议，厚和分会设干事十三人，他本人兼任干事长，干事为张子含、张占鳌、王明远、于化门、韩令文、李同、王志诚、孔夏亭、胡清源等人。下设六个股：登记股长为佟树屏，调查股长为贾生福，会计股长为翟凤仪，朝奉股长由李同兼，传道股长为王志诚，总务股长由张子含兼。随着即召集帮内成员开成立大会，宣布一切，厚和市军警宪都派员参加，特务机关的宫琦亲临讲话，内容和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所讲的大体相同。会后即向刘长荣和干事们要求履行以下的任务：首先是要调查中国抗战军队的方向、距离、人数、兵种、装备及活动的情形，特别是要调查共产党的八路军，其次是要调查日伪军警及汉奸特务们的不法活动，再就是要调查地方的年成丰歉及人民的生活情形，这不过是附带的作调查，以应付民生会的这个幌子而已。在经费方面，日本人不发给，由帮内自己筹划。地址设在旧城剪子巷凉城会馆内，刘长荣则仍住牛桥济盛元马店内自己家里。

在进行登记手续上，规定凡上过火香的安清道徒，均须到会登记，并发给登记证和徽章。登记证是由张家口总会统一印制，其形式为一硬纸折，折面印“义气千秋”四个大字，折内印帮头、辈次、姓名籍贯、出生年月日各栏，并勾画有“防共”两个虚线字，可见日本人在当时对青帮的用心所在。徽章为铜质，黑边

紫地，内画太极图，又叫阴阳鱼，表示道贯阴阳。背面还有帮丧助婚，义气千秋等字。在登记时，有本帮师父证明，本人申请，经登记股报由干事长批准，即办理手续和发给证章。同时对新吸收进帮的人，规定各帮均须在民生会里摆香堂，不得在会外私摆。

在经费的筹划上，主要是收会员的登记费，每人收两元，除登记证和徽章开支小部分外，均归为会用。再就是摆香堂，每次用不完的香堂费，亦归为会用。另外是每年包卖历书、月份牌，把赚来的钱作为补贴。这一笔买卖，也可说是日本人特许“照顾”的。因之民生会虽日本人不给钱，仍能够自给。

十、刘长荣和各方面的关系及刘长荣之死

首先谈谈刘长荣和傅作义的关系。傅作义在退到山西后，仍不忘情于绥远，不忘情绥远的青帮和刘长荣。刘长荣在当时虽顺从了日本人，没有离开绥远，但亦不忘情于傅作义。因此傅作义在三八年进攻绥远前，就派溧报薄仁山和刘长荣联络，要刘帮助做日本人的情报工作，刘对薄尽力帮助，供给了不少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傅作义那次进攻虽未得手，亦对刘甚为重视。三九年，傅到了后套之后，对刘更想充分利用，不但要他做情报，还要他做策反工作。据刘吉悌亲见：傅作义在三九年三四月间，曾派卅五军书记张庆武（刘的远房表亲）、中尉排长赵成勋（刘当营长时的老班长）到刘家中，送给刘一个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招抚司令的委任状，状是用一块白绸子写的，盖有关防及傅作义的名章，刘见后即交其长子刘吉孝带到集宁，埋在自己的院内，于是就组织招抚司令部，以杨丕滋为付司令（原绥远兴和县士绅，

民国日报编辑，刘的徒弟），邢寿臣为参谋长（由伪蒙古军总部的嘱托，后来调伪包头市警务科长），费德明为副官长（原绥远省政府的密查员），张子含、张占鳌、范秀锋等都分任司令部各处首脑；从此就大开山门，积极地拉拢伪蒙疆的军政上层参加青帮，作策反活动。在伪蒙军中吸收有四个师长为徒弟，计有第一师长刘继广（山东人，和刘认本家），第二师师长陈升（热河人），第三师师长李明远（热河人），第五师师长刘建华（东北人，后调厚和警察局局长，以包贵廷代），此外还有伪蒙军一个宪兵大队队长李铁生，伪蒙军防共第一师师长李维业，这些人都经刘说好，愿投傅作义反正，並电请傅批准加委，给了番号，令待机反正（电台先由伪蒙军秘密通讯，后自设）。在政界中所拉拢比较知名的有伪蒙疆高级法院院长关怀青、检查厅厅长王庆三、厚和市地方法院院长李建安，都拜刘为师，主要是为了帮内人犯了案有关照。

在另一方面，刘更积极地调查敌伪军的军事情报。特别是在打包头、打五原的两个战役中，傅作义急于要情报，他们越发地忙起来了，每天都派人侦察铁路兵车来往及汽车出动的兵种、兵力情况；每天都向这几个愿反正的伪蒙师长要敌人的军事消息；每天晚间都要到他们秘密聚会处所——新新饭庄去碰头研究。刘长荣还亲自到过包头两次，布置这个工作。

刘长荣和绥远的抗日救国会，也有密切联系。有不少的抗日救国会会员，为了找“掩护”，进入了青帮，魏大贤就是其中的一个。刘给过他三百元蒙疆钱，介绍他和新民药厂的刘慎行（通字辈）合伙作买卖，由此得到掩护。有人向刘说魏是共产党，刘说我不管他是什么人，抗日救国就好。他们还给魏买过两毛驴子弹就出去，並代发过抗日救国会的传单。同时他对大青山的自

卫军也很关照。有一次自卫军司令于存灏派到归绥的谍报躲藏到他家里，警察要逮捕，他坚决拒绝，终没有被抓。

在和国民党的特务关系上，前边已说过，济盛元马店经理艾香亭，是个老特务，在抗战前对刘极为殷勤，人们就认为刘被艾利用，到这时，艾和刘住在一起，更为亲密，吃用不分。人们从他俩的关系上看，认为刘可能已被艾拉到特务的圈子里去。还有人说，伪蒙古军有一个少尉阔××、无线电报员陈杰，都是国民党军统系统的人，他们做情报，刘给他们掩护过秘密电台，也关系密切，有可能把刘拉到军统圈子里去。但据张子含等谈，刘和他们都没有任何组织关系，他面不阻人，这些人利用他帮忙是可能的，但他当时却是一个心眼向着傅作义。

在对日本人的关系上，那时驻绥的特务机关长是少将小仓达次，辅佐官是末松，情报主任是宫琦，民生会就是由宫琦直接指挥。宫琦手下有两个特务腿子，名为嘱托，一叫王葆琛，一叫胡云泉（字隐狱）。这两人都是马占山的部下，在黑河作战被俘，经日本特务机关留用，又把他俩派来绥远工作的。王葆琛被派到厚和市商会工作，胡云泉被派到民生会工作，从此胡就在刘长荣和宫琦双方之间联系一切。这时宫琦主要是叫民生会的调查股多供给有关抗日军队的情报，刘长荣为了应付宫琦，一方面用好吃好喝买哄胡云泉，一方面叫调查股的徒弟们到厚和市警察局抄写该局获得的情报，经过整理转报宫琦。此外还叫他的徒弟李维业把抗日军队的布置情况，制成图表报去，当时绥远特务机关对他们还不作过高的要求，胡云泉又从旁多添好话（帮内人有的说胡是八路军派去做地下工作的，尚待证实）。这就在表面上把宫琦应付过去了，而刘长荣则主要精力放在给傅作义做工作上。

但这时张占鳌却看出危险来了，他告王明远说：“咱们老头

子要两面吃，我看象他那样的脑筋简单，不会弄成，只有招祸，我怕将来要受他的牵连，不如走开。”于是他就把豫芳照相馆交给别人，带着家去了北京，但刘长荣和其他人还认为没什么。

不久，他们勾通傅作义的风声传到日本人的耳朵里，辅导官末松率宪兵、特务到凉城会馆民生会的办公处去检查，把房上的瓦都揭翻，砖下的地都挖掘，但没有检查出什么结果。接着末松又来个测验，请刘长荣、李春秀（伪厚和市长）、张兰田、贺和厚（前任市长）、王明远等人吃饭，在饭后就叫他们写信劝傅作义投降，他们哪敢不写，由张兰田执笔，他们盖章。信中大意是：这里从日本皇军到来后，各方面都好，皇军很敬爱你的为人，盼望你以地方人民的和平幸福为重，不要再继续抵抗，如果能速来归顺皇军，绥远的军政大权，可仍归你执掌。写完后末松看了同意，即令刘长荣派一民生会的人，骑着驴子将这封信转到西山嘴的中国军队，并得到收条。但后来也没有见到傅作义有什么表示。而刘长荣在旧城振大旅馆里闲坐，却接到了个匿名条说：“你们劝降投敌，是汉奸行为，早晚要大祸临头。”刘大为吃警，告王明远说：“了不得，有人要杀我们哩，这真是不写也要杀，写也要杀，没法子”。王明远说：“可设法去电报，向中国方面多多解释解释。”以后再没见出什么事。

从此，末松不再作纠缠，但不久日本人因傅作义部队攻包头，在包头城内有内应，使日本人吃了些亏，便对中国谍探和爱国人士的查缉，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了。到了四一年农历正月初八，在厚和查获了绥远抗日救国会，逮捕了共产党员贾恭、爱国人士段敬斋、郑廷相，中小学教员阎继璪、聂士俊等一百余人。王明远、张子舍都被株连在内，扣押在日本宪兵队内。到了四月间，刘长荣的次子吉悌被捕，又隔了七八天，刘本人亦被捕，都扣

送日本宪兵队。

刘被捕的原因，说法很不一致，据刘吉梯说，这是由于送招抚司令委任状的赵成勋、张庆武二人要向刘长荣借大量的钱做买卖，不愿意再回后套（因傅作义在他俩来时，曾说要在包头给刘两万元的活动费，但刘仅收到数千元，这两人想把大部分都借去），刘长荣拒绝了他俩的要求，因此就挟恨向日本人告发。赵成勋还在日本宪兵队当堂对质过。据王明远听到的原因是，由于蒙古军军部电台的破获。首先逮捕的是和刘来往亲密的阙少尉和电务员陈杰，並搜出了一张名单，都是化名，刘的化名叫刘清华，因此就把刘逮捕了。在电台破获后，日本人还叫陈杰照常和对方通讯，但通了两次就不通了。又据张子含说：“刘的被捕，与抗日救国会的暴露有关，因为刘和我都以民生会的会员名义和符号多掩护过抗日救国会的人，在抗日救国会暴露后，就有人把我和刘供出，但抗日救国会究竟因什么暴露，谁也没弄清楚。”

刘长荣被捕送到日本宪兵队时，张子含、王明远都还押在那里。他们亲眼看见把刘用汽车押来后，摔在看守所的木栅子外，刘看见他们在栅子内，还说：“你们的问题和我不同，你们是得罪了人。”他们因为他不知道宪兵队里的厉害，怕看守兵发现，还向他摇手示意，不让他说，其实他说了是想开脱他们。接着日本人都在隔墙院子里提讯他们很清楚地听见板子声、杠子声、铁链声和刘长荣的哀号声，真是闻之心酸。讯完后刘已不能行动，由人拖着送到看守所，因看守所人满，便把他扔在栅子以外。

当时日本宪兵队可以说是人间的活地狱，烧烙铁、灌煤油、狗咬、过电、悬吊、刺竹签、穿笔杆、踩图钉、栽坑、坐冰卧雪、雨水浇、钻水缸，等等非刑，无所不用。至于鞭打棍敲，饥渴困逼，那就更不用说了。但如能熬过三两堂，找不出证据就有可

能保释出去。如果是熬不住招了，那就放不出去了。张子含、王明远、刘吉悌，虽经过灌凉水、悬吊等刑，因没有招供，隔了些时就保释出去。刘长荣因受不住酷刑，便招认他是傅作义的招抚司令，日本人就把他定了案，送到张家口。据张子含说：“当送走的时候，是五月端午节的前几天，日本人用一辆大卡车装载他，他在车上向我们被押在牢房的人大喊着说：‘我是为国家牺牲的，我谁也没有出卖，我死后大家看着办吧！’说完后就被日本人押走了。”但另据费德明说：“刘是把我们招出来的，辛寿臣在包头就因此被杀害，杨丕滋、李毓芳因闻风较早逃走了，我也被扣捕过，但在被押解时，我在路上乘敌人不注意也逃走了。”也还有人这样说：“刘可能是没有拉扯别人。如果拉扯到蒙古军一、二、三、四师的师长，日本人非把蒙古军加一番大清洗不可，但日本人并没有这样做，可见刘并没有什么拉扯。”

刘到了张家口的日本军法处后，被判处死刑，听说执行时是用汽车拉到大境门外的河边上，把他砍了头，连尸首都扔在河里。和他在一起砍头的，还有绥远抗日救国会的董五三（包头商会会长）、王绪卿（青帮、包头市政府科长）等十余人。他死后张家口的帮里曾多方打捞他的尸首，但始终没有捞到，他的一生也就从而结束。

抗战胜利后，傅作义回到归绥，刘长荣的儿子吉孝、吉悌去见傅，傅说：“你父亲是为国家牺牲的，我当负责，以后当对他有所表示。”并给了他们点钱，但后来傅作义因忙于反共反人民的军事，就再不提他了。

十一、绥远民生会的改组和王明远

在刘长荣被捕后，厚和民生会的干事长由李同代理了七八个

月。这时，刘长荣已被押送张家口，王明远和张子含都从日本宪兵队被释放出来，经该会正式选举王明远为干事长。

在王未被选前，胡云泉曾向张家口总会的祖呈焜保荐王担任此职，祖不同意，想叫他的亲信胡宪章（通字辈、和祖同帮）担任，但魏健却同意王明远，经议定由厚和民生会选举，并派魏健监选，结果王明远得了全票。

王明远是河北省沧县齐家务村人，祖辈务农为业，在幼年时，除务农外还读过几年冬学，略识得几个字。十七岁到天津西站汇通公司充杂役，被老板看重，逐步提拔为粮厂管理员，经年跑外，一直升到绥远天亨粮栈经理。就在这个时候，拜了北京青帮大字辈蒋万春为师，并广收徒弟，逐渐地在青帮里树起自己的势力。后来因娶平康里妓院老鸨石二奶奶的养女林富仙（唱花衫的兼营妓业）为妻，为公司所不满，因而被辞退出栈。不久由绥远电灯公司经理武荃卿介绍，当了该公司的交际主任，借交际的机会，更进一步搞青帮活动和各种迷信活动，而且随带着对各种迷信道会门，如纯一善社、理门公所、万国道德会等。无不参加，势力逐日扩张，成为青帮中知名的活动人物。至此正式接任了刘长荣的干事长的职位，当了青帮的大首领。

王明远继任不久，伪蒙疆自治政府正式成立了，察绥的民生会也随着扩大改组。原有的张家口民生总会，改组为伪蒙疆自治部民生会中央本部，原有厚和分会改组为巴盟民生会地方本部，包头分会改组为伊盟民生会地方本部，宣化分会改组为宣化省民生会地方本部，并发表中央本部部长为祖呈焜，宣化地方本部部长为金小忠，伊盟本部部长为刘寿山，巴盟地方本部部长为王明远。

在厚和民生分会改组为巴盟地方本部时，首先将原有六个股

改组为两个科，一为弘报科，仍与过去的调查股任务相同，由胡宪章任科长，贾生福副之；一为总务科，掌管登记、朝奉、会计、传道等事项，由张子含任科长。其次在各地分设四个分会：①厚和分会，干事长由王明远兼；②平地泉分会，干事长仍为朱尚真；③丰镇分会，干事长为孟凤三（通字辈）；④托克托分会，干事长为白涤清（杭三帮无字辈）；⑤凉城分会，干事长为高树德（无字辈）。

十二、王明远和各方面的关系

王明远当了巴盟地方本部民生会的干事长后（以下王自称为“我”），民生会的势力、一天比一天扩大，较刘长荣在世时超过了好些倍。主要是我向各方面拉拢的好，特别是我和日本人拉拢的好。我常向手下人讲：“一个人在世上，要腰里多有几张牌，看谁需要哪一张，就给他哪一张，可不能只用一张牌。”这些话，很可以代表我在当时的想法和做法。

在日本人方面，我认为日本人的最高权力是操在日本的大特务和高级军官手里，只要能把这些人买哄好了，就什么事都好办。因此就尽力的巴结他们，投其所好，究竟他们好些什么呢？虽各有不同，却都是想来中国找甜头的。如那时的特务机关长是少将小仓达次，他最爱好字画和古玩，我便买当代的名人字画和好玩送给。又如掌握厚和市政府实权的顾问小岛育男，他最爱穿阔绰的服装，我便买一件上等的狐皮大氅送给他。又如在蒙古军最有权势的总教官纳须，他看中了一把战刀没钱买，我便很慷慨地拿出二百元钱借给了他。其他如日本驻绥军部队长石黑，特务机关的辅导官末松、情报主任宫琦、山本、关口，宪兵队队长梅川、特务主任河野，我都送过厚礼，使这些日本人眉开眼笑。同

时我还买通这些日本头子们的亲随人员，使他们常常在主子面前替我吹嘘。甚至于这些日本头子们常去的地方，我也注意到应怎样利用去作巴结。如在东顺城街宪兵队附近有一个日本人开的小料理馆（即饭馆），小仓达次和石黑部队长常好到那里小吃。这个小饭馆的主人，是一个年老的日本妇女，我便尽量买好这个妇女，在吃饭后多给小费，並也请小仓达次等到这里吃饭，这个妇女便对我很喜欢，在小仓达次等面前，给我说了不少好话。

其次是我知道日本人组织民生会，是为了防共、防抗日部队，想叫中国人服从他们。我便在日本人面前尽量赞扬“日本皇军的德政”，並顺着日本人骂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等于洪水猛兽”；骂国民党是只知道要税要捐，刮地皮，不知爱惜穷人，这就使得那些日本头子们听着声声入耳。日本人为了试探人的心理，常常用酒把人灌醉，之后问话作测验。有一次我和日本头子们在一起饮酒，我被灌得似醉非醉之时，便假装着醉了，一个日本头子问我：“中国军、八路军的好？日本皇军的好？”我便醉声醉气的答道：“日本皇军大大的好，中国军、八路军大大的王八旦。”这个日本头子听了后就哈哈的笑了。此外我为了颂扬小仓达次在绥远作特务的功绩，还送过金漆牌匾，上头写了些令人极其肉麻的话，使小仓达次更喜欢我。

再就是我在当时虽还不懂得日本人爱迷信，是想借此柔服中国的人心，但却看出来日本人重视迷信，因此我也就在这一点上迎合他们。本来我就搞纯一善社、万国道德会、理门公所、道教会等迷信会道门，于是我就更努力去搞，使日本头子们看到无论哪一个会道门我都是一个热心支持的领头人，特别是在纯一善社，我利用扶乩，假供神佛作号召，捐集了不少钱，连伪蒙疆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揅鲁普都亲到社里请乩问事，並捐助款项。因此纯一善社就

能够起房盖屋，施棺送药。每年冬季大开粥厂，有时领粥者达数百人之多，这就使日本头子们对我有异乎寻常的看法。有一次，小仓达次见了我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真是个好人，你是个慈善大家。”以后凡我对会道门的事有所要求他都尽可能地给以支持。

在对一般小特务汉奸上，我知道他们都是势利眼，欺软怕硬。在我已经取得日本大头子们的宠信和掌握了民生会的报告权力后，他们是怕我的。因此我也就利用这一点显示我的本领，做刘长荣所不敢做的事。一方面遇见他们胡闹就去干涉，以买好中国人的受害者。如驻在厚和市郊区孔家营子等处的小特务和朝鲜浪人，到市内向商号勒索钱财，逼迫妓女在饭馆里脱裤子等等，我就多干涉过，但我也怕他们怀恨报复，便给他们点好处，以示笼络。如在旧城人市街有个米面铺，这个铺子的老板朱耀离存有好些桶油，被日本宪兵特务讹诈，硬要没收。我出头干涉，不叫他们没收，他们就缩回去了。我又叫朱耀离送他们一些油，这样物主少受损失，特务们也得到一点油水，就两头都能讨好。此外，还有时为了扩张自己的力量，拉拢他们，收他们作徒弟。如伪蒙军宪兵队的曹教官到处吃酒打人骂人，勒索钱财，甚为凶恶。我就向特务机关报告，结果通知了他的总教官，把他严厉责罚。但因这个人对我有好处，又向他拉拢，把他收作徒弟。象以上这类的事，我做过很多。

在和青帮内部人们的关系上，由于我得到了日本人的宠信，能干涉一些小特务和汉奸狗腿子，为了树立我在青帮中的声势，便尽量利用这一点给青帮的人们撑腰。最突出的是当时伪萨县县长张某在旧城云华池澡堂丢钱的一件事。这个澡堂是帮内人无字辈韩全文开的，张从萨县来到那里洗澡，说丢了二百元钱，是茶房偷去的。韩向他解释，张竟把茶壶茶碗砸了，并把茶房打得死

去活来，送到警察署押起。韩向我诉说，我就向市政府顾问小岛育男鸣冤，结果小岛育男听信了我的话，便把茶房放出，把张大加申斥，后来张还因此几乎免了职。又如旧城海窟的居民王老毛，在城南茂林太买猪到城里卖，恰遇当地老财李麻子丢了猪，硬说王买的猪是偷的他的，並依仗特务势力，将王老毛送到警察署，苦打成招。经王的亲戚王庆年（青帮无字辈）托我向警察署苏署长解说，便把王放出来，不再要猪。其他类此之事还多。因此青帮人都认为我能办事，能给他们撑腰。只要我在帮内有什么建议，沒有不支持的。如向日本头子们送贵重礼物，大家就设法给我凑，用不着掏自己的腰包。这不但使我在青帮内树立了声势，並且影响到社会，使一些人认为青帮在日本人手里吃得开，有力量，从而愿意参加民生会。

在对待抗日部队和爱国人士上，我虽然为了个人利害，丧失民族气节向敌人屈膝献媚，但也想到日本人会不会长久？如果中国胜了自己又怎么办？这就使我对抗日部队和爱国人士尽可能地想法应付的过得去。如在给日本人做情报调查方面，我没有认真对抗日部队作调查，仍然是由贾生福、冯世祥等利用帮里人，向伪警察署和蒙古军内部，偷抄各地敌探的报告，只是比刘长荣在世时，抄的勤一些，多一些。抄回来、由弘报科改头换面，加以整理，不但和人家基本上雷同，而且报到特务机关时，也落在人家之后了。此外虽也利用各地的民生会员，要他们调查报告抗日部队的情况，也只是表面敷衍，並沒有真正派人深入调查过。这都是怕国军回来和我算帐。因此日久天长，日本人就向我说：“你们的报告都过了时了，没什么价值。”我说：“民生会没有经费，本领小，只能做到这样，慢慢地来。”日本人也没作研究，为什么不研究呢？主要是我对特务机关那些管情报的日本人，如

宫琦、山本、关口等，经常地送礼，请他们到饭馆子里大吃大喝，使他们对我有好感，就放过去了。

与此同时，为了应付未来，我也掩护过一些抗日救国人士和解放区的人民。如共产党员于明打进厚和日本特务机关，作地下工作，就以青帮关系和我联系，我曾给他出主意并掩护他工作，还给以经济协助，把宫琦对付过去。于后来回解放区任团长政委等职，现任呼盟建设局局长，还和我通信。又如在河北省解放区曲阳县六百户村有恶霸王某被村民斗争死掉，其子王彭振在厚和经商，和警察署有联系，他一面想报父仇，一面想邀功，便去信诱惑该村的人说：“我过去就反对我父亲的行为，你们做的对，这里花生棉花价钱很好，能赚钱，盼你们来卖，勿失机会。”结果竟被他诱来王汉忠、王老刁、王庆和、石小四、王志中等五人，王彭振即报告厚和市警察署将这五人扣捕。经严刑吊打，有的手指都被吊断，这五人承认是八路军的探子。日本特务主任关口要杀他们，他们的乡亲王庆臣（青帮无字辈）托我去说情，我就向关口说：“不如把他们给我作情报员去刺探八路军，比杀了的好。”关口很同意，就交给我，我叫他们都进了帮。并陆续地打发他们回家，只有王志中一人被关口要了去给他搞特务。这些回了家的人，都对我极为感谢，曾送给我好些汉白玉刻的纪念品。直到前年，还因我年老寄来四十元钱。后来日本人还有时把打得半死不活的中国俘虏交给我看管处理。如纳须就因借钱的关系相信我，两次交给卅几个（内有八路军十多个），伪厚和市警察局长山田也交给四十多个，我都送到纯一善社收养。养好后、趁着日本人不管，由他们各自走去。还有的安置在善社的粥厂、学校里当服务员。

再就是大青山的八路军，有时找青帮人要求供应鞋袜、毛

毡、文具等，我都叫徒弟去办。在那时沿山坝口子、史家营子、红山口等村的村长们，都是青帮，在城上办好后，就交这些村长掩护运送过去。但在办的时候，我也怕是日本人用的诡计，冒充试探，便一切都推在徒弟身上，我不露面。因此一遇到这种事，便向徒弟们说：“你们照着办就完了，不必提到我。”这样，自己从不出头。

在和道会门及其他关系方面，前边已说过。我把搞迷信会道门、办慈善，作为博取日本人的信任的资本。如对纯一善社粥厂的募集捐款，对在理公所的捧斋，对万国道德会、道教会的筹划基金，我借着青帮首领的力量，徒众多、门路宽、势力大，都给了有力的支持。道会门有句话：“无财不养道。”我这样做，就在财字上给道会门里的人解决了大问题，使那些吃道的道首们，皆大欢喜，因而也就对我特别恭敬。我只要到他们那里，都对我是鞠躬如也，殷勤备至，并且在社会上给我吹嘘，说我是怎样的好心，怎样的有办法，是绥远第一个“大善人”。影响所至，不但日本人信任我，就连绥远地方的名流郭象仪，对我办粥厂也表示过异乎寻常的钦佩。有一次他亲自向我说：“你一个外方人到这里来，居然能办这样大的事情，真是了不起。”他还送了我一把扇子，在上面写了一首赞扬的诗作为纪念。

我这位大“善人”，在这方面是表现的如此慈眉善目，而在另一方面却假借日本人的力量，伸出了魔掌，去攫取灭绝人性的钱财。由于我得到了日本特务机关头子山本的支持，当了厚和市罪恶滔天的俱乐部的监视人。这个角色是日本人的代理人，等于是俱乐部的太上皇。因此，我一到俱乐部，那里的人就把我看成如日本人来了一样，不仅是美酒吧肉，大吃大喝，而且是每期结帐都要给我送上两三千元的车马费。同时我还荐举了几个亲近的

徒弟如贾生福、李成瑞等到俱乐部当差，每月拿着百八十元的外快。这都是当时有些在台的高级汉奸们也想谋到而谋不到手的差事，我却谋到了。这个俱乐部设在厚和市南柴火市一个旧买卖家的空房子里。什么样的赌具都有，每天车马盈门，人声鼎沸，喝么呼六，纸醉金迷。最大输赢，有一场到万元以上的。因而倾家荡产、寻死上吊、出妻卖子的，不知有多少，可以说是一个最罪恶的陷人坑。我在受到了党的教育以后才想到，我那时拿的那些钱不知上边沾有多少人家的眼泪。这和我搞道会门的假慈善相对照，正如人们常说，是“老虎脖子下带念珠”。

总的说来，我是以屈膝献媚的手腕得宠于日本人，以慈善家的面貌取信于日本人，从而假借日本人的势力，树立个人和青帮的势力。复利用此势力，压服少数的小特务和汉奸浪人，以买取当时社会的虚誉；复利用此虚誉，扩大声势，以提高在日本人面前的地位。因而我也就在当时的汉奸群中成为重要的一员。如我父亲死后，在绥远旧城发丧，前往致祭的有日本人部队和特务机关的头子，有伪蒙疆巴盟政府和厚和市政府的文武官吏和宪警特务，有各行各业的老板和伙计们，有伶界、花界及其他各色人等，同时各庵观寺院的僧道尼姑都来诵经超度。特别是在起灵前开追悼会，特务机关长小仓达次亲临讲话，把我和我父亲都称颂一番。接着送灵，参加者连同仪仗队，从旧城北门外一直摆到小十字以南，足有一里之长。沿途各商号均在门前摆桌路祭，张家口民生总会，还专为召集当地会员开追悼会遥祭。这个排场之大，就连后来傅作义的军长袁庆荣在归绥殡母也有所不及。这也正说明我腰中牌多的效果。至于什么祖国兴亡，民族气节，那就不管它了。

十三、青帮分子在日本人统治时期 的各种表现

由于王明远在日本人方面取得宠信，做了些刘长荣所不敢做的事，使民生会的声势顿为扩大。当时特务、警察、宪兵以及汉奸、狗腿子等，一看见带黑白鱼的民生会徽章的，都要给个面子，不敢去惹。因此参加民生会的人也日益增多。有一次在凉城会馆开大会，馆内外挤的连站处都没有，使日本人看了为之惊异。同时青帮分子的思想行动，也随着人数增多而异常复杂，其在当时的表现，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种：

1、搞迷信的。这里有两种，一种是年岁老一点的青帮人，他们除参加青帮外，还参加迷信会道门，而且搞迷信比搞青帮还热心。如利中照相馆经理孔夏亭，大北旅社经理于化门，九龙湾成衣铺掌柜石辅卿等，都沉溺在万国道德会或纯一善社中。这些人虽不甘心背叛祖国，但却顾及身家性命，不愿招惹是非，所希望的是“安居乐业”，因此就借宗教迷信和鸦片自我陶醉，从而变为日本人的顺民。另一种本身就是职业迷信者。他们看见青帮有力量便参加青帮，目的是依靠它能多骗人的钱财。如旧城聚善堂在理公所当家于元瑞，吕祖庙老道王致城，姑子板在理公所当家田太和，为了弄钱，常常是请青帮首领和运用他的青帮徒弟，到处发动人捧斋或推销烟药。

2、藉青帮作护身符的。在当时日本人的淫威之下，特务横行，汉奸作恶，一般平民都感到身家难以自保，而民生会有时敢于报告和干涉，这就使有些人把参加民生会当作进入避难所。虽然一般地是但求自保，不多生事，但也有的给民生会通风报信，甚至自以为有了仗恃，欺压别人。

3、吃帮和榨财的。首先是在民生会作实际工作的那些人。如胡宪章、贾生福、冯世祥等人，就依靠民生会为职业，向各方面应付拉拢，从中找取好处。他们在俱乐部吃“兼差”，就是一例。更严重的是利用青帮的关系，作无理榨取。如张子含在纯一善社办粥厂，平素表现的非常积极，好象是同情穷人。但另一方面，他却依靠青帮力量搞“人力车夫组合”，剥削可怜的车夫血汗。特别苛刻的是，他垄断了修理车辆的零件，连一个螺丝钉都不许车夫家里存藏。因此他发了不少财。又如凉城县民生分会会长高树德，利用民生会的关系，大跑烟土买卖，获利巨万，除起房盖屋外，还在本县田家镇买花园一所。此外还有李国华的徒弟，假借青帮势力，把民生会推销的历书和月份牌，拿到乡里强迫乡民出高价购买。

当汉奸特务苦害人民的，在民生会也有。如在归绥旧城西菜园有个刘瑞兰（无字辈），就和日本特务勾结，假借着民生会调查员的名义，在当地打人骂人，勒索了不少钱财。有时还冒充蒙古军军官，招摇撞骗。胜利后，被国民党又吸收为特务，更是无恶不作，解放后被镇压。还有沙成山（兴武六帮学字辈），何涛（外号红挠子、学字辈），都在日本宪兵队当特务，替日本人搜查抗日爱国人士，抓人打人，象日本人一样坏。王明远还亲眼看见民生会会员王志中（悟字辈），在归绥车站上捆了—个人，王问他捆的是什么人，他说是八路军的嫌疑犯。王说民生会没有捆人的权利，应当放开，他说这是特务机关的关口叫他捆的，不能放。王才知道他已经是直接地当了特务机关的小特务，不便再说什么。再就是在乡村里，有些民生会的会员，认为农民老实容易欺负，假借给日本人调查事件，在乡里诈财、耍大烟、搜劫行人，什么坏事都干。如归绥东南乡有个绰号大二红鞋的，干的

比一般都凶恶。连帮里的人有时都不认，因此人们又叫他是阎王。在外县里，也有些民生会员干类似的坏事。能记起来的，有后山乌兰花的于贵堂（无字辈），勾结日本特务，欺压和吃喝当地人民。

5、带土匪队伍，祸害人民的。如李维业、苟子臣，都当过傅作义部的连长，都是刘长荣的徒弟。日寇侵入绥远，都没有离开，在大青山以青帮关系扩充游击队。苟子臣并叫官兵上下都参加青帮。这两个人，李维业投降了日本，在白塔一带驻防，苟子臣在归绥城北哈拉沁一带山里游串，都是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特别是李维业：抢不来女人晚上就不睡觉。苟子臣不许老百姓打狗骂狗，谁要打骂便抢毙，说是犯了他姓苟的“讳”。

6、耍流氓，吃腥赌、坑人骗人的。如归绥市张全（学字辈）、王树之（无字辈）都是老白花，每年春季庙会，专以假骰子、假宝，在农村坑骗农民。其他耍流氓、欺辱妇女，骗人财物的也有。

坏事还有，不能一一尽举。但也有在当时掩护过抗战人员和爱国人士的。如大青山姚喆司令属下的干部王成、王虎臣、刘鸿宾，和现任呼市民政局局长李云玉，以及潜在万国道德会当秘书的郑功浦（人们叫他是郑大胡子），在做地下工作时，贾生福、张子舍等曾对他掩护和关照过。

谈到帮规简直破坏的不成样子，不要说拔香头、扒灰倒坨（互相倾轧）破坏了旧规矩，就是民生会新立的规矩也视若空文。如干事胡清源为了吃徒弟的香堂费，就在民生会外私摆香堂，只要是有人给钱，他就敢收。特别是在邪淫方面，胡清源还纵恿他的女儿做暗妓生涯，在家里和一般日本翻译、特务、伪蒙军军官乱搞一气。甚至于有的人欺师灭祖，欺到王明远头上。如王续取

的女人林富仙，是一个河北梆子班唱花衫的，他的徒弟张宝龄（归绥面粉公司技工）勾引她，搞起不正当男女关系，后来他的侄儿王学曾（也是帮里人）在他家中养病，也和这个女人乱搞。按十大帮规中的“不准欺师灭祖”，“不准奸盗邪淫”两条，照老规矩应当开刑事香堂，把这两个人绑在铁锚上烧死；轻处分也要用家法责打。但王明远却管不了，只能骂他的女人“连个老母狗也不如”罢了。

总之，青帮分子在这时期的表现是极为复杂的。已经把青帮变成为一个汉奸、特务、恶霸、迷信、流氓等大杂会的反动团体。特别是在日本人的指使下，组织了民生会，赤裸裸地当了敌人镇抚的工具，背叛了祖国和民族，连自己青帮的祖先牌都卖了。要与当年祖师爷反清复明的民族精神对照，真不知何以自解。

十四、抗战胜利后的绥远青帮

一九四五年，傅作义争先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进了归绥。民生会随着日本的投降而解散，王明远（以下自称“我”）也被捕送到归绥法院监狱。不久归绥被解放军包围，情况甚为紧张。有一天，伪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把我从监狱提出说：“现在把你保出去，你要好好工作，争取免罪，要不然就罪上加罪。”说完后就把我交给国民党党政总队的乔宝琳，乔领着我见张庆恩（大特务头子）。见了后张说：“你来了好，你有人就有力量，好好地帮助咱们去对付共产党。”随着就叫我当该队的第二中队第五小队队长。不几天发给我一个白绸子委任状，委我为平绥线的特派员，下边盖队长张庆恩副队长柴玉峰的名戳。另外还给我一个上校阶级的黄符号，任务是叫我召集和联络平绥线的民生会会员，准备组织起来。他们还把贾生福、沙成山，刘瑞兰都叫了去，说

要按他们的能力分别委派职务。我住了两个星期。看出这个队的一切行动与日本特务机关差不多，是侦察和扣捕共产党的。我就想他们是要利用我们帮里人干这个活计，如果不捉共产党，做不出成绩，就更问我的罪。但捉又不是容易的，而且要去捉，等共产党打进来更不得了。因此为了要“活”，就决心逃出这个是非窝。一天晚上，托故外出，找着一个帮里人杨子恒（学字辈）带路，一直逃到后山武川东南的羊圈村，却不料被大青山自卫军鄂友三的部队捉住了，连夜解回归绥。于存灏见了我说：“把你保出你还跑，谁能原谅，也不能原谅你。”结果把我判了刑。判词大意是“王明远通谋敌国，反抗本国，经密保出所，又乘隙逃走，本应判处极刑，姑念他过去创办平民小学校和慈善事业，减刑为无期徒刑。”于是又把我送到监狱。这时社会上都知道青帮过去组织民生会为日本所利用，是汉奸特务的组织，又看到我进了监狱，便都对青帮加以鄙视，帮里人也不愿多谈此事，甚至于有很多人登报声明退帮。但国民党特务并没有轻视这个组织，在傅作义侵占张家口后，张庆恩仍想按过去民生会在张家口设总会、在各地设分会的组织系统去利用它。当卢健飞回家里殡父路过张家口见傅作义时，张庆恩还找他问谁在当时是青帮最有力之人。卢以刘建勋（当时是察哈尔公路处处长并兼绥远公路处长）在帮内很孚众望，便说是刘。在卢回绥远后，不久就接到刘的信，说他要到张家口把青帮人组织为西北协会，于张家口设总会，归绥包头集宁等地设分会，请卢任归绥分会的负责人。这时卢已专心致力宗教迷信，终日搬经弄典，向佛寺道院会所宣讲，对青帮已不发生兴趣，不再去搞它。同时，过去的青帮首领们也都因搞民生会伤了脑筋，不愿意再搞，因此再没有人把他组织起来，而它的影响也就一天天消失下去。

但其中也有的人又当了国民党特务。如刘瑞兰、沙成山，就是先参加党政总队，后到了调统室的看守所。这两个在当时打人抓人，都极为蛮横，这些人在解放后都没逃脱了人民的裁判，刘沙二人都被镇压了。帮内一般的首领和徒弟们，如没有特殊罪恶，则不咎既往，能悔过退帮就算完了。

就象我王明远有这样严重罪恶的人，都能得到党和人民的宽大。解放前，国民党法院把我判了无期徒刑，但到了解放后，党根据我的实际行动，分别功过，却减为七年有期徒刑，并扣去在监中已坐过的年月，只坐了三年零四个月就出来了。出监后，还安置我在乌盟建筑公程公司工作，为人民服务。这真是我梦想不到的事，怎能不感到党恩重如山？

写成这个材料，除我们三人所知者外，还访问当时帮里人于化门、张子含、崔朝海、费德明、贾生福、韩伯琴、王春芳、赵长海、石辅卿等诸位先生，承他们的热情帮助，在此致谢。

绥远省国民党 政权军政特工组织

张问之

早在一九三八年傅作义先生仍动摇于蒋阎之间的時候，国民党CC派特务即秘密潜入绥远，在陕坝中光号内设一秘密电台，向国民党中央报告傅军之政治动向。此台于一九三九年冬始被傅军之监视台发现。当时傅先生不仅没有阻止它活动，反而利用它作为与蒋介石联系之媒介。于是，一九四〇年调统派张庆恩来绥远，借整饬国民党党部之名，发展特务组织，成立调统室。当时，调统采取积极扶持傅军的方针，而广泛插足绥远省军政部门。其目的是把绥远作为训练输送特务干部，开展华北、东北地区特务工作的桥梁，同时又监督傅先生的活动。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原绥远地区国民党政权军政之特工组织繁多，多数被调统控制，它们随形势之发展而不断转化、演变，但特务活动的目标却始终如一。

一、战工会。该会一九三九年成立于陕坝，是傅军之谍报机关，主持人李英夫。主要任务是做日寇占领区和八路军之军事情报工作。初期组织颇为庞大，设绥远、敌区、东北、边疆等组，但实际并无此力量。一九四一年春，在陕坝绥远省干训团开办战工训练班，学员四十余人。课程有日语、政治常识、谍报常识、爆破术、通讯方法等。主持人是赵励师。斯时派出单位有两

个办事处，即河西办事处，东胜县长樊库兼任处长，负责绥西、绥南、托县、萨县一带之特务工作；高塔儿梁办事处，武峻峰任处长，负责绥东、绥北一带特务工作。

一九四二年战工会改名为战工处。赵励师为处长，下设总务、军事、政治等课。一九四四年夏，在党政团一元化的口号下，由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书记长、调统室主任张庆恩主持进行改组，扩大组织机构，傅作义先生自任处长，张庆恩任秘书，下设五个组：李大超任东北组组长，苏治安任平津组组长，张钦任绥东组组长，邱明星任绥北组组长，赵励师任绥南组组长。以后因经费开支庞大，且不能按计划开展工作，同时又由于张庆恩在内以“战地工作讨论”为名，拉拢亲信，自成系统，傅作义先生乃改变初衷，将战工处之人员，多吸收为军事谍报，故战工处即变成有名无实之组织，迨至日寇投降，此组织即行取消。

二、第十二战区长官部党政纵队。一九四五年三月，由重庆伪中央命令成立。由调统出面，从各地选调可靠国民党党员施行特务训练，而后派回原地开展特务活动。其主要使命是侦探破坏我党的地工组织，在统治区及机关开展防谍工作，其组织庞大，队员有五百余人。总队长张庆恩，副总队长柴玉峰，秘书王兰田。下设四个科，一个训练队，三个大队，一个看守所。总务科长樊毓泗，对敌科长杨格非，对共科长邵厚仁，行动科长李玉光，训练队长陆超人。第一大队长董叔明，日降前活动于大青山及归、包地区，日降后在张家口。第二大队长杨格非，日降前活动于河套一带，日降后在包头地区。第三大队长祁觉民，日降前活动于榆林、府谷一带，日降后在归绥地区。三个大队下属之分队，先后曾有绥远、大青山、察北、张家口、大同、北平、榆林、东胜等分队。

第十二战区长官部党政纵队，于一九四六年底撤销，其大部分人员转入随军工作队。

三、第十二战区长官部随军工作队。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绥包战役后成立，任务为配合傅军军事行动，配合调统开展其所谓“收复区”之“建立政权、整编保甲、清乡、肃奸、组训、情报”等工作。随军工作队由绥远省级党（王玉宾）、政（于纯斋）、军（李世杰）、团（赵仲容）、特（张庆恩）、警（温永栋）及省人事室主任王明德等，联合组织指导小组，统一领导各队之工作。指导小组主任张庆恩。

随军工作队共有十二个队，每队配备队员20—30人。队员从国民党党部、绥干团、十二战区谍报队、党政纵队、战青团等部门调来。队长中校衔，组长少校，组员少尉。全队配属军队各师或团受各师、团长及政治主任指导与监督。如第一队队长鲁凤昌以下，配属于伪蒙军改编之第十路军门树槐师；第二队队长初香山以下，配属于骑兵第四师，第五队队长王怡以下，配属于郇青云部。据十二战区司令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日颁发之《随军工作手册》规定该队的工作任务是：进入“收复区”，“建立政权，宣训民政；编组保甲，登记户口，配合军事，推行政令”；“组织锄奸队，侦缉扫清潜伏分子”，“建立阴暗重层情报通信网”，选派“干练分子”，“坚决勇敢打入敌阵，潜入敌人心腹”，“一面供给情报，一面对敌组织起腐蚀、分化、瓦解作用”，组织自卫团，以达“掌握民众，肃清奸匪，巩固战果，确立组织”之目的。

随军工作队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傅军整编时裁除，部分人员转入政权工作中。

四、战时青年训导团。从一九四一年二月，绥远调统室在绥西破坏我党地方组织，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员与革命青年，于是在

陕坝西郊长胡李圪旦设立拘留所羁押革命者与左倾青年，此为战青团之前身。一九四一年四月，成立第八战区副长官部战时青年训练团，人事选派与业务计划，完全由绥远调统室包办。一九四二年五月改称“第八战区战时青年训导团”，一九四四年改称“第十二战区长官部战时青年训导团”。团址在陕坝东北郊之张威世圪旦，日寇投降后，迁至归绥市旧城五塔寺召内。一九四七年三月，并于绥远调统室之统建队。

战青团为绥远国民党政权对“政治犯”胁诱，“感化反省”，培养特务之集中营。由绥远党政军团派员组成统建工作指导小组为领导核心。战青团主任为张庆恩。下设总干事一职，总理全团实际工作。总干事先后为特务张忠一、陈国兴、樊诛亭、辛崇业、王兰田等。被逮捕送入战青团者，抗战时期是共产党人及左倾进步青年，计约350余人。内战时期是战斗中被俘的我军干部及被我军俘获释放之敌军官佐，计约350余人，合计约700余人。其中很多是特务们为了邀功，滥施捕捉的无辜群众。

战青团对受害者轮番采用威逼利诱、严刑拷打等法西斯手段，迫使软弱者叛变自首，为其“反间”，打入我内部进行内线特务活动。对一般人员采取两种办法，迫使他们做特务工作。其一是，使“政治犯”出团后，亲友不敢与之交往，各机关、学校、商店在未得允许前，不准录用这些人。其二是，特务认为“犯人”反省满意时，可找三家以上殷实铺保，在接受任务后，始得到各机关、学校和商店服务。规定每月须将所在地附近的政治情况，向特务机关详为呈报。倘若彼处发现有共产党活动，而被释者尚未事先报告，则重新收押战青团反省。

五、第十二战区长官部民主保卫总队。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在归绥市成立。时值集宁会战前夕，是为配合会战建立之“短小精

干”的军事性武装特务组织，直属长官司令部指挥，其任务是配合部队对解放区实行“突击渗透”活动。以调统特务张庆恩为首组织民工指导处，指导与布置经常工作。下设三个总队：第一总队长杨星甫，活动于绥南、晋西北地区；第二总队在绥东，总队长为丰镇县长兼五县保安司令魏纯美；第三总队在察北，分布于商都、尚义及绥蒙边境，总队长为赵大义。每个总队下辖三个支队。第一总队之支队长是郭理修、乔汗奎、徐子荣，共约60余众，其成分大多系战青团和十二战区军官训练队学员。

民主保卫总队的具体任务是：（一）带电台配合军队，渗入解放区边沿地带，“以游击对游击”，进行武装袭扰和侦察情报活动；（二）领导、组织所谓难民武装还乡队、还乡团、自卫队，摧毁我基层政权，捕捉我区、村干部；（三）进行暗杀破坏活动；（四）对我民兵和地方武装进行策反瓦解。

据绥远省特种汇报处一九四六年编印的资料，民主保卫总队共组织起还乡团、队及自卫队6290人，策反我民兵及民兵干部613人，破坏我区公所一，乡公所二，刺杀我官兵六人，收枪271支，收割电线四千余斤。

六、侦察总队。原为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宪兵队。一九四一年因重庆中央命令取消，始改名第八战区副长官部侦察总队，后经呈报备案，至四二年始给了一个特务营的名义，经费由国民党中央政府拨给，但对内仍沿称侦察总队。

侦察总队前任总队长为王金铭，继任为沈金声，下辖八个大队，每大队150至200人不等，先后曾分驻陕坝、五原、包头、归绥等地。其干部三分之一为战青团留用学员或傅先生之卫士出身者。

侦察总队的任务是：（一）监督指挥警察，清查户口，管理

交通，在归包二地街衢要地均设检查站；（二）管理保甲；（三）派单线外勤人员进行情报活动；（四）监视特务工作，如在随军工作队中，派有军风纪班进行监视。

七、第十二战区长官部突击总队。一九四五年十月，我军围攻归绥、包头。张庆恩为应付战争局势，于归绥旧城小西街66号举办特务训练班，为时一月，吸收青年七、八十名。十一月，我军逼近归绥城郊，张以训练班学员为基干，组成突击总队，分派到城郊进行武装情报活动，同年十二月撤销。突击总队总队长张庆恩，副总队长柴玉峰，秘书王明远（日特民生会头目），总务科长张景江，情报科长杨格非。下设四个分队，第一分队长王模，在南郊；第二分队长鲁凤昌，在北郊；第三分队长李友冀，在东郊；第四分队长乔宝琳，在西郊。

八、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副官处纪律课。于一九四六年成立，地址在归绥巧尔气召，课长程又新。在归绥期间下设审讯、行动、警卫、经理四部，专司侦察、逮捕共产党及进步人士。被逮捕者审讯结案后，转交军法处或特别刑庭判处。同年十一月初，随傅军进驻张家口，改称张垣绥靖公署副官处纪律课，住张家口怡安街平康里七号，又迁至堡子里三皇街九号。

九、第十二战区谍报队。于一九四五年受重庆军政部命令成立，队长杨生华。隶属第十二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受参谋处情报科长王宝林直接领导。谍报队共有二十个组，每组正副组长各一，组员十人。谍报训练班于一九四五年六月一日，在陕坝城郊张威世圪旦开学，训练科目有秘密通讯、兵要地誌、简要测绘、爆破术、化装术、有线电和无线电通讯等。训练班因日寇投降而提前卒業，即匆匆编组派出工作。派出时，三、五人到十人一组不等，每两三组设一联络站，远者带电台，近者用报话机。派出

组以地名为番号，计有热河、察哈尔一组、察哈尔二组、大同、丰镇、察南、察东、察北、绥南、兴和等组，均直接针对解放区。

十、绥远特种会议秘书处。于一九四〇年成立，当时称特种汇报处。一九四六年三月，调统头子张庆恩赴重庆，五月返回，重新调整机构，改称绥远特种会议秘书处。由绥远省党政军警和法院首脑组成领导机构，傅先生任名义主任，张庆恩任副主任，实际完全由他控制。专区、县均设相同组织，亦由当地首脑组成领导机关。省特种会议秘书处下设六个科室：秘书室王黎生，情报科长夏江，反奸科长陆超人，民运科长鲁凤昌，军运科长杨格非，组运科长徐鹏。另设潜伏人员训练班，特种人员训练班。主任均是张庆恩。

据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工作报告，其工作任务是：（一）筹划建立、健全“收复区”各县之汇报会议组织；（二）策划成立民主保卫总队，统一斗争组织；（三）开设特种技术训练班及潜伏人员训练班。前者多配属于民主保卫总队，从事所谓“武装政治斗争”，后者则派赴绥东、晋西北一带潜伏活动。

日寇及伪蒙疆政府之 特务、警宪机关

张问之

(一)

一九三三年日特笹目通过蒙奸韩风林和德王勾结，以善邻协会名义，在锡盟西苏尼特旗设立特务机关。首任特务机关长为实甫大尉。至德王百灵庙“蒙政会”时期，日寇在张北、百灵庙设特务机关，曾有羽山少佐组织绥境蒙旗调查队入乌盟中公旗一带活动。三六年，羽山在归绥设羽山公馆，在包头设立果木出張所，在集宁以小野有雄为首设“美国公司”。此三处均是日寇入侵绥远前公开的特务机关。

(二)

日寇侵占察绥后，在张家口驻蒙兵团参谋部设情报部。其在绥远的下属特务机关有：厚和特务机关支部本部，包头特务机关支部本部，百灵庙特务机关支部本部。其中，百灵庙特务机关支部本部，又分设巴音化庙、巴音吉日、抗盖乌苏、叱胡民庙、翁根台庙五个分驻所。

日寇侵占归绥后，在原归绥羽山少佐公馆的基础上，先后成立的特务、警宪机关是：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石黑部队、厚和日

本领事馆、蒙古军宪兵队、蒙古军参谋处情报科、巴彦塔拉盟公署治安处(厅)、厚和车站警务段、厚和市警察局、善邻协会厚和支会。同时，在这些特务、警宪机关的直接指挥下，先后利用与组建各种外围组织。计有回教联合会本部和支部、民生会、乌兰花采卖办事处、西北贸易同商会、喇嘛研究所、维吾尔旗同乡会、农务会、西北事情研究所、托县招抚处、喇嘛湾招抚所十个组织。

(三)

厚和日本陆军特务机关，直接受日寇驻蒙军情报部领导，为归绥的最高特务机关，专门搜集内蒙和苏蒙之军事政治情报，下设情报、博物二部。情报部下设汉族事务处和蒙族事务处。前者除直接搜集情报外，还派遣特务控制外围组织；后者，主要任务为进行中蒙、中苏边境的派遣活动，直接控制喇嘛研究所。其活动范围和方法，汉族事务部的单线特务们活动在市内及郊区，了解我党地下组织及国民党之情报人员。其次，通过外围组织，分别在粮商中、乡村农民中、蒙族召庙中、回族驼户中发展培植奸细，并面向甘肃、宁夏、新疆等地，于行商中进行特务活动。

石黑部队情报室。日寇石黑部队原为关东军独立守备队。日寇侵占华北后，改为北支那派遣军步兵第十三联队二十六师，军号为5316部队。此部队一九四一年进驻归绥，为伪厚和浩特地区警备司令部，一九四三年迁驻南洋群岛。该部队下属三个大队，九百余人。一大队驻归绥麻花板村，二大队驻武川县，三大队驻托县。其中队和小队分别驻和林、托县、清河、凉城、兴和、武川、土默特等旗县。石黑部队之情报室设有华籍特务编成的侦察特务工作队，专门收集山间我军情报。此情报室直接领导第一、第二“防共师”的情报机构，皇协武装的便衣队。皇协武装的便

衣队队长是胡定良。胡原为我军连长，投敌后甘当日寇之鹰犬。

日寇厚和宪兵分队受张家口蒙疆日本宪兵总队领导，内设特高系。在归绥车站、和林、清河、凉城、武川、察素旗、毕克旗设分队所，主要任务是搜集我党我军和国民党的军政情报。厚和日本宪兵分队，还在归绥城内先后建立隐蔽据点十三处。

伪蒙古军宪兵队于一九三七年日占归绥后成立。一中队驻包头，二中队住归绥。内设特高系，受石黑部队情报室指挥。主要在集宁、五原、陕坝、新疆、蒙古搜集军事政治情报。

伪厚和蒙特警察局由伪巴彦塔拉盟公署保安处（厅）领导，在旧城、新城和车站设警察署。其高等科专司情报活动。一九四一年改组后增设白塔、坝口子、陶卜齐、茂林太、三两镇、察素齐警察署。一九四三年改组后加强武装袭击力量，增设直属特务队、便衣游击队。主要活动是“讨伐”我军，搜集军情及搜捕我地下工作人员。

内蒙古东部地区一贯道的传人、 组织、活动及取缔情况

赵连山

内蒙古东部地区（包括当时的察哈尔盟），各种反动封建会道门组织繁多，活动猖獗。其中又以一贯道组织最为庞大，活动更为嚣张。本文根据呼伦贝尔盟、兴安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和察哈尔盟在取缔各种反动封建会道门工作中所揭发出的有关材料，就一贯道等主要会道门的传人、组织、活动及取缔情况，作一简要叙述。

根据有关材料介绍，一贯道，原名“达摩”，起源于山东省济南市。传至十七代祖师路中一时，以“万道归一”、“三教合一”而定名为一贯道。路诡称“弥勒佛”下凡，自命所谓“白阳初祖”传道十余年，信徒不多。一九二五年路中一死，路之妹又接续传道，自称“南海古佛”下凡。一九三〇年路妹亦死，遂即传给路的徒弟，流氓道士张天然（又名张光璧）、郝宝山、孙素贞等继承。因张、郝争权，郝失败离开济南去山西传道，张独掌道权，自称十八代祖师“济公活佛”下凡，自尊为“号长祖师”。此时，张见孙素贞已拥有一部分信徒，为了扩展势力，遂与孙姘度，纳孙为妾，称孙为“月慧菩萨”下凡，张、孙合伙，广泛传道。一九三〇年开始在济南设立佛堂，先后成立金钢、敦仁、礼化、天一四大坛。张为中枢坛。至此，一贯道已初具规模，继

由胶济路传至青岛。一九三三年又传至京、津一带，后逐渐传到东北、华北、西北等许多地方。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张天然与汉奸汪精卫勾结，充当了汪精卫政府的外交顾问。济南敦仁坛道首郝书暄充任伪山东省教育厅长。同时，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和大汉奸周佛海等，为了效忠日寇，巩固傀儡政府，利用一贯道网罗落后群众，也亲自参加了一贯道。褚民谊为点传师，周佛海为坛主，他们勾结在一起，向道徒宣传日寇的“王道乐土”、“东亚共荣”等，以图消蚀人民的抗日意志，甚得日寇的赏识。这时，一贯道的上层头目，多数都与日特勾结往来，所以，一贯道得以空前发展，公开活动。

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在广大人民的压力下，曾被迫宣布取缔反动会道门，并将一贯道头目张天然扣捕七天，查封了许多佛坛。但不久，即又相互勾结，达成密约，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公开宣布承认一贯道为合法组织。声称“该道并不通谋敌国，所行皆为善举”。并经孙科、蒋经国授意改组为“中华道德慈善会”。至此，一贯道即由日寇的怀抱又投靠于国民党的膝下，取得合法地位，受到政治保护，更加明目张胆地大肆扩展传道活动。汉奸、特务、恶霸、地主、官吏、流氓等都纷纷钻入一贯道，与蒋合流，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一贯道的指挥中心也由山东济南迁至四川成都，直接受美蒋特务的操纵利用，从事检举革命进步分子，刺探军情，搜集情报，在解放区煽动组织暴乱，搞各种破坏活动。一九四七年四月，大道首张天然病死在成都，其内部成员争权夺利，各怀野心，张的大老婆刘氏（称刘师母）与其子张孝騫在杭州成一派，名为“正义派”，亦称“东派”、“大师母派”、“杭州派”、“人情派”等。张妾孙素贞（称孙师母）以成都为中心，另成一派，亦称“西派”、“二师母派”、“四川派”、

正式立名“金钱派”，与“正义派”相抗衡。两派对垒，互相倾轧。但他们在对付共产党、破坏人民革命的反动本质上则是一脉相承，完全一致。

一贯道内部的组织机构，其师尊至道徒共分九级。并规定了各级的权限，阴谋以道代政，篡夺政权。

九级分为：师尊、师母、道长、前人、点传师、坛主、副坛主、三才、道徒。

一、一贯道的传入

东部各盟一贯道的传入时间不一，道线复杂。主要线路来自山东、北京、天津、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白城等地。有的在区内各盟、旗县之间自相传入，错综复杂，很难一语中的，只能就几个主要道线作一介绍。

察哈尔盟一贯道的传入时间是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五日，由山东点传师苏振达来多伦，与当地万国道德会理事长周庆魁、张心一合谋建立了一贯道组织。从此，逐渐发展、扩大到化德、宝昌等县。昭乌达盟一贯道分两条线路传入，一条是由沈阳经喀左旗传入宁城一带，另一条线路是由多伦经克旗传入林西、林东、赤峰一带。此线是一九四三年由多伦一贯道点传师李华、阎正伦将一贯道传入克什克腾旗经棚镇，以后又发展到林西、巴林左旗、巴林右旗。在昭盟南部宁城县一带的红枪会组织，远在伪满康德元年以地主李宪维、李宪良、李宪一、谢玉荣等为首，请法师杨海山、王国兴教练青年学红枪会。后日本为了控制此会，派日人仁科请老师公开号召练法，从此日本人直接控制了红枪会，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呼伦贝尔盟一贯道的传入是在一九三九年由

军统特务王喜山在天津总坛受训，并领命为点传师后，首先来到呼盟博克图开荒普渡，建立了一贯道组织。一九四八年冬，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一贯道前人军统特务李耀宗，中统特务盛考斌的亲自指挥下，派军统特务分子吴子久、陈淑贤（女）为点传师，沿滨州铁路线，在呼盟扎兰屯、海拉尔、扎赉诺尔、满洲里以及莫力达瓦旗、阿荣旗等地发展、组织一贯道，使一贯道组织很快传入呼盟广大城镇乡村。

二、一贯道的组织

东部地区各种反动封建会道门种类不一，名目繁多。仅根据在取缔中所揭露和登记的反动会道门多达七十余种。主要会道门有：一贯道、未来道、一心会、混元门、红枪会、青华会、孟门道、五公道、中庸道、九宫门、老君门、未来门、天元坛、天理坛、善来坛等组织。其中又以一贯道、未来道、一心会、混元门等组织散布最广，以一贯道组织最为庞大。一贯道所惯用的发展组织的手法，即所谓“开荒渡人”，打着“救世渡人”、“灭灾免难”、“死后升天”等封建迷信口号为旗帜，欺骗蒙蔽群众，到处发展组织，扩大力量。他们大摆香坛，建立佛堂，制造乱语，以治病、拜佛为名，用结仙丹和神佛有缘等手法，招收道徒，吸收入道。

根据五个盟的统计，共发展道徒四万四千九百五十三人，有道首八百六十二人。察哈尔盟多伦、化德、宝昌三个县一贯道设有总坛八座，分坛二百二十一所。即：宝昌县总坛四座、分坛八十四所，化德县总坛三座，分坛七十一所，多伦县总坛一座，分坛六十六所。有点传师一百六十七人，坛主三百六十三人，道徒一万

一千八百三十六人。一贯道在昭盟克什克腾旗、巴林左旗、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及林西县共设有佛坛四十一座，有点传师十二人，坛主七十八人，发展道徒二千一百七十五人。仅克旗经棚镇一地被骗入道者，就有一千五百余人。

三、一贯道的活动

东部地区一贯道的破坏活动是很严重的，危害也是大的。他们的反革命反人民的阴谋破坏与欺骗群众等反动活动，其手段毒辣，花招繁多。

1、利用群众落后思想，进行封建迷信宣传，大搞封建迷信活动。一贯道利用天、地、人三才扶乩，制造：“今明年有大难，人死大半，九女一男，入道者可免”。又说：“四九年十月，天混地暗，日月无光，彗星擦地而过，只有入道才能免灾免难”。以此恐吓群众，蒙骗群众入道。他们还利用群众缺医少药的困难，以“救灾救病传符免灾”为名，制造所谓“圣水”、“圣药”，以此坑害群众。哲盟开鲁县大同佛教会头子牛德春用一些假药把人治死后还说：“人死是该死，寿命是前生造定的，他的魂要上西天极乐园。”呼盟博克图西沟道徒王正礼之妻，因病常去一贯道佛堂“讨药”，因吃了佛堂的香灰而死。

2、愚弄群众，骗取钱财。一贯道愚骗群众入道时，要有“五大牺牲精神，要牺牲钱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交费越多，功越大，福越多，寿越长”。借此骗取入道者要交纳求道费、功德费、月助费、开荒费、超拔费、坛主费、献心费、供果费、印书费等。化德县点传师李树森借传道之名，骗取入道费小麦六石

五斗七升。点传师傅忠孝发展道徒二百八十一人，骗取入道费小麦十八石七斗。昭盟克旗经棚镇道徒王玉入道时为表示忠诚，交入道费六百万元（旧币）。扎兰屯一贯道点传师王壮飞利用道徒交纳各种费用自己开小铺做买卖，把道徒送的香摆在自己柜台上出售。

3、诱奸妇女，伤害人命。兴安盟突泉县一贯道点传师李敬臣，当时年已六十四岁，借传道之名，骗奸妇女。他以治病为名，让一个年仅十九岁的女信徒住在他家学法，烧香磕头，而将其奸污。怀孕后，由于女孩无脸回家，他又乘人之危，将女孩买下为妾，并对她说：“这回你算能上天堂了。”满州里市一贯道点传师苏玉琢，由于经常在外开荒，家中事不管，其妻与其口角，由于苏玉琢在“牺牲一切为道办事”的思想支配下，用锤子将老婆打死。道徒李树武因政府颁布取缔反动封建会道门布告，他慑于法律既不敢不登记，又怕泄露一贯道的天机受到惩罚，而上吊身亡。

4、造谣破坏、煽惑人心。一贯道针对我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制造谣言，进行破坏，煽惑人心，搅乱治安。在我土地改革时，他们造谣说：“今年分人一牛，来年还人一马，这辈子不还，下辈子也要还”，“外财不富命穷人”，“不取无义之财”。对我生产工作，他们破坏说，“混一天是一天，谁发财，就斗谁”。在此谣传下，哲盟扎赉特旗乌珠尔努图克农民于波把春耕种地用的马卖掉入道，弄得他家无法生产。对我支前工作，他们散布说，“天下荒荒起战争，自打自家兵，东也夺，西也争，活把黎民坑”，“三次世界大战一起，各种会道门一起动手，一杀则万道归一，那时就要出朝庭，无论谁坐，都要拜咱为师”，“当兵打仗是伤天害理的事，活着老母不能饶恕，死后也不能回理天”，

“如果参军，走了是回不来的，只有一死，没有一生”等等。

5、篡夺政权，组织暴动。哲盟科尔沁左翼后旗金宝屯区胜利屯一贯道，将四名村干部发展拉入道内，控制了村政权。兴安盟科右中旗高力板街的未来门，计划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进行暴动，备有两个旗帜，一个旗上写：“上中下”，另一个旗上写：“上人进”，备有印章一枚，上刻两个龙，中间刻“不动”二字。“上中下”代表暴动总旗，“上人进”代表未来门暴动旗帜，二龙该印是未来门符号。暴动前进行了封官排位，制定了暴动计划，企图先占领高力板街，推翻人民政府，后被我侦破未遂。一九四七年阴历十二月十二日，在昭盟宁城县的红枪会进行暴动，袭击我设在嘎海沟大营子村的县委组织部，县委组织部长刘乾庵同志及其妻子袁华同志当即被围惨遭杀害。十三日又袭击我设在半截沟的公安局，公安局被包围，这时幸好区小队赶到，堵住暴动匪徒，才利用时间将犯人转移，直到十七日，我县支队和警备团才将暴动匪徒击溃。在这次事件中，我牺牲十七名干部，其中县级干部二人，区级干部七人，村干和战士八人，受伤十人，被俘六人。失去枪支十五支。各村红枪会匪徒死亡二百零六人，被骗被胁群众死亡二百人。

四、一贯道的取缔

内蒙古东部各盟一贯道等反动封建会道门，不论是伪满时或国民党时所组织的，其目的都是迷惑人民、便利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继则又均为日特、国特所操纵、利用和篡夺，变为反人民反革命的活动工具，对我进行各种阴谋破坏活动，臭名昭著，恶果累累。

根据所揭发出的材料看，各种会道门多为蒋特所操纵，以地主、富农、流氓等封建残余势力为骨干，利用一般群众传统的迷信心理，欺骗、拉拢一部分落后群众开展会道门活动。呼盟一贯道创始人干喜山、王宝田就是“军统”特务，并直接受哈尔滨“军统”特务头子王金标领导。哈尔滨、齐齐哈尔一贯道前人李耀宗、盛考斌本人也是“军统”、“中统”特务，曾亲自到呼盟地区发展大批一贯道徒，他们后来所派往呼盟的点传师吴子久、陈淑贤（女）是“军统”特务分子。察哈尔盟、昭乌达盟一贯道，也直接受北平国民党特务机关领导。一九三九年在多伦的万门道德会原是日本特务机关的外围组织。由此可窥见不少会道门组织为蒋特所利用掌握，因而，会道门问题不仅是一个群众性封建迷信思想问题，而且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一九四九年一月和东北行政委员会一九四九年八月九日所颁布的布告：“自布告之日起，所有东北地区之一贯道、孔孟道、圣贤道、先天道、后天道、九宫门、中门正教、大同佛教会、普济佛教会、慈航佛教会、龙华会、寿母会、白律教、红枪会等均属反动的封建会门、道门组织，应即一律解散，不准再有任何活动”。在取缔中，根据布告之精神，打击对象主要是：“反动会门、道门首要分子”。“反动会门、道门首要分子，应即向各该地市、县政府所属之公安机关进行报到登记，悔过自新。对确能遵照政府命令，洗心向善者，政府当予以宽大处理。倘抗不登记，或阳奉阴违，继续进行阴谋活动者，一经查明，定予严办”。对“所有被胁被迫或被诱骗而参加各种会门，道门之一般群众，不论其参加久短，只要脱离其组织，停止其活动，政府念其认识不清，被人愚弄，概不追究既往”。为了团结教育广大道徒，打击揭露首要分子，各地在取缔中采用了

演剧、漫画、现身说法、罪证展览等形式，向群众揭发一贯道的反动罪恶事实及欺骗手法。察盟多伦县二街一个被骗入道者马风婷说：“我可知道了一贯道不是好东西，挂着羊头卖狗肉，表面上行道做善，内里干的反革命。”道徒周玉兰控诉一贯道时说：“自从我们全家入道后，生活一天不如一天，直到现在，弄得家散人亡。”经过取缔，沉重的打击了一贯道首要分子，摧毁了一贯道组织。根据内蒙古党委社会部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对封建迷信会门处理原则政策之规定：“打击首恶、争取多数”的精神，五个盟在取缔中共处理道首九百八十一人。其中对罪大恶极的道首杀掉六十九人；判刑一百四十九人；集训三百六十一人；登记四百零二人。一般道徒声明退道者二万七千五百五十五人。对此，群众拍手称快，说“政府办的对，应该这样办”。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作者 =

页数 = 2 2 5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